

目 录

明清临清的盛衰与地理条件的变化……

……………杨正泰 (1)

临清发展史料……………郝修业 (23)

卫运河演变初考……………徐登阶 (43)

水井小史……………崔子良 (59)

第四专区统战工作回忆片断……………

……………吕仲华 (63)

甘为春蚕吐丝尽

——记优秀共产党员、副校长季羨林同志

……………北大校刊记者 (96)

我的伯父沙月坡……………沙星五 (130)

尉迟修职同志在临清的革命活动……………

……………张铁等口述 王瑞征整理 (137)

省立十一中史略………鸿 鹄 雏 鹰 (149)

临清乡师概述……………李洪珍 许启然 (156)

临清武训小学简史·····	许启然	(167)
武训颂·····	陶行知 臧克家	(178)
临清华美医院小史·····	杜明德	(180)
李东阳三过临清·····	殷黎明	(187)
赵仁泉在临清·····		
·····	郑观云等口述 卢敏整理	(191)
临清商业概述·····	商业志办公室	(201)
临清名吃·····	商业志办公室	(214)
临清名产·····	二轻公司史料编委会等	(231)
知识小品·····	本刊辑	(251)

明清临清的盛衰与地理 条件的变化

杨 正 泰

城市变迁既受社会因素影响，又受地理因素制约。明清时期，运河沿线城市的盛衰往往与运河兴废、漕盐转运和城址迁移密切相关，临清就是具有这种特点的城市之一。临清崛起于明永乐中，嘉靖、隆庆、万历年间最为兴盛，是全国著名的商业城市。明清之际，临清遭受严重破坏，康熙时逐步复苏。乾隆初年临清“富庶甲齐郡”^①，街市冠济西，仍为沿运大都会，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兵燹后，临清渐趋衰落，清末民初破败尤甚。综观临清五百多年发展史，社会因素是决定其盛衰的根本原因，地理条件的变化也是影响其发展的重要原因。

素。本文着重探讨地理条件的变化与临清盛衰的关系。

一、地理条件的变化与临清经济的兴起

临清县始置于北魏太和二十一年(497年)②，后齐废，隋开皇六年(586年)复置③，宋以前治今临西县境卫河西岸④。金代临清县治于何处？《读史方輿纪要》、《嘉庆重修一统志》、《续山东考古录》均无记载。《临清直隶州志》云：宋建炎中临清患水，移治曹仁镇⑤。按宋建炎时即金会初，则金初临清治曹仁镇《金史·地理志》，临清县下有曹仁镇，则表明金未临清县治又有迁徙。有关元代临清县治的记载，仅见于《寰宇通志》：熙宁间，“废临清为镇，寻复置，后徙于县东南四十里曹仁镇。元因之”⑥。则元临清亦治曹仁镇。《大明一统志》：

“洪武二年（1369年）迁治县北八里临清闸”⑦。《明史·地理志》：“旧治在南”。与《寰宇通志》：“国朝二年（1369年），徙治县北八里”⑧。诸说基本一致，可见《寰宇通志》所云不误。准以地望，元代临清城在明临清城以南八里，距汶、卫二水交会处尚远。

元建都北方，供给咸赖江南，漕粮亦由南方北运。至元中，漕粮从东阿陆运至临清，入御河转输大都。在平一带地势低下，每遇春雨泥泞则牛债辐脱，漕运艰阻万状。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开会通河，南起须城安山，北抵临清御河，引汶水入卫。从此汶、卫交会处地理形势大为改观，中洲一带迅速兴起，发展成为会通镇。开凿会通河无疑是临清发展史中的重大事件。但当时会通河岸狭水浅，难负重载，河运常告中断。故元代多以海运为主。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以后，海运漕粮，约在

一百万石以上。延祐、至治年间在二百五十至三百万石左右⑨。若以大都岁需漕粮三百五十万石计，元中叶以后经临清河运的漕粮已越来越少。再则，元临清县治离中洲较远，交通运输位置远无明清时重要，因而发展甚为缓慢。元临清属濮州。天历时濮州商税收入仅二千六百七十锭七钱。总岁额和县平均额均低于邻近的大名路、河间路和东昌路⑩。濮州辖上县一，中县二，下县三，临清为下县。由此可窥其经济之一斑。

明洪武二年（1369年），临清迁治临清闸（按：即中洲纸马巷）⑪，获取了十分优越的发展条件。次年明政府遂于临清建仓储粮⑫。太祖建都南京，漕粮多由长江运输。北方军需主要由海道供给，经临清转输的军粮有限。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黄河在原武决口，漫过安山湖，会通河淤塞不通，漕粮陆运至德州下

河，德州取代了临清的转输地位。靖难之后，百姓流徙，商贾不至，税收不能足额。永乐元年（1403年）临清春税二千三十二贯，实际仅收二十九贯五百文^⑬。可见永乐初临清也很萧条。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政治中心远离经济富庶的南方，临清在南北转输中的地位日趋重要。永乐初，运道有三，“淮、海运道凡二，而临清仓储河南、山东粟，亦以输北平”^⑭。永乐十三年（1415年）重疏大运河成。漕粮悉由大运河运往京、通二地，“海陆运俱废”^⑮。由渦、颍等水往来南北的商客行旅也纷纷改道大运河，“自淮安、清江经济宁、临清赴北京”^⑯。临清遂成咽喉扼要之地。明政府又于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天津置仓储运漕粮。五大水次仓中，天津因海运废止已不如原先重要；淮安、徐州二仓偏于南方，离北京和边防较远；德州仓受河南、山东粟，储粮较少；临清东控青

齐，北临燕赵，仓储南方诸省之漕，供给易州、紫荆军需，战略位置甚为重要。旋又“移德州仓于临清之永清坝”①⑦。临清境内拥有德州、临清二仓。宣德中，又“增造临清仓，容三百万石”①⑧。临清储粮为诸地之冠。宣德初，于灤县、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泲墅、九江、金沙洲、临清、北新等地设关征税，“量舟大小修广而差其额”，“惟临清、北新则兼收货税①⑨。吏部侍郎李旻林说：“临清实南北要冲，京师之门户，舟车所至，外连三边，士大夫有事于朝，内出而外入者，道所必由”②⑩。吏部尚书王值说：“财赋虽出乎四方，而运输以供国用者，必休于此而后达。商贾虽周于百货，而懋迁以应时需者必藏于此而后通”②⑪。明初，临清正是在优越的地理位置上迅速兴起的。

宣德四年（1429年），恢复支运法。常、

镇、淮、扬、凤、大、滁、和、徐民运粮二百二十万石于临清仓^{②②}。临清既是民船交粮地，又是官兵接运处。景泰时在临清“开中”^{②③}。令各地商人输粮临清换取盐引。中洲附近，粮船、盐舟杂集，军民运输繁忙，工商业迅速发展。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临清“四方百货，倍于往时”^{②④}。后又于景泰初，临清筑城，弘治升为州，钞关岁入增至“四万余金”^{②⑤}。这一切标志着临清已进入蓬勃发展的时期。

二、城址变迁和经济繁荣

明嘉靖末至清乾隆初，是临清的全盛时期。

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调整，是临清繁荣的社会原因。成化年间实行输银代役法允许工匠不再到京师当班服役制度。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完全废除工匠当班服役制度，匠生产的产品更多地投入市场，无疑有助于城

市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嘉靖、万历年间，漕船搭载土宜物货的限额大为放宽。成化时海船准带土宜十石，嘉靖末放宽至每船四十石，万历时又增至每船六十石。并准民运白粮船免税带货四十石^{②⑥}。漕运大为兴盛，临清商业亦空前繁荣。商税收入是城市经济盛衰的标志。明万历时，主要钞关有崇文门、河西务、临清、九江、浒墅、扬州、北新、淮安八处。临清关旧额，岁征八万三千二百两，居八大钞关之首^{②⑦}。

嘉靖以后，临清的繁荣与大运河运输功能的提高关系也很大。弘治时，临清建成会通东闸，解决了汶水易泄，船只入卫易坏的问题，从此“舟行上下，如乘安流”^{②⑧}。后又筑南版、新开二闸，“放舟上者无号挽之劳，下者无激射之险”，“速贡输之程，广货殖之用”^{②⑨}。加速了临清经济的发展。南阳新河和沁河

开凿后，大运河畅通无阻的时候居多，也为临清的经济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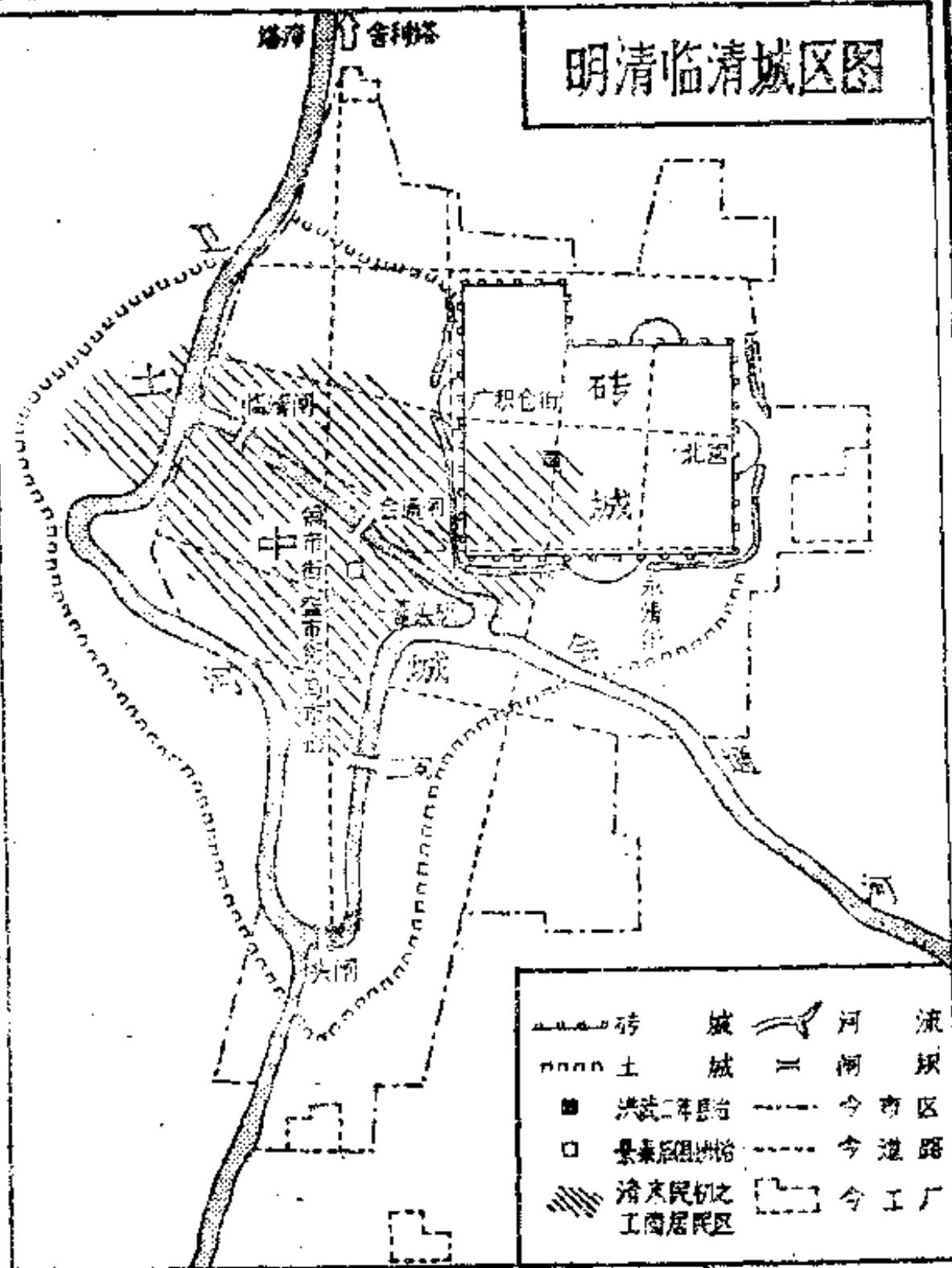
临清繁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城池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与扩建。明中叶临清城有三次大扩展。洪武二年（1369年），临清迁治中洲，未筑城。景泰年间始筑砖城于会通河东。正德年间扩城范围未见记载，据地望判断，不会超出会通河东。直到嘉靖年间土城扩筑后，才最终奠定了临清城镇的规模^{③①}。中洲是临清县（州）治所在，又是临清经济的发祥地。景泰时为何不筑城中洲，而选址于会通河东呢？根据临清地形和砖城形状进行分析，便可探知其端倪。城址选定地势较高的会通河东是为了防止水淹，砖城西北方向凸出是为了“缘广积仓为基”^{③②}。显而易见，景泰选址的主导思想是为了储粮护仓。因而城址地势高亢，土地干燥，城周仅九里有余，全部用砖砌成。但是，

砖城离河较远，供水不便。粮仓占地“四分之一”^{③②}，发展工商业的余地很小。致使景、弘年间，居民阒阒不盛，商肆寥若晨星。弘治以后，“生聚日繁，城居不能什一”^{③③}，商贾列肆于城外者愈来愈多，会通河与砖城间的街市很快发展起来。于是正德年间不得不在这一带扩筑罗城，“以卫商贾之列肆于外者”^{③④}。增筑罗城，虽然缓和了砖城面积狭小与发展工商业的矛盾，但并未充分利用地理条件，为临清的发展开拓更为宏大的天地。当时工商业中心不在城内，而在中洲和运河两岸。砖城徒具城市之名，城内除衙署和粮仓外，实无经济可言。而城外则舟车排列如鳞，商贾负贩云集。中洲和运河沿岸砖瓦厂、造船厂林立，是名符其实的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中心。正德年间刘六、刘七起义，社会动荡不安，城外富贾呼吁筑城。后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扩筑了一

座包罗中洲，横跨汶、卫二水、延袤二十余里的土城，与砖城相接。从此临清有砖、土二城，由于二城相连，又称连城。连城控扼汶、卫咽喉，贯通诸省之漕，既是州治所在和仓储重地，又是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的中心，完全改变了景泰、弘治年间城池布局和工商经济不协调的现象，城市职能能更趋完善。扩建土城，是中洲附近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临清进入全盛时期的重要标志。

城池改造促进了街市发展与经济繁荣。万历年间临清“北起塔湾、南至头闸，绵亘数十里，市肆栉比”^{③⑤}，街市阊閤延伸到土城北三里以外。乾隆初临清街市更盛，砖城内，有街十、市二；土城内有街十三、市十四，巷二十九、厂七、口六、湾二、铺一、道二，无名街巷尚不统计在内^{③⑥}。这些街巷，多以传统工商业为名。如：马市街、盆市街、锅市街、炭厂、

明清临清城区图



粮市、线子市、白布巷、箍桶巷、油篓巷、皮巷、牛市口、羊市口等^{③⑦}。街巷中商号很多，前河涯有磁器店“数十家”，永清大街有杂粮店“二十余家”^{③⑧}，其中马市街、盆市街、锅市街最为繁盛，“东南纨绔、西北裘褐，皆萃于此。求取者争趋之，肩相摩也”^{③⑨}。城池改造促进了手工业发展。明代卫河漕船厂二十八所，俱治州城西北^{④⑩}。入清以后，直隶、山东、凤阳、济南等地帮船也改在临清设厂成造^{④⑪}，乾隆时用椿草筑软坝，利用滑泥拖船入卫。“漕船折毁者颇多”^{④⑫}，均在临清修理后起运。临清又是明代专供京师营缮的砖瓦烧造中心。万历时设营缮分司于临清，“岁征城砖百万”^{④⑬}。清乾隆时仍有官窑十二座，陶人凡二百户，受值则数千金^{④⑭}。砖瓦窑分布于中洲和运河两岸，运送柴草和砖瓦成品都很方便^{④⑮}。清初临清设有铸钱局，“岁办铜银二万两”^{④⑯}。

城池扩展后，商业有了充分的发展余地。明万历时，临清关河雄峙、甲第联翩、烟火万家、舳舻千里，“商贾往来日夜无休时”④⑦。外商在城中占籍者很多。《五杂俎》说，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④⑧。清乾隆时临清商贾辐辏，“多于居民者十倍”④⑨。临清盛时，城内商号鳞次栉比。明万历时有缎店三十二座、布店七十三座、杂物店六十五座⑤⑩。清乾隆初有杂粮店九十余家、典当百余家、旅馆数百家。不少商号营业额很大。如“苏州”、“南翔”、“信义”合股的布行，“岁进布百万有奇”，“一左元”字号点银的硃粉，每年需用二、三十斤硃粉⑤⑪。市场上货物盈街衢，有从南方运来的广锅和景德镇瓷器，有产于辽东的毛皮和河南的牲畜，还有来自天津的秫粱和济宁的布帛。临清出产的帛、哈达、粉绢亦运销京师、宣化、内蒙和西藏等地⑤⑫。运河通畅时，临清贸易范围，“南

达闽粤、北通辽海”，“精美贖贖之物附粮舟而腐至，盖尤易也”⑤③。

明清之际，临清因连年兵燹十分萧条。

“七载兵荒，城廓庐舍俱是丘墟”。“通衢商店变为溺厕”⑤④。但清初大运河依然通畅，漕运制度亦因袭明代不变，交通运输形势大体如故。因此，临清在萧条之后能迅速勃兴，并于康熙末年重新出现“市肆毂击肩摩，不减临淄即墨”的繁荣景象。这种复苏能力和发展速度，是临清处于全盛时期的又一标志。

三、交通运输的变革和临清的衰落

临清转衰始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这一年，寿张、临清、阳谷、堂邑等地暴发了王伦领导的白莲教起义。起义军袭据临清土城，运道受阻。清政府派大学士舒赫德率兵前往镇压，经过四个月拉锯战，“土城遂毁”⑤⑤。

随着全盛时期消逝，临清又从连城变为一城。咸丰时，临清在太平天国北伐军和清军激战中遭受更大破坏。“庙宇齏署、市庐民舍悉付焚，如榛莽瓦砾。百年间，元气不复”^{⑤⑥}。其后，宋景诗又领导黑旗军，与胜保、僧格林沁角逐于临清。不言而喻，百年内迭遭兵燹，是临清衰落的导火线。

导致临清衰落的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优越的经济地理位置的丧失。清中叶以后，政治日益腐败，水利连年失修，运河转输功能大为下降。会通河由于水源枯竭和泥沙沉淀，常常淤浅。临清砖、版二闸之间以及三里铺、鳌头矶等处，每年都需挑浚。嘉庆以后，黄河频频决口，冲决运道，山东诸泉又逐渐枯竭，会通河淤塞日甚一日。“道光四年（1824年）冬，高堰决，运道梗”^{⑤⑦}，次年清政府雇用商船海运漕粮。这是漕运方式的重大变化，也是临清发

展史上的转折点。从此临清与河运有关的手工业一蹶不振，漕运贸易迅速衰落，临清经济大受影响。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期间，河运“停止十有余年”^{⑤8}。此后河海并运七十余年，河运不过十万石，为数很少，较之海运，仅占四十分之一^{⑤9}。清末漕运弊端层出不穷。“上耗国币，下损民生”。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清政府下令：自次年起，湘、赣等六省漕粮一律改折银两。漕粮改折后，沿运闸坝废弃不修，河水宣泄失节，运河沿岸诸湖垦为湖田，水泉无积蓄之地，加速了运河的废弃和临清的衰落。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山东境内北运河除“东昌至临清一段九十余里以外，几如平陆”^{⑥0}。整个大运河已不能沟通南北。清末民初，“由临清迄黄河北岸，计程二百余里，所有汶河河道、堤岸及岸外捻道悉为沿河居民纳租垦种。向之交通孔道悉变为膏腴良田”^{⑥1}，黄

河以北的会通河完全废弃。此时卫河航运情形也远不如前。漕粮改折后上游居民争开涵洞，引水灌田，“截流不得北下”。又因“漳河上源水量逐年减少，入卫之口时常淤塞、迁徙”。每逢春季，河水“深才没胫，极小之船亦不能行驶”^{⑥2}，有时则完全干涸。临清与附近州县的交通几乎陷于瘫痪。

临清冲要位置旁落，还与我国交通运输工具的改变有关。清末火车已逐步成为陆上主要运输工具。自津浦线、京汉线通车后，南北交通形势大变。行商旅客纷纷改乘火车，由大运河来往南北的交通路线已无人问津。各类物资也改向铁路沿线集中，济南、泰安等铁路沿线城市迅速兴起。临清河运已废，又无铁路可通，遂变成鲁西北的偏僻小邑。由于交通闭塞和商业衰落，临清税款在全国总岁入中已微不足道。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临清户工二关

收入共九万二千两。低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其他二十一处直省户关的收入。与江海关相比，只占其岁入的七十分之一^{⑥3}。

伴随经济衰落出现了街市破败。民国时，除剩下几抔黄土外，临清土城早已荡然无存。商业区已缩至中洲，“北至天桥至南关，东至鳌头矶至卫河”。除临西入城孔道附近市容尚可维持外，其他街市均已“倒闭无余”^{⑥4}。砖城街市已虚有其表。“其广积仓街再北无居民”，“北营左右皆荒场，居民艺禾黍”，“西门三、二人家，已不成其为街市”，“北门之内，则白骨如莽，瓦砾苍凉”^{⑥5}。整个临清市井萧条，破落不堪，较之全盛时期面目全非。

时至今日，由于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和其他大中城市兴起，临清在全国的地位已难与漕运时代相提并论。但是经过解放后几十年建设与发展，工业已初具规模，能够生产棉纱、造纸、

卷烟、纺织机械等几十类产品。农业有较大发展，河运告废后交通运输全靠公路。目前临清仍是鲁西北较发达的城市之一。临清是华北平原的主要产棉区，天然气资源较丰富，发展潜力较大。如果途经临清的铁路动工铺建，南水北调东线方案付诸实施，地处冀豫鲁三省之间的临清，必定会有更大的发展。

注：

①《临清直隶州志》宸章。

②《魏书·地理志上》。

③《隋书·地理志中》。

④⑤《临清直隶州志》卷一“古迹”。

⑥⑧《寰宇通志》（玄鉴堂丛书本）卷72东昌府临清县。

⑦《大明一统志》（和刻本）卷24东昌府临清县。

⑨《元史·食货一·海运》。

⑩《元史·食货二·商税》。

⑪《临清直隶州志》卷一“古迹”。

⑫《明史·食货三》。

⑬《明史录》永乐卷19。

- ⑭⑮⑰⑱⑳ 《明史·食货三》。
- ⑲ 《明史录》宣德卷107。
- ⑳ 《明史·食货五》。
- ㉑㉒ 《临清直隶州志》“建置”。
- ㉓ 《明书》卷81“食货”。
- ㉔ 《明史录》永乐卷125。
- ㉕ 《临清直隶州志》卷9。
- ㉖ 《明会典》卷29。
- ㉗ 《续文献通考》卷18。
- ㉘㉙ 《临清直隶州志》卷2。
- ㉚㉛㉜㉝㉞ 《临清直隶州志》卷2。
- ㉟ 《临清县志·经济志》。
- ㊱ 《临清直隶州志》卷2。
- ㊲ 乾隆《临清州志》卷3。
- ㊳ 乾隆《临清州志》卷11。
- ㊴ 《临清直隶州志》卷2。
- ㊵ 《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
- ㊶ 《清史稿·食货五》
- ㊷ 《临清县志》河渠。
- ㊸㊹㊺ 《临清直隶州志》卷9。
- ㊻ 《清史录》康熙卷108。
- ㊼ 周思兼：《周叔夜先生集》卷5。
- ㊽ 谢肇淛：《五杂俎》卷5。
- ㊾ 《临清直隶州志》卷2。
- ㊿ 《皇明经世文编》卷411。
- ① 乾隆《临清州志》卷11。

⑫《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东昌府物产考；《临清直隶州志》卷2

⑬《临清直隶州志》卷2。

⑭《明清史料》首本工部营缮司主事于连耀揭贴。

⑮⑯《临清县志》大事记。

⑰《清朝续文献通考》卷77。

⑱⑲光绪《山东通志》卷126。

⑳《清朝续文献通考》卷76。

㉑㉒《临清县志》河渠。

㉓《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1。

㉔㉕《临清县志》街市。

（陈献瑞供稿）

临清发展史料

郝修业

临清城市，历史并不太久远，从明代洪武二年，临清县在此建治而成为县驻地的城市开始，至今仅六百一十八年。

作为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集中点的城市，是在一定历史阶段生产力发展的产物；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又不断推动着城市的发展与进步。但具体到每个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既受社会因素的影响，也受地理等自然条件的促进与制约。临清这座沿运河城市在历史上的盛衰兴废，就是这一问题的最好验证。据《临清县志》载：临清在元代以前“无商业之可言”，自元代开通会通河（即京杭运河），特别是明代会通河漕运畅通以后，才凭藉地处会通河与卫河

的交点，水运交通四通八达，南通苏杭，北抵京津，这个极为有利的地理条件，每年解冻以后帆樯如林，商贾云集，使临清很快成为北方的水运枢纽，促使经济、文化飞速发展。到明代万历年间即成为全国著名的繁华城市，到清代乾隆时期，即发展到“富庶甲齐郡”的州城。到清末运河停航后，临清工商业逐渐衰落，大不如前。当时临清群众有句俗话：“运河通，临清兴”。由此可见，临清在明清两代的经济繁荣，运河通航是其主要原因之一。

运河通航促进了临清城市建设

会通河是京杭运河的组成部分，因其以汶水为源，在临清也叫汶河。汶河在临清与卫河交汇。卫河在战国时称清水（也叫清河），临清的位置紧临清水，所以叫临清。

临清在会通河开挖以前，既无城市规模，也非郡县驻地，便没工商业。从元代至元二十

六年(公元1289年)开成会通河后，临清地理、交通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才为临清后来发展成鲁西重镇、京师门户创造了有利条件。就连临清发展过程也是随着运河的兴衰，而成波浪式前进的。元代后期，会通河因水源不足，河运常告中断，临清工商业发展很慢。明代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县驻地由会通河南八里之旧县村迁到现在临清考棚街的纸马巷。纸马巷南首阁上，尚镌有“县治遗址”四字。“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黄河决原武，漫安山湖(即现在的东平湖)而东，会通河尽淤”(《明史·河渠志》)，航运中断，临清经济更不景气。《明实录》载：“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临清春税，实际仅收二十九贯五百文。”直到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宋礼治运，特别是“永乐十五年平江伯陈瑄引汶南流入卫，创建了头闸、二闸”之后(见《清平县

志》),会通河才航运畅通,漕粮物资悉由运河运往京师,临清遂成为南北水运咽喉要地。明政府在淮、临、徐、德、天置仓储粮,临清储粮为诸地之冠。吏部尚书王直说:“财富虽出于四方,而运输以国用者,必休于此而后达;商贾虽周于百货,而趯迁以迎需者,必藏于此而后通”(《临清直隶州志》)。临清已成为漕粮转运和开展贸易的重地,具备了形成城市的条件。于是在明代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为了保粮护仓,选地势较高的运河东北隅修筑了临清城,城周九里,全部用砖砌成。但城内面积不大,距运河码头较远,商贾列市于城外的运河两岸者愈来愈多,很快形成街市。这就是临清最繁华的市区不在城里而在城外的历史原因。到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临清升县为州,领馆陶、邱县。这对加速临清经济发展是个有利因素。在弘治、嘉靖年间,在城外汶、

卫两岸即形成了新的商业区。正德年间因刘六、刘七起义，社会动乱不安，城外富贾呼吁筑城，于是在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为保卫城外商民，又修筑了延袤二十里、横跨汶、卫二水的外城，也叫土城。外城的修建，是运河通航促使城外工商业发展的结果，也是临清进入全盛时期的重要标志。

临清建城之后，又处于汶、卫之交，遂构成军事要地。《临清县志》载：“关察五方之客，闸通七省之漕，南北之咽喉，近畿之锁钥也。”是历史上兵家攻守必争之地。其实早在会通河开挖以后，临清筑城之前的元代末年，朱元璋起义军大将军徐达、副将军常遇春在临清屯驻重兵，召开高级军事会议，确定战略方针后，挥师北上，直捣大都，一举推翻了元王朝的统治。以后历代多次军事争战，都以临清为运筹帷幄的指挥中心。

运河通航促进了临清经济繁荣

明弘治时，临清汶、卫两岸舟车排列如鳞，工商产品堆积如山，商贾云集，工业振兴。万历年间，“北起塔湾，南至头闸口，绵亘数十里，市肆栉比”（《临清县志》）。由于工商业的发展，促使明王朝在临清增设行政与管理机构，并制定了一系列的管理办法，反过来又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明成化间，实行输银代役法，允许工匠不到京师当班服役，工匠生产之产品可更多地投入市场，有利于工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嘉靖、万历年间，漕船搭载土特物产的限额大大放宽，成化时每船准带土产十石，万历时每船准带六十石，并准民运白船免税带货四十石。这就更促进了南北货物交流，使临清工商业更为繁荣。税收，是反映经济盛衰的镜子，万历时全国主要钞关有崇文门、临清、扬州等八处，“临清关旧额，岁

征八万三千二百两，居八关之首”（见《续文献通考》）。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临清街、市、巷、道逐渐形成。到清代乾隆时，“砖城内街十、市二；外城内街十三、市十四、巷二十九、厂七、口六、湾二、铺一、道二、无名街巷尚无统计”（见《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临清直隶州志》）。这些街市，因都是在工商业发展中形成的，所以多以传统工商产品命名，如锅市街、白布巷、竹竿巷、油篓巷等。临清主要市区在汶、卫两河之间的陆地上，地面有限，工商产品增长很快，货多地面小，有的把货物堆积在街道上。在街道建设中，为了充分利用地面空间，致使街道很狭窄，并列走不开两辆马车，每到盛夏，可利用街道两旁店铺房檐搭起天棚，形成街道上的遮荫走廊。所以有“夏走临清，冬走彭城”之说。尽管街道不宽，但铺店林立，商民辐辏。万历年间绸缎店

三十二座，布店七十二座，杂货店六十五座（见《明经世文编》）。清代乾隆初年，有杂粮店九十余家，典当百余家，旅店数百家。有些商号营业额很大，如“苏州”、“南翔”、“信义”合股的布行，“岁进布百万有奇”。“一左元”字号的点银珠粉，每年需二、三十斤（见《临清州志》）。市场上物货盈街：有从南方运的广锅，景德镇的瓷器，有辽东的毛皮和河南的牲畜，还有来自天津的百货、粮秣和济宁的布匹等。临清出产的土布、哈达、粉绢、贡皮等也运往京津、宣化、内蒙和西藏等地。临清的贸易范围：“南达闽粤，北通辽海”，“精美贖賚之物，附粮船而鬻至，盖尤易也”（见《临清直隶州志》）。临清已成鲁西冀南繁华富庶的重要商埠，号称“小天津”。据传说“小天津”之称，始于乾隆之口。原因是临清商号多以天津供货商店的字号而命名，有的就

是天津大字号的分号，所以有不少商号与天津大字号重名。同时常住临清的天津客商也很多，食品行业为招徕顾客，使饭菜尽量符合天津客人的口味。乾隆到临清后，看到河船码头、市容风貌颇似天津，吃的食品又多是天津风味，所以称临清为“小天津”。临清附近棉花种植很普遍，并从明代开始沿运河向南方运售棉花。清代，棉和布都列在临清物产的首位。从事棉花业的有“同成花店”、“奎德祥花粮店”，也出现了专门买卖布匹的“白布巷”。在清末民初，临清每年出售的“棉花价值七百余万元”（见《临清县志》）。

临清从明代开始，因棉花种植面积增多，粮田面积减少，又加人口集中，致使粮食不能满足市场需要。据《临清直隶州志》载：“临清为四方辐辏之区，地产谷不敷用，尤取资于商贩。从卫河泛舟东下者豫省为多。秫、粮则

自天津溯流而至。其有从汶河来者，济宁一带米粮也。”鉴于这种情况，乾隆曾特谕临清：“永免各关米豆商税，以使谷物流通”。因此，粮食在临清市场，成为主要贸易商品，有称“德聚”、“奎泰成”、“乾义”、“奎德祥”等字号的大粮店，生意异常兴隆。

杂货是商船、粮船从南方和天津运来的，主要有红糖、白糖、瓷器、江米、竹制品、竹竿、丝绸和丝织品等。直到清代后期，还是船到临清码头时，排列十里多长，直到歇马亭以东。这段河岸有三个码头：头闸口、二闸口、前关。粮船一到，两岸码头即成了繁华市场，船工们出售景德镇的瓷器、绍兴南酒、红白糖、红漆木器、竹货等。临清手工业者、商人、小商贩争相抢购。《临清直隶州志》载：“东南纨绔，西北裘褐，皆萃于此、求取者争趋之，肩相摩也”。

在工业和手工业方面，明代永乐初年，临清就有官建砖窑，一直延续到清代。明、清两代修建北京皇宫、各大殿、紫禁城墙，以及明代修建的北京十三陵，和清代修建的东陵、西陵等皇帝陵寝，用的绝大部分是临清砖。明清两代所以在临清建窑烧砖，是因临清土质较好，技艺高超，而且航运方便。所以明代为建窑烧砖，就在临清“设有工部营缮分司督之”。清代“顺治十八年裁工部营缮分司，以山东巡抚督之，监办官为东昌府同知，承办官为临清知州”。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专归临清州管理，以后逐渐转归窑户承办，成为官督民办形式。其规模之大，有大小窑三百八十四座，工人九千六百多名，占地七千六百八十余亩。窑的分布，在汶、卫两河沿岸，逶迤六十多华里，至今沿河有的村庄还叫“张窑”、“唐窑”、“白塔窑”等。年产砖，按窑数单产计算，可达一千一百五十二万块。《临清

直隶州志》载：“岁征城砖百万”，显然比实际产量少的多（以上情况均见《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

除上述砖窑这种官办手工业外，民间手工业也较发达，较著名的手工业产品如哈达。哈达是蒙、藏、等民族，以及寺庙用以表示敬意、祝贺、祭神和丧葬所用的丝巾。用纯丝织成，呈长方形状，一般长约一米半，宽三十厘米左右。据《临清县志》载：哈达“此项丝织业，发源苏州，自太平军兴，遂转移于临清”。但乾隆五十年成书的《临清直隶州志》上，把哈达称作“纯绢丝布帛”就已经有了记载。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中，把临清开始生产哈达的时间，放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显然是对的。哈达业最发达时，“全境内机房七百余处，浆房七、八处，收庄十余家，织工五千人（见《临清县志》）。通过运

河，将哈达运往京津，销往内外蒙及察绥等地。

临清千张袄是远近闻名的另一种手工业产品，它与清代贡皮有关。在清代临清有“市口皮及束鹿皮”，其特点是“特柔而不膻”。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巡抚塞楞额以此做为贡品。“至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巡抚朱定元奉内廷发出皮样”。“岁进大西皮一千张，西皮一千张，珍珠雉毛皮一千张，每岁冬春……铺户采办”（见《临清直隶州志》）。在生产贡皮作坊里，每到年底，作坊对手工业者实行所谓“馈赠”，其馈赠品，就是做贡皮剪裁下来的边角余料等“皮渣子”。辛苦一年的手艺人，为糊口计，把这些边角余料千针万线缝缀成较大的方块，到市场出售。这就是千张袄的雏形。后来又把若干方块皮料密缝在一起，裁成衣料，于是在市上就出现了千张袄。这种手工产品，工艺日趋精良，物美价廉，销路颇

畅。后来形成一种专门行业，并到甘肃、宁夏等地购滩羊碎皮和边角料，开辟了新的料源。到清末、临清已有大小千张袄作坊和铺子七十余家。千张袄就成为临清三大名产（瓜干、枣脯、千张袄）之一。

清代乾隆时，为临清经济发展鼎盛时期。清代晚期，由于会通河水源枯涩，泥沙沉淀，河防工程连年失修，运输能力大为降低。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冬，“高堰决，运道梗”。次年清政府雇用商船海运漕粮。漕运方式开始发生变化，也是临清发展史上的转折点。从此，临清贸易日渐萧条，与运河有关的工商业逐渐衰落，临清经济发展缓慢下来。由此可以看出，临清的发展与南北大运河通航息息相关。没有运河通航，就没有明清两代繁荣四百年的临清州。

运河通航促进了临清文化的昌盛

京杭运河通航，促进了全国南北文化交流，也促进了临清文化的发展。明清时期，由于运河畅通，不仅促进了临清经济繁荣，同时也促进了临清的文化发展，有不少诗、文、书、画来歌颂临清的繁荣景象。如明代内阁大学士李东阳过临清时写的诗：“十里人家两岸分，层楼高栋入青云。官船商舶纷纷过，击鼓鸣锣处处闻”。乾隆皇帝游幸江南过临清时，也写出“临清傍运河，富庶甲齐郡”的名句。类似这样颂扬临清的诗作，在县志上俯首皆拾。临清文化历史悠久，正如县志中所说：“邹鲁多文学之士，清渊尤有遗风”。明清两代，临清文化界人才辈出，涌现出不少诗人、画家、书法家、演唱艺术家：如明代的谢榛、方元焕、清代的周之恒、清末的王小玉等。方元焕的书法独具一格，当时对方元焕的书法的评价是：两江（方元焕的字）书如卫霍子弟行兵千里赴

利，神气自倍；又如鹰隼乘风搏狐兔，转顾自如”。安南驿使不惜千金购其字。周之恒的绘画艺术则是“王五溪山复平远，周郎巢石亦清真。”风流文彩一时推重。谢榛“年十六作乐府商调，少年争相歌之”。后来他的歌词名闻燕赵，特别当时在彰德（今河南安阳）的赵康王所尊崇。他与赵康王会晤时，曾解脱黎阳名士卢楠出狱（见《临清县志》）。卢楠即冯梦龙写的《惊世通言》中《卢太学诗酒傲公侯》里的卢太学。从此卢、谢十分友善，都是不图仕进，专攻诗文的一代名士。王小玉就是《老残游记》中在济南大明湖说书的白妞。《临清文化志初稿》载：“白妞即王小玉，临清人，十二岁学艺，二十岁艺成”。五十年代临清还有她的传人。白妞是说梨花大鼓南口派的创始人。一九五七年北京音乐出版社出版的《山东大鼓》中记载：“白妞、黑妞即王小玉姐妹，

她俩自幼随父学艺，王氏姐妹俩颇有演唱才能，她们在梨花调的基础上，吸收其他小曲等南腔北调，融会贯通地创造出一种新腔，曲调婉转，千折百叠，加上她们天生的一副好嗓音，听起来入耳动心。因而梨花大鼓哄然而起，使济南大明湖书场里熙熙攘攘，门庭若市”。南口派从踏入济南开始，梨花大鼓声誉即风行各地，沿运河北到京津，南到苏杭。

从明代起，随着临清经济的发展，顺运河从江、浙、徽、赣等省来临清占籍的文人商客越来越多。为了适应这些人文化生活的需要，临清也出现了象杭州、南京等城市一样的歌妓院，发展到最多时，临清当时有“三十六家歌妓院，七十二座管弦楼”之说。可见当时临清文化生活之丰富多彩。竹竿巷“富春院”的陈三两（原名李翠萍）就是当时有名的歌妓之一。她们唱的曲子，多是“临清时调”，其

歌词并不尽是歌颂才子佳人，尚有不少是反封建礼教，要求自由解放的内容。如临清时调传人烟厂女工阎玉贞，在五十年代进京演唱的“撒大泼”，就是反映一个少女反对父母包办，力求婚姻自主的好段子。周总理看后大加赞扬，称阎玉贞是业余演唱家。临清时调“撒大泼”也在全国风靡一时。

脍炙人口的山东快书也源于临清。《临清地方史志》中记载：清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十余名落榜举子乘船归乡途中遇雨，滞留临清客店。考场的舞弊，落第的苦恼，使他们满腹愤懑无处发泄。于是以民间流行的武松故事为基础，你一言，我一语编凑成一个《武松传》说唱底本。作者之一李长清把这个底本带回原籍茌平，交其具有说唱艺术才能的表弟傅汉章。傅汉章在曲阜孔林前“林门会”上第一次演出时，豪侠的武松形象和激越的语气，

逼真的表情，只说不唱的表演新艺术，赢得了广大观众热烈欢迎。这就是山东快书的由来。

由于运河的南北沟通，临清除原有的学者名人外，各地不少文人名士也荟集于临清，在临清停留、定居，多有专著和诗作。康熙皇帝来到临清，为临清藏书处“尊经阁”题的“芝阁”，乾隆皇帝为会通河入卫处题的“安澜济运”，以及明代大书法家王穀为卫河渡口题的“沙邱古渡”等几块木质大匾，至今还在临清保存。临清文化建设也颇多：如修孔庙，建孔学和藏书楼阁等，吸引了大批文人墨客来临清传授经书儒道，培养了一些力图仕进的进士、举人一类的文人。以进士为例，《临清县志》载，在元代只有一名，到明代猛增到六十多名。可见当时临清文化之盛。另外，还有一些不图仕进、埋头研究学问的文化人。明代的

“余俨，字望之，持躬端谨，究心理学，当道累征不起，著有《朴菴文集》”等。清代“董上新，字奠素，于书无所不读，尝于一州中天文、地輿、人物及沿革废置之故，辑成一书，名曰《清之胜》”。清代“黄允中，为人诚朴，精岐黄，尤长痘疹科，著有《痘疹全诀》”一书。这一派人，代表了当时临清的新文化。

从以上情况看，临清在明清两代的经济繁荣、文化昌盛，运河通航起了重大作用。临清人民不仅过去盼望运河通航，现在更希望运河航运畅通。根据临清的地理位置和生产情况，如能通过南水北调，恢复临清的水运交通，临清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更会高速腾飞。无需多久，一个比明清时期繁荣百倍的新临清，定会以崭新的风貌出现在鲁西北大地，为祖国“四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卫运河演变初考

徐登阶

卫运河，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和上游的卫河，下游的南运河明代统称卫河。它是由古代的清河、屯氏河、白沟、永济渠演变而来的。并且和黄河变迁有着密切的联系。最近，在修志的过程中，我对卫运河的变迁作了粗略考证，并藉此对卫运河的演变作简要记述。

一、今卫运河概况

卫运河为海河水系，是冀鲁两省的边界河道，是一条防洪、灌溉、通航综合利用的河道。因而它是沿河人民经济生活的命脉。上源漳河、卫河，两河于馆陶县徐万仓汇流后称卫运河。

漳河发源于山西省太行山区，分清漳、浊漳两支，流域面积1.82万平方公里。清漳又有东西二源：东源发源于山西省昔阳县漳槽村附近；西源发源于山西省和顺县八赋岭。二源于左权县泽城附近合流。下流到河北省涉县合漳镇与浊漳河汇合后称漳河。浊漳河亦称潞水，上源有三：南源出山西省长子县发鸠山；西源出沁县漳源镇；北源出榆社县两河口村。卫河源出河南辉县苏门山的百门泉，主要支流有淇河、安阳河等，流域面积1.556万平方公里。

卫运河流经河北省的馆陶、临西、清河、故城，山东的冠县、临清、夏津、武城、平原等县市边境。自漳卫汇流处至四女寺枢纽工程止，全长157公里。

二、卫运河古时叫清河或清水

据王国维校《水经注校》记载：“清水出河

內修武县之北黑山”，“东北过获嘉县北”，“又过汲县北”，“又东入于河”，“又东北过馆陶县北”，“又东北过清渊县”。清渊县就是临清，西汉初置，属魏郡。故城在今山东冠县东北部的清水。从《中国历史地图集》上看，清河在战国时，从临西往上与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的河水平行，由西南往东北流，到临西转东略偏北的方向流去，在临清北、夏津北一直到平原北入河水。所以《战国策》称，苏秦说齐曰“西有清河”，说赵曰“东有清河”，《临清县志》中说：“清河郡、清河县及清渊、清泉、临清之名亦由此”。

三、卫运河是屯氏河故渚

据南充师范学院历史系编绘《中国古代历史地图集》中黄河下游水道变迁图说明中称：“汉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河北鄆子河

口，由汉濮阳县北十里（旧濮阳在今县西南）向东南冲入巨野泽，会泗水入淮而后出海。后二十年始塞，筑宫其上，名宣房宫。但是没有多久，黄河又从今河北馆陶县西南冲出一条新道，称为屯氏河，与黄河分别出海”。《辞海》在解释“屯氏河”中说：“屯氏河，黄河下游故道之一。西汉元封后，黄河北决于馆陶（今属河北），分为屯氏河，东北至章武（今河北沧县东北）入海。广深与黄河正流相等。至永光五（公元前39年）黄河又在下游鸣犊口（今山东高唐南）决口屯氏河遂淤绝。《水经注》中仍有屯氏河故渚，下游又支分为屯氏别河故渚，别河又支分为南北二故渚，这些故渚的经行路线与元封间的故道不尽相同。当系永光后决徙所形成，其遗迹至今犹散见于山东、河北两省接壤处各县内。后隋炀帝时开永济渠。其在山东境内一段（即今卫河）一部分即利用屯氏河故

道修浚而成”。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安作璋在山东水利志编写工作研究会上的报告《关于编写山东水利志的几个问题》中说：“古代山东人民为了克服水患保证农业生产，与黄河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规模比较大的一次是汉武帝时候，黄河在山东馆陶决口。当时，山东的劳动人民总结了历年治理黄河的经验，在黄河决口的地方，顺着水势开凿了一条和黄河深宽相等的屯氏河。从决口的地方一直流到海里。这一次治理黄河规模很大，投入的人力、物力相当多，据历史书载，保持大约六十多年山东没有大的水患。汉武帝还亲自到河堤决口的地方去视察。随同官员都参加了治河劳动。看了安教授的讲话，今年五月二十九日我给安写信请教。安教授六月十五日复信说：“关于屯氏河经过贵县县境，没有什么问题。据有关资料，现在的卫运河自临清经武城至故城一段，应即是利

用了原屯氏河的河道。”一九六六年五月邢台地震后，原水电部副部长、现在的中国水利学会名誉理事长张含英到临清解决河北、山东的水利矛盾，当他乘车到了我们临西县城（童村）东鯮堤下，看了地形，拿了块土给陪同的人们说：

“这里是黄河的故道！”

《馆陶县志》载：“汉孝武元封二年（公元109年）瓠子塞后河复决馆陶，分屯氏河，东北入海。”

四、卫运河是曹魏时的白沟

《山东通志》载：“汉塞宣房后，河决馆陶，东北至章武入海，即天津、恩、德、清、沧之间为大河故渚。建安中（即建安九年，也就是公元204年）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隋大业中（即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开永济渠北通涿郡，渠阔一百七十尺，深二丈四尺，南

自汲郡引清，淇二水东北入白沟，穿承济渠入临清，盖屯氏河故沟，隋修之”。

三国时期，战争频繁。水运及屯田均有所发展。曹魏缺粮严重，乃采用屯田的办法。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挟汉献帝由洛阳迁都许昌。为了解决军食民需，巩固个人的权势，发布了“屯田令”，开始在“许下屯田”并在力所能及的州郡推行。因之，也就促进了灌溉事业的发展。又以转漕给军的紧急需要，沟通水系间的人工运河也就有所发展，“积谷通渠”便成为当时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贯通东北水系的白沟也就是在当时完成的。

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率军渡河，进攻袁绍余部，于今河南淇、浚一带的淇水入河处，修枋头堰“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

淇水本是黄河支流，在今河南淇县以东汇入黄河，通淇水转向东北，清水从西南来与淇水

汇合，东北行二、三十里再循黄河宿胥故渚，这段河道经整修后称作白沟。

曹操开挖白沟的主要目的是要从黄河经白沟向东北运送军粮。

白沟开挖后不久，曹操的军队就沿白沟至洹水一线直达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邺镇）。很快夺取了该地。

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曹操北征乌桓，凿渠自漳沱入潞水”、名平虏渠，又从洵口凿入潞河（今通县以下的白河），名泉州渠以通海。

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为了改善其封地邺城的交通条件，“凿渠引漳水入白沟以通河”，渠名为利漕渠，邺城可由此渠经白沟，通黄河，达江、淮。也可由白沟东北直达天津入海。

五、卫运河亦名御河

《山东运河备览》卷七中写道：“卫河即隋御河，源出河南辉县苏山门之百门泉，临清西有卫河，自馆陶县入，合会通河又入夏津界，亦名清河，即隋炀帝所开永济渠也”。《隋书》载：“大业四年春正月，诏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永济渠也就是三国时曹魏白沟的发展，由洛阳向东北，经修武、新乡、内黄、馆陶、临清至天津西转永定河直抵涿郡（今北京）赐名御河，御河之名始于此。加上开皇七年（公元587年）的山阳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开的通济渠和大业六年（公元610年）的江南运河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北通涿郡，南达杭州，全长2700多公里的京杭大运河。永济渠经过临清、临西，是京杭运河流经临西之始，至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元和郡县图

志》中说：“永济渠在县城(临清)西门外”。

《河北政区沿革志》中说：“北魏时，于太和廿一年(公元497年)临清县复名清渊县，并在西境(今临西县地)另设临清县，治在今临西县城(童村)西南之仓上村(当时称仓集镇)”，又载“大历七年(公元772年)析临清县西境(今临西县地)设永济县”，《元和郡县图志》载：“永济县本汉贝邱县地，临清县之南偏，大历七年，田承嗣奏于张桥行市置，西井(“井”即“临”意。)永济渠，故以为名”，《馆陶县志》载：“永济县故城，即北馆陶(今属山东省冠县)，本为临清张桥店，唐大历七年置县，属贝州。以西临永济渠故名”，《明一统志》载：“永济渠在东昌府馆陶县(原馆陶县城北馆陶)西二里，汉名屯氏河，隋改为永济渠，亦曰御河”，因此说，临清、永济两县治均在永济渠东侧。《临清县志》

的艺文志载有宋代王安石的一首七言诗《永济道中》：

灯火匆匆出馆陶	回看永济日初高
已闻空舍鸟乌乐	更觉荒坡人马劳
客路光阴真弃置	春风边塞祇萧骚
辛夷花下乌塘尾	握手何时叙汝曹

这说明永济渠从隋到北宋初四百年的时间还是航船往来，畅通无阻。

六、北宋后的卫运河

据《历代黄河决口年地概况表》载：“宋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八月河决通利军。大名府御河溢，合流坏府城害田，人多溺死”，《东昌府志》记载：“宋大中祥符四年河决通利军，合御河，坏州城田舍”，《临清县志》河渠写道：“宋大中祥符四年，河决通利军，合御河，寻经塞治”。

《山东水利史》载：“宋庆历八年（公元

1048年)黄河在澶州商胡(今濮县东)决口,向北流经大名入卫河,流经现馆陶西、临清西、武城西、德州西、东光西、南皮西至沧县西北,与漳河汇流从青县、天津入海”,这是自公元11年,黄河第二次大徙,河口自天津移向山东,经过1037年:至公元1048年再次走上由天津入海之路,是黄河一次大的变迁,称谓黄河第九次较大的改道,也是黄河历史上的第三次大徙。宋人称为“北流”,北流经临清西也就是我们临西县境。

时隔十二年于宋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黄河又在商胡以下的魏郡第六埽(今南乐县附近)决口,另冲一支东北流,一称二股河,宋人谓之“东流”。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六月末,黄河于内黄决口,东流绝断,又向北流,重新冲出一条河道,乃至乾宁军一带入海,据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宋代黄河北流考》

称：“元符二年，内黄口河决，东流断绝。内黄以上同小吴北流道，其下经内黄、馆陶、平原、清河、南宫、信都、枣强、衡水、武强、深州、乐寿至乾宁军、独流寨、三义口入海。此后近四十年内，黄河主流有时东行，有时北行，反复不定，但基本上以北流为主，流入渤海。至公元1069年（熙宁二年）堵塞北流，到金宣宗迁汴湮废，漕运受阻。所以元建都北京后，从南到北漕运采用水陆两运办法：从杭州开始，经江南运河在京口过长江，再由扬州运河达淮安入黄河，逆流而上，到中泺（在封丘西南，黄河北岸），改用陆运，走一百八十里到淇门，然后用船经御河直达大都。御河在元初曾屡次加以修治，又先后凿通了济州河、会通河，使江淮直穿山东于临清接御河，明清把大运河称作漕河，把御河更名为卫河。

“卫运河”一名最早见于抗日战争胜利结

束不久。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冀南区在临清建立了卫运河河务局，局长由冀南七专署专员贝仲选兼任，刘宙光任副局长，负责卫运河的河道治理和航运管理工作，后来卫运河、南运河和卫河的名称在卫运河段并存，一九五八年四女寺枢纽建立后统称卫运河。目前通常所说的卫河，是指新乡合河镇至漳河称勾弯一段，称勾弯到四女寺称卫运河，四女寺以下便是南运河，直达天津入海河。卫运河古代是条繁忙的运道，对促进我国经济文化发展起过重要作用。

卫运河由于河道弯曲，河床坡度平缓，在洪水含砂量大的情况下，常年淤积，卫运河堤内滩地一般高于堤外耕地，洪水一旦漫滩就成了地上河，因而“易盈易涸”，盈了往往决口泛滥成灾，尤其馆陶至临清以及以下到天津，地势低洼，几乎每岁必决，以我们临西为例，

从一八九二年到一九五六年七十四年中，决口十二次。涸了，河水断流，航运中断，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八五年卫运河临清站年平均断流时间长达七十四天，最长的一九七四年达206天（当时因卫运河扩大治理），一九七九年底断流190天，廿年中汛期断流的有十四个年头，从而可以看出卫运河水资源短缺情况已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

历代统治者虽多次采取治河措施，却没能根本改变卫运河“易盈易涸”，“无水利而多水患”的面貌，直到解放后，党和政府大搞水利建设，尤其在毛主席“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鼓舞下，卫运河进行了扩大治理，河道加宽加深，裁弯取直，堤防加高培厚，大大提高了防洪能力，有效地减免了下游水灾，河南建了“人民胜利渠”、“共产主义渠”，发挥了灌溉供水等兴利效益。据统计，沿河建扬水站

190处，提水能力194.85立米/秒，设计灌溉面积242.99万亩，但由于缺水，未能充分发挥作用，从一九七三年到一九八二年通过卫河、卫运河多次向天津输送黄河水，缓解了天津缺水状况，建国后，卫运河相继修建了七座桥梁，把河北与山东紧紧联系在一起。引黄济卫和南水北调东线方案付诸实施后，卫运河输水灌溉通航兴利的作用就能重新发展。

（转自临西县政协1987年《文史资料》第九期）

水井小史

崔子良

古代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大都择其湖泊、山泉、河道、坑塘等，有水处羣居。临清老祖先，在清水河旁生活，起名临清，真乃恰如其分，名符其实。

后来，人们在内地广阔的土地上，摸索出掘土坑取水，才慢慢扩散到平原大地建村居住，农村这个名子也就产生了。

挖土坑取水是最古老的方法，以后发展成临坑掘井。这种水井一旦遇雨，很容易毁坏。自秦砖汉瓦的出现，有了砖以后，用砖砌井壁，才解决了井壁坍塌之灾。开始人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甃，即水井、砖井。井型的发展，

在临清这个地方，开始是土坑——土井——竹柳井——砖井。使用砖井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为了从砖井内多取水，又创造出在井内下泉。据《临清县志》记载：农村水井在村内者十为之八九，多为人畜饮水而建。后来发展到村外打井种菜。当地人说：“一亩园胜十亩田”。菜园建井在农村有条件的地方就兴起来了。而在广大农田建井者甚少，至于灌溉良田，抗御旱灾是力所不及的。临清地处黄河冲积平原，含水层深，且多流沙。加之，凿井工具落后，成井寥寥。因此，种地靠天吃饭，粮食产量，低而不稳。

农民在长期的耕耘中，深知种田无水的难处。十家八户凑份子，在田间建水井。到民国25年旧县志记载，全县有旧式井12658眼。当时，劳动人民为寻找地下水，打下一口好井，采用找井的方法：观察地面干湿，潮湿则

表明地下水旺。意识上便认为是丰水地。还有的利用气试、盘试、缶试、火试、豆试方法，找丰水井位。像豆试法，就是把黄豆埋在地，过一定时间把土扒开，见干豆粒鼓涨起来，说明此地水旺可打井。

在建井历史上，临清出过两个能人，一个是城东北王大人村，名叫侯建的；一个是城南王坊村，名叫孙楚才的。在民国时期建过十眼手压式铁管封闭深砖井。这在当时是比较新鲜的事。人们传说第一次见到这种水井，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龙戏水”井。这十眼井的座落，根据旧县志记载的地理位置是：中山苗圃二眼，农事试验场、老电灯公司、现在的回民中学门前各一眼，城西吴村田内三眼，城南王坊村二眼。多数人见过的是，回民中学门前的井。

在临清广大农村中，兴建的砖井有砖管井、深砖井、大口井、穿鞋戴帽井、子母井、

橫泉排子井、五井连心井等。劳动人民在建井上是很有创造性的。

新中国建立后，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为发展农业生产，1966年全县田间建砖井达到三万六千眼。砖井被机井淘汰后，机井已星罗棋布，遍及全县，亩产千斤粮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这在旧社会十亩土地也难收千斤呀！

第四专区统战工作回忆片断

吕 仲 华

到敌人后方去

一九三八年春，我国民族抗战进入第二个年头，其时华北地区已大部分沦陷，我党中央为实现全面的民族抗战，先后派大批干部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是年三月，我们一批来自延安抗大、陕北公学、云阳青训班的青年干部正汇集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待命出发，时遇国民党的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的老部下韩多峯先生，从徐州派徐铁生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要求派干部到山东共同抗战。于是，我们一行十五人遂打起了“旅陕山东同乡战地服务团”的灰色小旗①奉命出发。行前办事

处主任林老（伯渠同志）找我谈话：“你们是派到第五战区去的，那里情况复杂，不同于边区和在自己的部队，凡事要善于动脑筋。去后要来信。”我们即乘陇海路列车前往徐州。我们出发一周始达徐州。这时韩多峯正在五战区请命回山东抗战，他热情接待我们。因韩多峯是冯玉祥将军的老部下，非蒋家嫡系，因此，韩请命回山东抗战之事，蒋介石就是不发委，蒋不发委抗战就不合法，同志们深感屈辱和气愤，有的要去找地方党，或去找八路军、新四军。也有的要回家拉游击队。王健、李义、徐中林、梁健民、李渭清这几个共产党员就是在这样形势下一去无回音，及至台儿庄失守，徐州告急，蒋介石仍不发委，韩先生愤极无奈，就持冯玉祥的介绍信向李宗仁“哭秦庭”②，坚持要求抗日，韩先生挥泪陈词，壮怀激烈，终于感动了李宗仁，遂以五战区长官的名义，给了

一纸“鲁南民团总指挥”的空委任。于是我们又风雨兼程出发去鲁西南。经一夜颠簸，拂晓即达目的地——东平。时正值春光明媚的四月下旬，鲁南民团总指挥部就设在东平城内。这期间江风、钱磊又被派出不回，服务团成员所剩无几，连在东平新参加的赵效三、赵文卿和韩的随从共十余人。共产党员只剩我一个人，另“民先”三人，在此我们很快与当地党取了联系，派代表张伯华两次到东平泰东特委（后改为泰西特委），负责人孙光、万里同志也从肥城边家园几次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同志们相见分外亲切，他们传达了党的关怀和慰藉。特委并向我交待了发展党的任务。还发给党纲、党章、新党员训练大纲和党员登记表等一批文件。是年四月底，我在东平介绍了丁哲民、刘辛本二人入党。在东平，徐铁生搞分裂，要拉我们的人加入国民党，遭到同志们的反对和抵制，他就和我

们分道扬镳自立山头去了。

接管第四专区的统战斗争

我们到东平不久，徐州失守，沈鸿烈也从曹县跑到东阿，他发觉韩在家乡不但力主抗战，而且和共产党交往甚密，韩在鲁西南很有号召力，地方保安团队都拥戴韩总指挥。因此，沈鸿烈由对韩妒忌、排斥，转为对其笼络、控制和利用。一九三八年五月初，沈鸿烈委任韩为鲁西北第四专区专员。我请示特委怎么办，万里、孙光同志指示：一、均陪同韩去临清接管第四专区，必要时可以从这里——泰西区人民自卫团带去部分武装；二、注意掌握韩的动向与韩搞好团结合作；三、届时先到聊城去找张霖之，去后常来信联系。

时六区专员范筑先在聊城和共产党人亲密合作，正搞得轰轰烈烈。范韩刚会晤就谈得很

亲切，韩对范的做法非常赞赏，他表示一定效法范筑先，和共产党搞合作抗日。此间在六区政治部我也见到了张霖之同志，他当时名义上是六区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实则是中共山东省委代表鲁西北党的主要领导人。他对我谈及了第四专区的混乱情况，因临清局面混乱，时四专署暂迁驻清平。范专员还用其仅有的一辆卡车把我们送到清平。不久即移驻临清。从一九三八年五月，我们开始接管第四专区，到十月撤离驻临清四专区，这四五个月的时间內，我们在冀鲁豫边区省委和“临清党团”的领导下，依靠八路军做后盾，在开展第四专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复杂斗争中，作了一些实际工作，获得了不少知识，经受了斗争的锻炼，回忆如下：

（一）反磨擦说服“冯二皮”

当时以临清为中心的鲁西北第四专区，由于敌人的年前进攻，原四区专员赵仁泉和各县

县长多已携眷带款逃跑，土匪兵勇遂揭竿而起，当上了“司令”，这些人抗日不足，扰民有余。五月中旬八路军东进纵队为东上抗日，已将部队从冀南开抵临清河西街。抵临后，在临清地方党的配合下立即在临南歼灭了伪皇协军张殿卿部，此举使当地的土杂武装普遍感到了恐慌，并以冯寿彭（外号冯二皮）为首，纠合吴连杰、吉占鳌等部，结成了“抗八联军”，在卫河东岸与东纵隔河对峙，拒不让八路军东上抗日。而我东纵为了抗日又非过河不可，形势严重，战火一触即发。临清人民无不忧心忡忡，害怕遭殃，为了缓和局势，临清商界以商会会长李耀堂等为代表，驰赴清平，约请韩专员火速去临清解除灾难，韩遂应命，翌日韩即带情报股长赵文卿和传令兵等，由我陪同骑自行车前往临清。在驰抵清平县西马王庄冯寿彭驻地时，韩约见了冯寿彭，韩专员问冯：“为什么要和八路军开火？”

冯气呼呼地说：“他们要来夺地盘，吞掉我们！我祖祖辈辈生养死葬都在清平，临清有我的亲朋好友，奶奶的！欺负到我冯二皮头上来了，俺冯二皮是好惹的吗？这个仗非打不可！”韩专员一看他口气挺硬，知道从正面讲大道理难以说服他。就结合他的切身利益，婉转地讲：“这个仗打起来对你有害无利，是赔本的仗！”冯问：“为什么？”韩专员就以“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故事作比喻，说：“枪炮子弹是不长眼睛的，一打起来不但临清人民遭涂炭，就连你的亲朋好友也难以幸免，因此这个仗你打败了不用说是败仗，你就是打胜了也是败仗！”冯又问：“为什么？”韩又说：“因为仗是你领着打的，不管是胜利还是失败，反正是人民遭殃。那时，不但临清人民恨你、骂你，要和你算血帐，就是你的同胞骨肉也会骂你冯二皮是不孝子孙呢！你说这到底是胜仗还是败仗？你

想想吧！”至此，冯二皮才开始犹豫，说：

“专员说的有理，值得考虑，只是八路军想怎么着，咱还摸不透呢！”我乘机插话：“听说八路军主张团结抗战，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共同抗日，枪口对外，反对自相残杀、搞磨擦。”冯听了，仍不放心，韩专员接着说：“是啊！这个仗万万打不得，这个事由我亲自去和八路军协商。”

下午，我陪同韩专员到了临清河西街东纵司令部，会见了陈再道司令员，刘志坚副主任和卜盛光参谋长等。韩首先说明来意，力陈了他和八路军合作的热诚，并指着我说：“吕同志就是从延安抗大派来的干部。”韩还向东纵首长表示，他愿竭尽职能说服冯寿彭等悬崖勒马，消除磨擦。陈司令员对我们的来意极表欢迎，给予了热情接待。刘副主任讲：“八路军东上只是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对友党、友军

一贯主张团结抗战，反对搞磨擦，至于消灭张殿卿则是因为他们当了伪皇协军，这有缴获旗徽为证。他们处处和八路军为敌，抓我们的人，杀我们的同志，消灭他们正是为民除害，请专员对冯、吴、吉讲明真相，劝他们枪口对外，共同抗日。”韩专员当即一口应诺。因为当时冯寿彭在临清的土杂武装中兵力最强，有士兵千余人，轻重机枪四十余挺，故冯在临清称霸一方。而由于冯在宋哲元部下当过团长，宋韩都是老西北军的将领，故冯对韩也比较尊重，当韩把陈司令员和刘副主任的话转告于冯，劝他也东下抗日，为国家民族立战功，结果一说即通。韩专员还把他仅有的三千余元悉数资助冯寿彭作开拔费，冯受宠若惊，显得很激动，当面向韩发誓：“奶奶的，谁不打鬼子就是小舅子！请老长官看看俺冯二皮是不是好样的！”翌日，冯部便全部开拔长清。这样

猖獗一时的“抗八联军”没费我党我军一枪一弹即告瓦解。这一事实足可以说明党的统战政策确是克敌制胜的法宝之一，只要用之得当足可抵千军万马。

（二）加强对统战工作的领导

随着“抗八联军”的瓦解，东进纵队顺利过河东上抗日，临清人民笑逐颜开，这时，第四专区也迁回临清原址。由于原四区专员赵仁泉丢下的专区老班底已严重残缺不全，这个烂摊子怎么收拾呢？这时上级党组织指示我们，要趁此有利时机，逐渐地对四区工作人员进行大量充实加强。起初在第四区工作的人员仅有赵效三、丁哲民、吕焯显、顾恒、赵文卿和我等为数很少的几个同志，为了迅速开创新局面，经与“临清党团”刘志坚、郭少英等负责同志研究，并经与韩专员磋商同意，我们从冀南和六区政治部（聊城），陆续要了一批干

部，其中有解彭年、朱穆之、董光（尉景平）、苏卜光、伍光亚、李敬之、白光（韩哲一）、郭鲁、李唯真（张素曦）、阮贯之、杨固（女）、吴鸿宾、李一平、赵景庭等十多位同志，这样就大大加强了党对四专区的统战工作的领导。这对于以后在接管与反接管和争夺四区领导权的斗争中，对于我们以沈鸿烈为首的反共顽固派的斗争中，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从而推动了四区工作的大发展。

（三）改组四区政治部

一九三八年五月底，我们接管并改组了原国民党时的四区保安司令部政治处，成立了政治部。撤免了反共的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临清县党部书记长谢炳如、宣传科长刘兰邇。改组后的主要领导和中层干部，大都是真诚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爱国人士、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以及同情者、同路人，尽管其中

仍有反共分子但已不是主要负责干部。当时四区政治部的主要干部及组成情况如下：

政治部主任赵效三（日本留学生，“民先”，不久入党，七月后被免职），郭鲁（共产党员，八月底任职）

秘书主任解彭年（日本留学生，共产党员），英文秘书朱穆之（北大学生，记者，不久入党）。

组织科（对外称指导科）科长吕仲华（即吕振华，抗大学员，共产党员）。后白光（即韩哲一，老共产党员）。组织股长董光（尉景平，共产党员，当时的鲁西北特委组织部长）。训练股长苏卜光（抗战前的老共产党员，曾代理组织科长）。

宣传科科长伍光亚（共产党员）。股长李敬之（共产党员）。干事李一平（共产党员，后变节）。股长刘兰逊（CC分子）。民运科长丁哲民（共产党员，陕北云阳青训班学

员)。青年股长顾恆(黄川,青年军团学员,不久入党)。股长吴鸿宾(共产党员)。

总务科长周××(外号周大麻子,国民党员)。

专署庶务主任吕焯显(党的同情者和同路人,战前掩护过地下党员张伯英,在东平曾任韩的秘书)。

正因为政治部的主要成员多是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所以顽固派就叫嚷:“糟啦!‘民先’的进来了(当时党不公开,但“民先”公开),‘民后’被赶出去啦!”

(四) 成立四区军政干部训练所

一九三八年六月底成立了四区军政干部训练所,当时因干部不足,就由政治部主任赵效三同志兼任所长,解彭年和我分兼教务主任和训导主任,因为他俩实在离不开政治部,后我便由兼职转为专职,主持干训所工作。教务所

即由王仕杰(共产党员)负责,教务员有王鸾台等。学员分四个队,约三百人。在各队中均设政治指导员。一队(军事队)指导员李唯真(共产党员),二、三(均为教师和知识青年队)指导员阮贯之(共产党员)和赵景庭(“民先”),四队(女知青队)指导员杨固(女,共产党员,陕公学生,六区干部姚第鸿同志的爱人)干训所。党支部于七月中旬成立,支部书记吕仲华(振华),支部成员中还有李唯真、阮贯之,党支部成立后,在老干部中首先吸取了顾恒等同志入党,在学员中发展的党员有郑世彤、陶德铭(赵振清)、李力田、白云藩、徐鸿泽等多位同志(其他同志我记不清了),后还将三同志送去延安学习。

授课人员及课程内容:赵效三讲军队中的政治工作;郭少英讲政治经济学;朱穆之讲时事形势;解彭年、吴宏宾讲统一战线;丁哲民讲群众运动;吕仲华讲游击战术;顾恒讲青年

工作；汪伯岩讲中国现代史。总之，四区军政干训所是我党在临清四专区举办的一所抗大式的干部学校，其性质与聊城干校同。关于学校名称问题，开始我们拟用“四区军政干部学校”的名称，由于韩专员担心目标太大，易遭沈鸿烈之妒，故才定名为干部训练所。

（五）介入战委会和动委会的调处斗争。

从八路军到达临清后，四专区所属各县均成立了战委会作为党的半政权性质的办事机关。这是民主政权建立前的必要步骤。与此同时，国民党也有所谓“动员会”的组织。从名称上看，战与动仅有一字之差，似无大的区别。但实际做法根本不同。战委会的行动口号就是“实行全面抗战，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人出人。”而动委会只限于县以下地区挂个牌子，安上几个人，开开会，讲讲演就算“动员”抗日了。而当群众真组织起来，拿起武器

走上抗日战场时，他们就叫喊要“政令统一”

“不要民众的枪！不要民众的钱！不要民众的人！”处处束缚群众的手脚。这个所谓的“动委会”实际上是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产物。因此，当时的战委会和动委会在鲁西北特别是在四专区各县互争领导权，势不两立，都要求韩专员和四专区政治部居间调停。这个任务首先就落到了政治部主任赵效三同志身上。效三同志当然坚决支持战委会。他代表政治部提出三项原则：（一）本着团结抗战的原则，战委会必须合并，双方各出同等人数组成统一机构；（二）为适应战争需要，各区也可以成立这一机构；（三）机构名称问题，因战委会、动委会的全称都以“战时”二字起首，统称战委会更为合适。调停的结果，头两项双方都接受了，不久区级的相应组织也建立起来了，唯机构名称问题，动委会不接受，双方仍

相持不下。对此，反共顽固派对赵效三的调处工作很反感，这也是赵效三同志被免职的重要原因之一。

（六）配合八路军展开津浦路大破袭

一九三八年八月，日寇南下进攻武汉，其时活动在华北敌后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为了保卫武汉，即由东进纵队发动了在津浦路的破袭大战。当时四专区和六专区武装在范、韩两专员的率领下也参加了此次战役，东纵部队负责打击德州方面出动之敌，四专区武装负责阻击平原、禹城之敌，并由各县保安团队带领群众负责破坏铁道和抬、埋、运走铁轨。六专区武装则负责拉拢，袭击济南、长清的敌人。当时日伪出动飞机、大炮机枪向我方扑来，我四专区武装在韩专员指挥下，奋勇阻击，“冯二皮”也赤膊上阵，大叫“奶奶的，狠揍小舅子！弟兄们！有种的跟我上，谁孬种我枪毙谁。”当时四专

区军民表现了高度的抗战热情，不到一年的工夫，从平原到禹城百余华里的津浦线全被破坏，胜利地完成了破袭任务，另外还拔除了平原车站至张庄的伪据点，活捉了维持会会长。是役大大鼓舞了敌后军民的抗战斗志，震撼了华北战场，也迟滞了敌人沿津浦路南进的时间。对于此次战役，驻天津日伪报纸也曾报导过，在我四专区工作的朱穆之、白光（韩哲一）、顾恒等同志均加了此次战役。还有我与苏卜光同志等也曾带领战地工作团负责过战地的联络和处理战俘工作等。对于伪维持会会长的处理，我们原拟教育后释放，但因工作中的失误，竟给他们造成了夺枪逃跑之机，并使我两战士被咬伤。后由于我方人员及时赶到，方将这伙人缚获，并予枪毙。

为宣传抗战必胜，批驳“亡国论”和“抗战必败论”，苏卜光、阮贯之和我三人还会多

次在临清《力报》和四专署《平民报》上写过抗战论文和战地通讯，现在我能记起的有《对抗战应有之认识》、《凯旋归来》等文章。

（七）扣押磨擦县长滕梅五

正当抗战军民应命在前线与日本侵略者作战斗之际，而临清的磨擦县长滕梅五却在后方乘机捣乱、制造了紧张空气破坏抗战团结的丑剧，以致引起了十六支队和羣众团体的普遍愤怒，纷纷上书四专区专员要求惩办滕梅五。时韩专员正在武城前线指挥所，当接到副官长严世荫的电话报告时，韩在盛怒之下表示要严厉处置滕梅五，但转念想到滕是沈鸿烈的亲信羽翼，又感到事情很棘手，此时我正好在场，专员商议于我。我便把临清人民早已告发滕梅五的罪状向韩作了如实汇报：（一）发国难之财，贪污修运河的巨款数万；（二）刁难八路军，拒拨给养，制造磨擦，破坏抗战；（三）克扣战

委会和救亡团体的口粮和办公费等（这是沈耀枢和郭少英等同志向我提供的情报）。专员一听更加震怒，当即拿起电话告诉严世荫：“快把滕梅五给我扣押起来！……”，滕梅五遂下狱。临清人民闻后无不拍手称快，唯有沈鸿烈捶胸顿足如丧考妣。到两个月后沈才设法将其鹰犬放了出来。

（八）在治政部和干训所的顽我大搏斗

自我们接管第四专区后，在接管与反接管的激烈斗争中，我们曾连连取胜。如撤免反共的政治部主任谢炳如，扣押磨擦县长滕梅五等，使四专区政治部和军政干训所完全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且在调处战委会和动委会的斗争中，支持了战委会，从而推动了四专区抗战形势的不断发展，初步形成了“四、六、八”密切合作的大好统战局面③。对此反共顽固派自然是不甘心的。因而顽我方面在四专区政治

部和军政干训所的斗争逐步升级，最后终于发展到赵效三同志被撤职和在干训所驱逐CC分子宁叔铭的大搏斗。

第一个回合是赵效三同志被免职的顽、我斗争。当时反共头子沈鸿烈为了挽回他们在四专区的权势，亲自策动了四专区参谋长黄烈、旅长吴连杰等，胁迫韩专员立即撤免政治部主任兼干训所所长赵效三的职务的阴谋。韩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得将赵效三同志免职，可顽固派并未就此罢休，在他们的黑名单上，连解彭年、朱穆之、吕仲华、丁哲民、苏卜光、顾恒等，也都被在打击除名之列。为此，一时在四专区政治部引起了混乱，同时纷纷要求韩收回撤职赵的成命。为了挽回效三同志被无辜免职的影响，我们政治部同志采取了以退为进、集体辞职的办法，以示反抗。由代理组织科长苏卜光同志亲自写了如下辞呈：“为呈请

辞职事，窃职等追随司令原为抗日救国，树立四区抗日政权，不图尸位素餐。数日于兹，而抗战主张未能实现，救亡工作不克挺进，若在尸高位，将何以对国家民族？职等思维再三唯有呈请辞职，另选贤能，免误职守，实为公便。谨呈司令韩。”当秘书主任解彭年和代理组织科长苏卜光向韩面交辞呈，并陈述了我们对效三同志被迫辞职的不满情绪时，韩甚为难，坚决不同意大家辞职，要求体谅他的困难处境，并恳求我们和他同心协力搞工作。韩深知，这种混乱不堪的政治局面，显然都是沈鸿烈一手制造的，为此，韩也向沈鸿烈递交了辞职报告，以示反抗。后经临清党团刘志坚等同志从夏津胡和道部密调了郭鲁同志来临清并接任了四区政治部主任，此次政治风潮才暂告平息。

第二回合是于训所爆发的驱逐反动所长宁叔铭的大搏斗。当赵效三被免职后，四专区于

训所所长一职曾一度被CC分子宁叔铭窃取。宁上任不久就假借专员名义要取消干训所的政治指导员制度，唯一“理由”就是“经费困难”。起初还是用商量的口气，尔后干脆下达指令，刻不容缓地逼我通知各队指导员“限期离校”。面对宁叔铭的挑战，经党支部商议，我们一方面表示“照办”，而暗中则秘密发动群众，准备“关起门打狗”，政治部也支持了我们的对策，于是一场声势很大的驱宁运动在干训所爆发了。学员们在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郑世彤、陶德铭、（赵振清）、李力田（李学理）、白云藩等同志的带动下，纷纷离开课堂找宁叔铭讲理，开始宁很神气，说：“学校领导上的事你们无权过问，快回教室去！”于是群情哗然，学员们把宁围起来质问：“你为什么要撤销我们的指导员？为什么压制抗战言论和抗日思想？是谁派你来破坏干

训所的？你讲……。大家气愤不过，有的举起拳头高喊，“打倒法西斯！驱逐宁叔铭！给他卷铺盖！”等口号，把宁叔铭这边推，那边搯，非叫他说出是谁叫他来捣乱的不可。宁叔铭筛了糠，哀求我替他向大家宣布：他承认错误，愿意收回成命。我表示“照办不误”，于是紧张局势开始缓和，宁叔铭满以为缓兵计已经成功，试图乘机溜走。不想黑漆大门早上了门栓，根本出不去，学员们继续围拢来轮番和他讲理，纷纷质问“为什么？”至此宁叔铭才明白这是“关门打狗”，他知道一切都完了，便搬出最后一招，即向我们弯腰屈膝，匍匐在地，向我们哭诉道：“我全错了！请饶恕我吧！我今后永不反动，我辞职……”学员们见状决定不再惩罚他，遂令其卷铺盖滚蛋。从此宁叔铭在临清销声匿迹，就在宁离开第三天的临清《力报》上，还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

四区军政干部训练所，从宁叔铭任职以来，倒行逆施，取消政治指导员，压制抗战言论和抗日民主思想，学员们纷纷离校……。

驱宁运动虽然取得了胜利，但顽我斗争并未停止，相反更加激烈了。四专区参谋长黄烈公然叫嚣非撂倒几个不可！”，扬言要派兵包围干训所。未过几天，干训所便发生了特务行凶夜袭训导处，殴打共产党员的严重事件。在此次事件中，指导员李唯真、杨固、阮贯之三同志遭暴徒追打，当暴徒们追到训导处，我出面制止时，也未能幸免。他们甚至在夜间向训导处鸣枪示威，叫喊：“‘民先’的滚出去，民后的进来！”有一次，我因事外出，被两名持枪暴徒追踪，幸有我党同志暗中保护，我才脱险。事后我把此事报告了韩专员，两名暴徒遂被开除。至此顽我大搏斗第二个回合才告结束。

（九）沈鸿烈大举反扑和我们撤离临清。

从干训所爆发驱宁运动后，尽管顽固派施尽了恐怖和暗杀手段，却并没有把我们吓倒，也未能“撂倒几个”，相反地我们却惩治了暴徒，而且把CC分子宁叔铭破坏抗战、捣乱干训所的罪行，在报纸上公开披露于众，并最终把宁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这一切对反共头子沈鸿烈来说自然是很不体面的，另外还有两件事也弄得沈鸿烈很狼狈，一是七月下旬在欢迎美国海军武官卡尔逊将军的群众大会上，卡热情地赞扬了韩多峯专员与八路军团结抗战的爱国主义精神。为此，台上台下一片欢腾。在热烈欢迎国际友人的同时，群众一面高呼：“拥护韩专员领导四区人民打鬼子保家乡！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人的出人！”；“四、六、六密切合作、打败日本侵略者！”而对沈鸿烈则高呼：“拥护沈主席抗战到底！”这不

同的掌声和口号分明是对沈鸿烈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谴责和惩罚。沈鸿烈在台上自感形秽，又挥手，又晃脑，妄图制止人们的呼喊声，但无人理他。二是在九月份为欢迎六专区专员范筑先将军而召开的大会上。会间群情激昂，高呼“欢迎劳苦功高的范专员！”、“拥护韩专员”和“四、六、八密切合作、团结抗战”等口号，而对沈鸿烈则只字不提。显然这是临清人民对他的再次谴责和惩罚，沈当时丑态百出，十分尴尬，哭笑不得。本来他当初委韩为四区专员，是企图笼络和利用韩多峯，在四专区安“楔子”，搞“以韩制范”，进而离间和牵制六区与冀南八路军的合作关系，但活生生的现实使他的幻想破灭了，实际情况表明，不是他在利用韩多峯制范筑先，而是韩多峯背靠八路军真诚地与范筑先联合公然与他作对。现在的韩多峯成了继范筑先之后他的又一

个“心腹大患”，沈鸿烈决心寻找时机，拔除这一大患。于是沈便纠集了其反动党羽胡学仁、黄烈、吴连杰和被韩下监的滕梅五以及军统特务张雪山（当时四区动委会主任）等，密谋策划了最后的大反扑。

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二日，时正值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一二九师在南宫联合召开冀、鲁两省联席会议，范、韩专员均应邀去南宫参加此次会议。沈鸿烈一看有机可乘，就搞了一个突然袭击，将韩免职，换上他的小舅子胡学仁（胡小鬼）继任四区专员。从此四区形势骤变，反共顽固派对我四区干部和共产党员，施展监视、威胁、拉拢等特务手段，进行迫害。据了解，当时密布于临清的中统军统、别动队和日特等特务分子多达二百余人。真可谓“黑云压城城欲摧”。是年十月初，四区政治部主任郭鲁同志传达了冀南区党委书记陈菁玉同志的紧急指

示：“凡是已经暴露目标的共产党员和负责干部，均一律撤离临清。”遂后，共产党干部便有计划地组织撤离。要撤离这对于多数同志来说是不困难的而由于我当时还在主持干训所工作，周围有很多进步青年，我要个人拔脚就走，不妥。于是我骑上自行车去聊城找到了六区政治部主任姚第鸿，经商议决定把干训所干部带到六专区干校去，而当我返回临清准备按计划把人带走时，当时临清县委书记郭少英同志却不同意，说：“你把干部都带走，这里的工作就只好坚持了。”他的意见很对，我遂决定只带少数同志走，但这时胡学仁又出捣乱，他说要集合听他“训话”，会上，他胡乱讲了一通“政治统一”和“三不要”④等陈词烂调，并要我安心好好工作等。当他刚离开会场，我便登上讲台驳其谬论，有的同志为我担心。事后，我兄吕焯显告诉我，胡学仁曾找他

谈：“从青岛出来的人都跟沈主席做事，你们弟兄俩为什么不跟？告诉你弟弟，他愿干什么都可以，可得听沈主席的话”，另外沈还妄图用婚事拴住我，这时丁哲民同志从南宫回来找我说：“区党委书记陈菁玉同志叫你赶快去南宫。”于是我和老丁还有干训所五大队副和一学员匆匆到了南宫。我俩在编辑部见到了组织部长于光汉同志。我遂被分配到冀南军区政治部代理教育科长兼敌伪除奸训练主任。老丁则分配到了“火炬”报社负责编辑工作。解彭年到了党校任教务主任。

一九三九年夏，我随徐向前、朱瑞领导的八路军一纵，由冀南赴鲁南，在临清和大峯山（鲁西区党委所在地）又与郭少英、张霖之、孙光等同志晤面，得悉韩多峯在被免职后，坚决不就任沈鸿烈所委任的山东保安处长之职，即由南宫回到聊城，并代替范筑先到阳谷说服

平息反共武装“忠孝团”搞兵变，此间还被反共武装打了黑枪，几至毙命。在敌人二次进犯聊城中，即是年十一月十五日，聊城失陷，范筑先、张郁光、姚第鸿等七百余人均壮烈牺牲，夏津县长李桂岭也在夏津死于敌人刺刀下。

在大峯山根据地时，张霖之同志曾试图留我在鲁西区工作，而朱瑞同志则找我谈城市工作，说中央在抓大城市工作。是年七月中旬山东分局派我去青岛做地下工作，从此久别临清四十五载，（1940年后我长期在胶东工作）。多年来我很怀念临清和当年在临清一起战斗工作的战友们。尔今少英、效三、彭年、哲民、贯之等同志均在十年动乱的历史灾难中先后故去。董光、伍光亚、李敬之、吕焯显则在1940年前后为国捐躯。

今年五月，韩多峯老人、苏卜光、顾恆和

我均应邀去临清参加党史座谈会，因考虑到韩老九十九岁的高龄，故未能如愿。当我们到达临清的第二天，又接到石家庄苏卜光同志的信（其子代笔），称卜光正在参加宁晋党史座谈会，因劳累过度，心脏病复发，病危住院，及至在我和顾恒离临清去聊城时，又传来了我尊敬的老战友，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战士，不幸溘然长逝的消息，噩耗传来，曷胜痛悼。

本文注释

①“旅陕山东同乡战地服务团”实系八路军应韩多峰先生的请求，派到第五战区和他搞统一战线的干部团。为便于在国统区隐蔽活动，故用灰色团体名义作掩护。

②“哭秦庭”是战国故事。楚国大将伍子胥为报楚王听信谎言斩抄满门之仇，他逃亡吴国求吴伐楚。楚国忠臣伍子胥的好友为了求秦救楚，在秦王大庭前哭了七天七夜，眼都哭瞎了，秦王倍受感动始发救兵。这和韩多峰为了抗日救国，当年在徐州请命杀敌，蒋介石拒不发委，韩向李宗仁挥泪陈词，悲愤欲绝，李始发委。两事恰成比喻，故引用之。

③“四、六、八密切合作”即四区（临清四专署），六区（聊城六专署）和冀南的八路密切合作抗战。这是我党针对反共顽固派破坏四、六、八的合作关系而制定的对策和方针。

④“三不要”是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其内容是：“不要民众的枪、不要民众的钱、不要民众的人”。这是顽固派针对我们当时提出的“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人的出人”的全民族抗战动员口号而来的。

一九八五年七月一日于山东艺术学院

（中共临清市委党史办公室供稿）

甘为春蚕吐丝尽

——记优秀共产党员、副校长季羨林

北京大学 校刊记者

一九八〇年四月，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正在演出印度古典名剧《沙恭达罗》。紫红色的帷幕拉开了，展现在观众面前的是古代印度人民的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观众被紧凑的剧情、精湛的表演，优美的台词深深吸引住了。

“太精彩了，表演好，语言也好。”

“谁翻译的？”

“说明书上不是有吗？季羨林。”

“谁是季羨林？”

“北京大学的一个教授。”

“你见过？”

“没有。”……

那些被《沙恭达罗》所陶醉的观众，是不会注意到的，就在他们中间，有一位年逾七旬，头发斑白的老人，他身着洗得发白的卡其衣裤，脚穿一双圆口布鞋，也在专心致志地观看演出。这位毫不惹人注目的老人就是《沙恭达罗》的翻译者、我国著名梵文专家、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共产党员季羨林同志。

执着的追求

季羨林一九一一年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今临清市）康庄镇官庄村一个农民家庭。小时候，他家的生活十分贫寒。幼年的季羨林和所有清贫的孩子一样，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七岁那年，季羨林告别了在家种地的父母，来到济南他叔父家中，得到了上学的机会。在济南他念完小学、中学，一九三〇年考

进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一九三五年考取了清华大学与德国交换的研究生，赴德国哥廷根大学深造。

年轻的季羨林，亲眼看到了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旧中国经济萧条，科学落后，文化凋零，人民生活穷困潦倒的悲惨景象，一股救国救民的热血在胸中沸腾。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亲身参加到无产阶级革命之中，而是选择了读书救国的道路。和旧中国大多数爱国的知识分子一样，他相信科学能够救中国，立志要学到知识为祖国服务。

正是这股爱国热情，化作他孜孜以求，苦学不辍的动力。在哥廷根大学，他以罕见的刻苦精神钻研梵文、巴利文和印度古代俗语，还学过俄语、南斯拉夫语和阿拉伯语。一九四一年他的论文通过，成为德国著名印度学家瓦尔特施米提的第一个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这时，

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激烈地进行。季羨林有国不能回，与家人的联系也中断了，只得继续留在那个小镇里。后来，季羨林又在八十多岁的西克教授的指导下学习吐火罗文和吠陀语。当时的环境无疑是十分恶劣的。没有东西吃，常常饿得晕头转向，飞机声震动着全城，仿佛在散布着死亡……。可季羨林依然在机声嗡嗡，饥肠辘辘中终日伏案，同那些极端枯燥的死文字拚命，终于在吐火罗文的研究上同样取得了出色的成绩。

在德国的十年，他写出了《中古印度语语尾—am向—o和—u的转变》，《作为判定佛经的年代与来源标准的动词不定式的应用问题》等三篇学术水平很高的论文，在世界梵文学界和语言学界受到广泛的重视。直到今天，外国学者提到季羨林的时候还总要说他“以中古印度语形态学方面的伟大成就而闻名于世”。

在德国的十年，祖国，这伟大的字眼，时苦萦绕在季羨林的脑际，牵动着他的缕缕情思。一九三七年他在日记中写道：“最近老想故国，我真的要回去了。也许我有点神经质，一个住在德国的中国人到处遇到的只有轻蔑，精神上是真痛苦的，何况故国又时来入梦呢？”他看到哥廷根城零星的海棠花，就以为回到了祖国。祖国，不是到处都有海棠花吗？

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他再也忍耐不下去了，终于克服重重困难，放弃了最心爱的却无法携带的书籍，于一九四六年五月辗转回到了祖国，同年九月，他来到北京大学任教授兼任新建立的东语系主任。此时此刻，他的心情是十分欢愉的。他踌躇满志，准备为繁荣和发展祖国科学文化事业大干一场，把自己学到的知识奉献给祖国。

可是，反动腐朽的国民党政府，根本不重

视科学事业的发展。当时的北京大学东语系，也只有一块空招牌，仅有三、四个教员，六、七名学生，全系开会，只有十平方米大小的房间就能坐下。而且，“洋”气充斥着学术界，仿佛月亮都是外国的圆。看到的这种现象，季羨林撰文大声疾呼：“我们不应自安于追踪别人，我们也要去研究，让外国学者也跟着我们走。”

然而，尽管季羨林一再呼吁重视东方语文的研究，可是在解放前两三年里始终无人理睬。季羨林的报国之心受到很大摧残。他开始冷静思考了，进步的学生运动也给了他启迪。他终于悟出了这样的道理，靠国民党统治，祖国不会有光明的前途，靠读书，也拯救不了祖国。从此，他开始了新的追求，寻找新的希冀。

解放了，北京大学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季

羨林和北大许多师生一起，冒着风沙去欢迎解放军。解放初期，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中国共产党的负责人到北大讲演，季羨林总是积极参加听讲。他亲眼看到共产党的干部刻苦、朴实、坦白的作风而由衷钦佩；看到共产党人“出生入死十年二十年，现在成了功，却依然敝衣菲食，毫无骄气”而深受感动；看到解放后很短的时间里，中国一百年以来的混乱局面已经结束而感到未来是一片光明。这一切，特别是与国民党的腐朽统治相比，使他从共产党身上看到了希望，逐步认识到，唯有共产党，才能给祖国和自己带来新生。他暗暗地把共产党员作为学习的榜样，他要向他们看齐，要做他们那样的人。他没有革命斗争的实践，便以饱满的热情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政治理论。理论的武装，使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他不满足于做一个怀有朴素爱国之心的知识分子

了，他要追随中国共产党，投身于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洪流之中。

一九五〇年，他庄严地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的要求。从此，他在行动中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改造世界观，积极创造入党的条件，以坚定的信念朝气蓬勃地向党的大门迈进。

信仰的力量

一九五六年四月四日，北京大学俄文楼的一间大教室里，正在召开发展新党员的支部大会。会上，季羨林激动地宣读了入党志愿书，立下了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誓言。这一天，他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

自此以后，他时时、事事、处处注意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自觉地加强党性修养，无论在顺利的情况下还是身处逆境之中，

他都坚信党的事业是必胜的，始终没有动摇对党的信念。

季羨林常说：“党员对待组织生活，应该象过节一样。”多年来，他一直坚持参加党支部组织生活，即使有什么重要的会议和活动不能参加，也要及时向党支部请假。一次，周总理请他去赴宴，适逢当天要过组织生活。他拿着请柬，到处找党支部书记，坚持请好假才去赴宴。去年，他到德国访问，归来后不顾旅途的劳累，第二天就上了班，下午就参加组织生活。对校内外兼职多、工作会议繁忙的季羨林来说，能够坚持过党的组织生活，确实有一定的困难，但他却说：“忙和累是事实，但绝不能作为不参加组织生活的口实。党员如果把组织生活都看成负担，那还叫什么共产党员呢？”

季羨林虽然担任系主任、副校长等职务，但从不以领导者自居，更不摆名人专家的架

子，而是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出现在同志中间。有一个时期，每天早晨东语系教工自己清扫外文楼道的卫生，季羨林总是赶来和大家一起清扫。同志们看他年纪老，工作忙，都劝他不要来了，但他照常参加。后来，同志们把打扫卫生的时间偷偷地提前了。没过两天，季羨林发现了这个秘密，他的身影又出现在打扫卫生的行列之中。社会科学院为南亚研究所配备了一辆上海牌小轿车，他从不因私事坐公家的车。他说，一个共产党员不能公私不分啊！

一个共产党员在入党时立下的誓言并不困难，难的是一辈子都能坚持誓言，用实际行动去实践誓言。“文革”期间，季羨林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被加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被抄家，游斗，批判，遭受一次又一次残酷折磨和毒打，有时甚至被打得昏迷过去，最后，又被关进了“牛

棚”。但是，季羨林坚信党，坚信自己的问题一定会搞清楚，从未对党发生过怀疑。“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他喜欢雪莱的诗，常常在心中默诵着。正是靠这种坚定的信念，使他承受了各种侮辱和折磨，坚强地走过来了。当时，被关进“牛棚”的人是没有资格交党费的，人身也失去了自由。但他怀着一颗对党的赤诚之心，依然在默默地履行着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他一遍又一遍地叮嘱自己七十多岁的婶母在每月领取生活费时，千万不要忘记把党费留出来，替他向党组织交纳。一九七三年，他的所谓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但当他领到第一批补发的一千五百元工资时，立即把这笔钱作为党费全部交给了党组织。

春天终于来到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季羨林和全国人民一样，享受了第二次解放的喜悦。强加在他头上的那些诬陷不实之词被推

翻了，他又重新担任了东语系主任，接着又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和南亚所所长。他决心在党的领导下，为繁荣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

春天虽然来了，但难免还会出现一些小小的寒流。前几年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教育界也有人提出“教授治校”的主张。季羨林意识到，这是一种摆脱党的领导的倾向。在一次组织生活会上，他旗帜鲜明地说：“根据我一生的体会，社会主义大学只能由共产党来领导。教授、专家的作用固然应该充分发挥，但决不能摆脱共产党的领导。”

一心为公 为党分忧

由于十年内乱和“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使我们党的许多优良作风遭到了破坏。有些共

产党员置党的纪律于不顾，在资产阶级歪风邪气面前低了头，有的甚至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气节。对此季羨林深感痛心。他想到了解放初期所见到的党的干部的形象，想到我们党所肩负的伟大使命，作为这个队伍中的一员，他决心用自己的模范行动来维护党的威信和声誉。

一九八〇年七月，他率代表团去日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国家给了他们十三万五千日元的外汇。他反复对代表团里负责财务的同志说：“目前国家财政有困难，社会主义建设又急需大量外汇，我们应该处处节省，多花不如少花，能不花的尽量不花。”在季羨林的带领下，大家省吃俭用，精打细算，为国家节省了十万多日元。同年秋天，他赴西德访问。西德一些学术界的老朋友劝他在德国多住几天，到处走一走，他婉言谢绝，在任务完成后，提前

回国了，又为国家节省了一笔外汇。近几年来，他先后三次出国，国家曾两次给他制服费，他都没有要。在日本访问时，日本的一些老朋友送给他一批礼物，其中包括收录机、照相机、金钟、手表和图书等，他都上交了。西德朋友要赠礼品给他，他说：“还是送给中国人民吧！”季羨林有一位亲戚给他写信，希望他能从国外带一台录音机回来，以便学习外语。对季羨林来说，这并非难事，他完全可以从节余的生活费中买一台带回来，然而他没有这样做。他的心中有一个十分清楚的概念：节省的外汇应该交给国家。为了支持后辈学习外语，回国后，他用自己的钱给这位亲戚买了一台录音机。

在平时生活中，他也总是为国家着想，替党分忧。季羨林一家三代四口人，至今仍然住着三间一套的普通的房子。三间房子，对于他

这样一位博学的教授来说实在太挤了。凡是到过他家的同志都会发现，每间房子里都布满了书架，从地面摆到房顶。屋子里挤得只剩下一条能过人的通道。他是一级教授，完全有理由提出扩大住房的要求。他非但自己不这样做，当有的同志想替他申请住房，学校主管部门也积极为他扩大住房时，他还说：“现在房子这么紧张，比我困难的同志还多得很，不要给组织找麻烦了，以后再说吧！”

近几年，国家财政有困难，号召集体和个人认购国库券。去年并没有个人认购的任务，季羨林仍主动认购了五千元，今年又认购一千元。他处处注意为国家节省开支，常用废讲义纸、旧日历、来信纸的反面抄写资料；他几乎每天都要收到国内外的来信来函，其中一大部分是因公而来，但他从来是用自己的信封，邮票回信。

凡是同季羨林打过交道的人都会感到，他是那样平易近人，衣着是那样朴素，说起话来是那样诚恳热情，以至不认识他的人往往称他“老师傅”、“老大爷”。

一九七九年新生入学，一位外地新同学来到外文楼，委托一位“老师傅”给他看行李，自己兴高彩烈地报到去了。等到开学典礼，这位同学才发现那位给他看行李的“老师傅”原来是季副校长。

今年十月，学校举行李大钊、蔡元培铜像落成典礼，校领导陪同中央首长和来宾来到会场，季羨林还是同平时一样身着朴素的衣着去参加典礼。一位不认识他的学生以为他是参加造像的工人代表，就带他到后排的座位上。他不声不响地坐下来参加了会议。后来，当同学们知道他是季副校长时，都啧啧称道。

几十年来，季羨林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

生活作风，他努力向工农看齐，象他们一样生活，他没有几件象样的衣服。除了那套出国和参加外事活动穿的中山装外，大部分是布衣布衫。以前，他的鞋，棉衣都由他老伴自己缝制。他家的伙食也十分简单。清晨，季羨林一人起床后，打开火烤上几片馒头或面包干，吃点花生豆，酱菜，喝上一杯茶就开始工作了，即便是正餐，也非常一般。前几年，他孙子在家住，他每年要领着孙子去挖几次野菜尝尝，也经常吃点窝窝头。他告诉孙子，爷爷小时候就是吃这长大的，你们不要忘了。在他家里，看不到名贵的装饰品，更没有新颖时髦的家具，甚至连一对普通的沙发都没有。

也许有的同志不能理解他为什么如此“小气”，“寒酸”，对自己的生活如此苛刻。季羨林自己说过：“人民给我的太多了，我给人民的太少了”，“钱是人民的，我的享受已经

超过了人民，应该把多余的钱还给人民”。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他的家乡山东农村的文化教育水平比较低，季羨林早就准备在他出生的大队和大队小学建立两个图书室。多年来，他坚持每年为家乡寄书。现在已经没有人能精确地说出这些图书的数目了，但仅从小学前几年的编目来看，就已超过了一千册。今年暑假，他利用到济南开会的机会，又亲自返回故乡，给家乡人民带去了一包书籍。他还曾给大队寄去三百元，资助大队兴办合作医疗和发展文化教育。

南亚研究所在北京召开学术会议，会务费比较紧张，有人主张再向上级申请，季羨林说：“不用了”。他拿出自己的几百元，补充了会务费。

他拿出了四百元钱交给东语系办公室，用于系里学生体育竞赛、文艺活动等额外开支。

今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他三十多万字的《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他向出版社说明，分文不要应得的几千元稿酬……。

南亚所汽车司机杨师傅的岳父病了，季羨林挂在心上。一天，他外出乘杨师傅开的车回来。下车后，杨师傅发现座位上还有一包点心，就赶忙说：“季先生，您的东西落下了”。说着随手把点心递给季羨林。季羨林摆了摆手说：“听说你岳父病了，我抽不出空儿去看望他，这包点心是给您岳父吃的，请您转交给他。”

这样的事情是写不全的，大到几千元的稿酬，小到一包点心，这一个个数字，一件件小事，看起来是那样平常，然而这里都映衬着季羨林这位共产党员金子般的心！

把知识无私地献给党的事业

一九七三年，正是四害横行的年月，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受到严重摧残。季羨林这位学识卓著的教授，戴着“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被发落到学生宿舍楼看电话，收发报纸信件，他所熟悉、热爱的业务工作不能进行了，代之而来的是繁重的体力劳动和烦人的日常事务。当时，这位老教授的心是多么沉痛啊！他深深地为祖国的前途和命运而担忧。但是，他没有消沉，没有颓唐，他依然在奋力抗争。在那些日子里，他除去努力做好规定的工作外，还默默地剪贴、搜集了大量报纸上登载的有关印度的资料；也是在那个时候，他开始翻译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罗摩衍那》。《罗摩衍那》在印度文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对东南亚和我国也有影响，在我国新疆发现的古和阗文的残卷中，就有《罗摩衍那》，藏文和蒙文也都有《罗摩衍那》的故事。世界

上已有多种文字的《罗摩衍那》译本，但却没有中文译本。这部有两万多首诗的宏篇巨著，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古代印度社会的各个方面，加上情节复杂，头绪纷繁，人物众多，给翻译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即使象季羨林这样的学者，要完成这件工作也并非易事。然而，当时已六十多岁、身处“靠边站”逆境之中的季羨林，却以顽强的意志和惊人的毅力向这一浩大的工程宣战了。这是怎样的工作啊！他得不到应有的支持，更不能配合助手，时间上也沒有充分的保证。上班时，他不能把原书带到工作室，只能每天把一段抄在小纸条上，在干其他事情之余，进行思考，构思，打腹稿；下班后，再赶紧用文字记载下来。就这样，他整整经过五年的艰苦努力，付出了巨大劳动，终于完成了《罗摩衍那》的全部翻译工作，并于一九八〇年出版了第一卷。目前，第二卷、第三

卷、第四卷也已与读者见面，到一九八五年，将分七卷出齐。《罗摩衍那》中译本的首次出版，是我国文学翻译工作的一个重大成就，受到国际梵文学者和印度文化界的高度评价。

粉碎四人帮，祖国的科学教育战线又充满了明媚的春光。季羨林虽已年届古稀，仍然朝气蓬勃，焕发着青春的活力。他在《朗润集》自序中写道：“我虽然已经有了一把子年纪，但在老年人中间还算是年幼的，我既不伤春，也不悲秋，既无老之可叹，也无贫之可嗟。生当盛世，唯一的希望就是多活许多年，多做许多事情。……今天，中国绝大部分的老年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越活越年轻，他们都有信心看到四个现代化的完成，也将尽上自己的绵薄，促其完成，鞠躬尽瘁，老而不已。”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现着自己的诺言。今年春天，有关单位的同志来到季羨林的办公

室，请求他帮助整理研究在新疆发现的吐火罗文残卷。吐火罗文是我国古代西域的一种文字，在世界上也很少有人懂得，研究起来更是困难。有人说，读吐火罗文，如读天书一般。季羨林在德国学习过吐火罗文。回国后，由于没有资料，再也没接触过它。新疆发现了吐火罗文残卷后，有的外国学者想出高价收买这些残卷，有的说什么：“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外国。”听到这些言论，季羨林无比气愤。他深深感到，摆在面前的不是一些普通的残卷，它直接关系到祖国的荣誉，民族的尊严。他决定暂时放下其他的工作，开始了吐火罗文残卷的研究工作。三十多年没有接触了，季羨林又已是七十多岁的高龄，工作起来确实非常困难。但为国争气的信念时刻在鼓舞、激励着他。为了研究工作，他翻阅了大量资料，重新复习吐火罗文，每天勤奋工作，甚至达到

废寝忘食的程度。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他写出了题为《吐火罗文 A 中的三十二相》的学术水平很高的论文。有的学者给季羨林的贺信中说：“这篇文章发表之后，让有关的外国人知道我国建国以来，不仅在吐火罗文 A 的文书文物中有远远超过以前的大量重要发现，而且我国的专家学者们正在从事外国人根本想不到的工作。”最近，季羨林又一篇关于吐火罗文研究的论文《漫谈新疆博物馆吐火罗文 A〈弥勒会见记剧本〉》又正式发表。

季羨林说过，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把自己掌握的知识全部无私地献给党和人民。他把自己的具体工作和整个党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二十多年来，他以一人之力，又只是作为自己工作的一部分，共翻译出三百万言之多的梵文文学作品，写下了几十万字的梵文文学方面的论

文，这在近代国际梵文学者中是不多见的。在印度历史方面，他发表过专著《印度简史》、《一八五七至一八五九年印度民族起义》。对许多前人没有注意到或没有解决过的有关印度历史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作了科学的探讨。在中印文化史方面，他写下了大量的论文，出版了论文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填补了中国科技文化对印度影响这个几乎是空白的研究领域，解决了我国佛经翻译史和古音韵学研究方面两个长期存在的难题。在比较文学研究方面，他亲自倡导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比较文学研究会，以推动我们起步比较晚的比较文学研究。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发表过多篇论文。在繁忙的工作中，他还抽暇写下了大量的优秀散文。他历来反对文学创作中的自由化倾向。解放以来他创作的散文，风格清新，文字优美，格调昂扬，充满着乐观主义精神。

近年来，已出版的《朗润集》、《天竺心影》、《季羨林选集》三部散文集，给社会主义文学的百花园里增添了一簇生意盎然的鲜花。

季羨林长期担任着校、系、所的行政领导工作，身兼校内外四十多种职务。大量的行政事务，各种各样的会议，频繁的外事活动，络绎不绝的来信来访，占去了他的大量时间。那么，他是怎样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的呢？

清晨，启明星还没有消逝，时针正指在四点，季羨林已经起床开始工作了。他已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几十年如一日。因此，当别人上班时，他已工作了三、四个小时。他也没有午休的习惯，吃完饭，舒展一下身子便又开始工作。只是近年来他年岁大了，有时实在累了，就坐在藤椅上打个盹。他有严格的时间表。在时间的利用上，他有数学家的头脑，计算得清清楚楚。参加大小会议，他从不迟到；约人谈

话，他从不失约误时；就是在出差和开会的一点空暇时间，他也充分利用。不论是在隆隆前进的列车上，还是在碧空万里的飞机中，他都不停地思考，他的许多文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打腹稿的。前年，他到日本十天的紧张访问中，写下了几万字的散文手稿，有的已经整理发表。季羨林患有哮喘病，每年秋冬之交的季节就要犯病。他常常带病工作。有一次，他喘得实在厉害，不得不离开办公室，住了七天医院，但他仍不忘把书籍带到病房。他不能停止工作。他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工作习惯，常常同时进行几个题目的研究。一个题目做累了，就换另一个，调剂一下脑子。实在太累了，时间又零碎，他就构思写作散文。他说，用脑子就好象用刀子，常用一块地方，刀刃就迟钝了，换一个地方刀刃照样锋利。谈起季羨林的工作，他的老伴嗔怪地说：“羨林呀，什么都

好，就是工作起来不要命。”

诲人不倦育栋才

“长江后浪催前浪”，自然界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作为一名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教授，季羨林更感到教育、培养后学的紧迫和重要。他常说：“他对青年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总希望他们赶快成长。”他是辛勤的园丁，诲人不倦的良师，中青年知识分子的挚友。

尽管他工作繁忙，但他坚持不下教学第一线。一九六〇年，东语系招收了十七名学梵文、巴利文的学生，季羨林和金克木教授两人担负了这个班的教学任务。他讲授古典梵文、佛教混合梵文和巴利文，在整个五学年中，每周四学时。似这样一位一级教授从字母一直教到学生毕业，在北京大学甚至在全国恐怕也是少有的。现在这批学生多数成为我国梵文研究的

骨干。为了提高我国中青年梵文工作者的学术水平，去年十月，他亲自倡议每月举行一次老中青梵文研究工作者学术交流会，并总是带头把自己了解到的国际梵文研究动态和自己的研究体会介绍给大家。对这样的活动，季羨林非常重视，一年多来，除去有重要会议或活动，他从不缺席。

对中青年送来的研究论文和翻译文章，他都认真审阅。不仅从学术观点上经常提出一些重要的意见，连文章中的病句、错别字以至标点符号都一一帮助改正过来。一位中年研究人员在一篇文章中，由于书写的习惯，往往把“j”写成“i”，季羨林看后，一定让那位同志改过来，并说：“这样不行，一定要尊重编辑和排字工人的劳动。不能由于自己工作的疏忽，给他人造成麻烦。”一位研究生写了一篇论文交给季羨林审阅。当时，季羨林每天都

有会。这位研究生以为季羨林一定要很长时间才能看完。可他沒有想到，仅仅过了三天，季羨林就把这篇文章退还给他，而且认真地看了几遍，提出许多修改意见。

有一个时期，留在东语系工作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毕业和入学的青年教师思想有些活动，压力也很大。在一次座谈会上，他热情地鼓励青年教师尽快地提高业务水平，努力赶上去，不但专业课要学好，而且还要扩大知识面。系主任的一席话，温暖了青年教师的心，使他们至今仍记忆犹新。东语系还为青年教师具体制定了补课计划，给他们规定业务进修的时间。现在，这批青年教师正迅速成长起来，成为教学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由于季羨林学识丰富，造诣精深，向他求教的青年很多。他不管校内校外都一视同仁。江苏一位农村中学的青年教师很喜欢散文，向他

写信请教。季季林热情地回信，并寄去他的散文集，请这位教师指正。一次他发现一个主要刊登青年作品的刊物上，有一首诗用错了一个字，第二天就主动写信帮助改正。今年五月的一天下午，中文系一位八〇年的同学到他家里向他请教一些文学上的问题。季羨林热情接待了他。对于学生提出的问题，他一一给予回答。从文艺创作到文艺评论，从文艺创作的历史到现状，从文艺创作的源泉到作者的世界观改造，从学生的业务学习到青年人应树立的理想，涉及的范围很广泛。这两代知识分子的亲切交谈，一直延续了三、四个小时。季羨林还把自己的两本散文集赠给这位同学，并亲笔在书的扉字写上“请指正”的字样。当这位同学告辞时，天下起了小雨。季羨林不顾这位同学的劝阻，坚持把他送到门外。这位同学骑车走得很远了，季羨林还站在蒙蒙细雨中目送着他。

季羨林的治学态度是十分严谨的。他反对那种看风使舵、变戏法式的所谓研究及东拼西凑、“炒冷饭”、夸夸其谈的文章，更厌恶剽窃别人材料和研究成果的恶劣行径。他每研究一个问题，搜集材料不厌其繁，务求其全；分析比较，不厌其详，务求其精；写好文章反复修改，务求其美，大到立论是否站得住脚，小到材料是否核实，决不马虎从事。最近，他在写关于“糖”的历史的文章中，有一个问题搞不清楚，就到处求教，终于在一位著名老中医的帮助下解决了疑难。他非常尊重别人的劳动，在他的文章和专著中，凡引用他人的成果和材料都注明出处，哪位同志对他有过帮助，他也要一一注明。一次出版一本书时，编辑建议把后记删去，但他宁肯删去自己写的正文，也要保留后记，因为在后记中，提到了曾经帮助过他的一些同志的名字。季羨林不仅自己讲学术道

德，而且要求他的学生尊重学术道德。一次，他的一个研究生写文反驳不同意见时，用了“荒谬”一词，他不同意，说用这样的词不利于团结。另一位同志准备写文批驳不同意见，他反复嘱咐，不要点人家的名，要真诚地讨论问题。他的研究生感慨地说：“我们有季先生这样的导师是很幸运的。跟着他，他们不仅学到了知识，更学会了怎样做人。”

季羨林是从一个农民的儿子成长为一位知名的学者教授，从一位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把自己的知识和才华无私地奉献给祖国和人民，他的崇高品质和共产主义精神受到同志们的赞扬，去年，他被评为我校的好党员，前不久，又出席了北京市第五届党代表大会。这里不是在全面总结季羨林所走过的道路，所展现的只不过是他在生中的几个侧面。然而仅仅是这些，不足以看

到人类最宝贵、最闪光的东西吗？人们总是喜欢用春蚕来赞美为党和人民献身的精神，季羨林不正是一位具有春蚕精神的共产党员吗？如果我们共产党员，都具有这种春蚕精神，那末，我们党和祖国的前途必将更加灿烂辉煌。让我们为春蚕精神高唱一曲赞歌，让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发扬春蚕精神吧！

（转自《北京大学校刊》第317期）

我的伯父沙月坡

沙 星 五

我的伯父名明远，字月坡，山东省临清市人，回族，出生于1879年农历正月初八日。其祖父沙允吉在太平天国时死难，祖母黑氏生遗腹子沙炳。沙炳娶妻，生四男一女，伯父系次子。沙炳在十二岁时到临清城内一杂货店学徒，后以小贩为生。

伯父年幼好学，但因家贫，无力求师，幸得众亲近邻资助，进私塾就读，学识逐年长进。会逢县考，伯父应试，名列榜首，名声大振。当时其父沙炳贩卖亏本，无力偿还债务，被法院拘留。伯父只好卖掉拔贡功名，得银偿清债务，救父出狱。后来，废除科举制。伯父考入济南优

级师范，毕业后到山东聊城第三师范任教员。伯父精通文史，讲课时，能引人入胜，犹如高山流水，深受学生的尊敬。

伯父中年时，值北洋军阀割据，北洋军阀搞国会议员选举。伯父得到鲁西各界人士的信赖，被推举为议员，到了北京。可是，当时政局动荡，国会腐化。伯父虽为国会议员，但无所作为。因谋生活，到当时教育部谋一职务。后会听伯父说，那时名士梁士诒企图用重金收买他为北京政客效劳，但遭到伯父的拒绝。

伯父察时度势，认为北京不是用武之地，乃投身冯玉祥将军麾下，当时，冯将军练兵南苑。冯将军虽戎马生涯，但虚心好学，尊重学人。伯父以中国文学、诗词、历史对冯将军讲授，更着重钻研历史名将克敌制胜的兵法。冯将军对伯父以师礼事之，乃成为座上客。由而

“沙老师”之名，在西北军中名闻遐迩。

1924年，北京政变后，冯将军被任为西北边防军督办，伯父随行。伯父在西北与回族首领马福祥结识，相交甚笃。冯将军驻兵西北，伯父多从马家势力圈内为冯将军斡旋。马家后人也对伯父很尊重。伯父在西北时，曾任绥远省教育厅长，绥远五族学院院长，甘肃省教育厅厅长。嗣后，又任陕西省教育厅厅长，豫东行政长，潼关督办等职，伯父当时还与西北军高级将领宋哲元、吉鸿昌、石敬亭结拜兄弟，订立金兰之谱，伯父从而成为西北军政界中重要人物之一。

迨至1926年，冯玉祥将军五原誓师，改称国民军，进军陕西省、河南省与北伐军相呼应。这时局势好转。石敬亭任山东省省长。伯父被任为山东省硝磺矿总局局长。此后，蒋介石叛变革命，开始反共。伯父曾公开抨击蒋介石

石的国民政府所标榜的“三民主义”，并非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南京国民政府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是要民众成为小卒也。民权主义是要民众无权喘息也。民生主义是要民众牺牲也。这是祸国主义，民无生路，国难振兴，实堪悲痛。因此，伯父为当时政界所不容，从而息隐家园。

在韩复榘主政山东时，伯父被聘为参议之职。在此期间，伯父力抨时弊。济南有些部门请伯父演说。伯父演讲内容，多为针贬时政，广为乐道。后来，伯父提议成立进德会，教育民众，得到韩复榘的同意。临清成立进德会时，韩复榘命伯父回乡主持。伯父衔命回乡。适逢临清县县长徐子尚力主清查无粮黑地，加重地方课税负担。地方人士要求伯父仗义直言，稍解民困。为此，伯父走访乡长，了解情况后，在全县联庄会上和全县各界人士大会上

痛斥清查无粮黑地，加重民众负担的错误，转而，伯父把锋芒指向各区区长。伯父说：“区者，蛆也，此蛆之作祟也，县长可不为也”。群众听后，赞扬伯父方法巧妙。县长徐子尚迫不得已，将所收的税款，逐户退还，取得抗税斗争的胜利。各界人士曾刻碑记事。后因山东省财界要人王士荣等以影响山东财政收入为名，频加诋毁，伯父遭到攻击。

在此期间，韩复榘受命赴南昌晋见蒋介石，伯父随行南下。在南京得于右任先生邀请出任国立编译馆编审。后又得孙科先生延聘为中山文化教育馆特邀委员，受命撰写《宋明哲学》，此书脱稿后交南京市市长马超俊审核。但因抗战发生，此书稿下落不明。

伯父在南京期间曾为其在聊城第三师范任教时的学生李苦禅举办画展。伯父在南京《中央日报》上刊登举办画展的新闻报道一则，广

为宣传，使这次画展取得成功。

抗日战争发生后不久，济南沦陷。日本帝国主义者阴谋以“鲁人治鲁”之名，要伯父当汉奸，伯父严词拒绝，后才由马良任汉奸省长。马良要伯父任伪教育厅厅长，伯父以佛教协会会长为护身符，予以拒绝。后为生活所迫，担任济南女子师范教员。当时，伯父主张创办职业学校，乃与济南青年会总干事郭清甫创办济南惠鲁工商专科学校。这一时期是伯父一生荣辱的转折点，伯父在民族大节的关键时刻，明辨大是大非，决定进退，不辱民族气节，深为明智。

抗日战争胜利后，伯父投奔解放区的家乡，回到临清时受到人民政府领导人和民众的盛大欢迎。

1949年10月应卫生部长李德全的邀请进京。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刘格平请伯父任

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

解放后，伯父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精神焕发。1950年10月1日，伯父应邀参加国庆观礼，当日情绪激动，兴奋异常，正欲出门赴会，突然脑溢血病发倒地，不省人事。当即报告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派专车，由我护送至医院抢救，经上级指示，不惜代价，全力治疗，经过四十六天的精心治疗，终因病重，与世长辞，时年七十一岁。经过料理由其子随车护送回临清牛八里村安葬。

伯父早年著有《冯督办略史》、《燕赵悲歌》、《宋明哲学》、《历代名人传》等。

伯父的一生，为人正直，平易近人，明是非，伸正气，逼邪恶，为人所景仰钦佩。

1987年7月写于北京

开展读书活动 传播革命火种

——尉迟修职同志在临的革命活动

尉迟修职同志，山东临清市白布巷人。一九一七年生。武训小学毕业后考入临清省立十一中学。初中毕业。一九三四年在济南齐鲁高中上学时，因组织同学反对国民党训育主任勾结教会势力镇压进步学生，被开除。一九三四年秋，又考入北平河北省立高中（即现在地安门中学）。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结识了张如三同学，并肩战斗近三年之久。一九三八年五月，在京郊因反对叛徒李望东投敌，被其杀害。牺牲时年仅二十一岁。

烈士成仁非一日之功。早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已

给这位初中二年级的热血青年以极大的刺激，他不满意学校以读死书压革命的思想统治，关心时事，大量阅读课外进步书刊，和校内外进步青年交换读书心得，讨论国家大事。他们读了《帝国主义侵华史》、《中国是怎样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高尔基的小说和鲁迅的杂文等。几个人合起来先后还订了《申报》、《新生》、《读书生活》、《世界知识》、《文学》、《北斗》等报刊。看后互相介绍，交流心得体会。特别在《申报》《自由谈》上鲁迅先生用变化着的笔名发表的文章，是他们的指路明灯。

一九三四年修职暑假归来时向我们介绍了《申报》上新开辟的《妇女园地》副刊。它是上海文化界妇运领袖沈兹九主编的，党派地下党员杜君慧同志协助编辑，是当时最进步的妇女读物。这星星之火经修职之手传播到临清，

立即在知识妇女中燃烧起不灭的火种。

《妇女园地》是周刊、连载的《妇女问题讲话》（作者杜君慧）是一篇很通俗的妇女问题理论文章，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说明妇女问题产生的根源，指出只有变革社会制度，才能使广大劳动妇女得到彻底解放。于是我们把每期《妇女问题讲话》剪下来装订好，介绍给当时在临清妇女界已深有影响的黑若仙同志。到1935年7月1日，《妇女园地》停刊，改出《妇女生活》月刊时，没有及时订阅。还是修职在后来的几个假期，从北平陆续给我们带来的。

自从一九三四年秋修职到北平上学后，他的思想又有了新的飞跃：从爱读文学作品转到革命理论的学习，同时投身到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去，忘掉一切，以身许国，奋不顾身。这以后每当他假期回家，就组织张铁、李翰文、张

光第、王瑞征、徐培仁、徐培义、迟修芬等人，学唱《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工人歌》、《救亡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革命歌曲。边走边唱边讲，使我们对北平学运和学生向蒋介石的宪兵作斗争的情况有所了解。

一九三五年暑假，他带来了《中国农村》月刊（薛暮桥主编）。这个刊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农村阶级斗争形势，并不断批判和揭露山东梁漱溟，山西的阎锡山用改良主义抵制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政策的阴谋。由于《中国农村》在临清的传播，使有些深受“乡建派”思想毒害的人觉醒过来。

就在这年十二月，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震撼全国，上海生活书店的《大众生活》周刊首先响应。由于修职同志的关系，我们对学生运动的发展极为关注，我们给生活书店去信，联系好代订代销。通过十一中进步教师李光家、

臧克家两同志向学生介绍订阅了八十多份，另有四十份上街零售。张铁同志把《大众生活》放在百货车玻璃柜里，走街串乡，沿途销售。我们读着《大众生活》上的北平学生通讯，心急如焚地盼望着尉迟修职同志能安全归来。

一九三六年一月将尽的一天下午，修职同志果然提着一个大号柳条箱回到故乡。打开柳条箱，掀去上面盖着的几件单衣，下面是满满的一箱书。原来他是参加运动之后领了北平学联“扩大宣传”的任务，携带着北平河北高中同学们捐赠大批书刊回来的。这些书，大部分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社会科学普及读物。有《左派幼稚病》、《叛徒考茨基》、《列宁主义基础》、《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法国巴比塞著徐懋庸译），还有宣传抗日救亡的书刊和新文字小册子等。

他从斗争实践中，进一步认识到女同志在

革命的半边天作用和发动妇女的重要性，光他这次带来的妇女读物就有《妇女问题讲话》、《妇人与社会》、《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古代社会》等。还有近期出版的《妇女生活》。这些书刊为半年后黑菩仙、刘慧溪同志编辑《妇女》周刊准备了思想宝库，并进而使我们受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教育。

这些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禁书”是怎样冲过沿途车站军警盘查的呢？于是就问他，他却轻松地淡淡一笑说：“被查到的多是在现场神情慌乱的胆小鬼。你只要大模大样理直气壮地从他身边走过，或者干脆把东西朝他面前一搁，他却理也不理，把手一挥，放行了。”

这次回来，修职同志一再叮嘱：“我们可不能辜负了北平同学节省自己的生活费，捐钱捐书对我们的热切期望。要让这些书在我县以最快的速度流通开，发挥最大的作用。”他又

和王瑞征、张铁、张光第、徐培仁、李翰文、徐培义等同志研究，成立了个地下巡回图书馆，开展读书活动。有个同学张丙俊，他家在青碗市口北开了个“正大派报社”，那时邮局不负责报纸的发行投递，大县才有个私人的报纸代销点。张丙俊的两个哥哥都是投递员。我们的图书馆就借用了“正大派报社图书巡回部”的名义。给新发展的读者送书刊，就由他两个哥哥送报时投递；对老读者了解政治面貌和思想情况的，就由徐培仁、徐培义送去。修职和我们还共同给图书馆拟定了几条章程：一、本部图书，免费借阅；二、由派报社投递员义务送书上门；三、根据书刊页数，由本部定出阅读期限；四、看完后必须写一篇读后感；五、不定期召开读书心得交流会。

一九三六年初，寒假将尽，开学在即，当修职要回北平的前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到他家

送行。他那临别赠言，回荡人心。因送行人多，他又忙于辞婚和母亲恳切的谈话不便和我们详谈，但他还是抽空到外间屋伏在方桌上用铅笔给我们写了几个字：“书，是我们宝贵的生命！”不料这次送别，竟成了永诀！他走后不久，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派来特务查抄《大众生活》订户。因这时《大众生活》已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勒令停刊。特务们趁火打劫说《大众生活》是共产党上海的机关刊物。在县邮局查出“休刊通知信”，即按名抓人。当天即抓走荆林六、高傅蕴山老师和十一中學生赵兴汉、于寿增等七八人。可是到三元阁六十八号王瑞征家（图书馆全部书刊都在这里）抓顾万音时，政务警长却只好回衙向特务报告，“遍查并无此人”。人没抓走，但已危及这批书刊的安全，这时我们怎能忘记修职同志临别的嘱托，于是同志们挺身而出，有张铁、李翰文、徐培仁、迟修

芬等，当夜即不顾一切地把这批图书抢救出来。采取分散借阅，分散保存。抢救书刊的第二天，有个被捕的学生泄了密，特务亲临抄家，把同志们检查剩下的一部分一般性书籍抄走，还有清朝办街道民团放在那里的红缨枪和“双手带”大刀、用人力车四辆拉走，声言是“共产党要暴动”。可是无真凭实据，只是虚张声势罢了。把王瑞征抓去砸镣下狱二十八天，在特务主持下“三堂会审”，但是查无实据，又无口供，而《大众生活》不久即改名《永生》仍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给《大众生活》原订户陆续寄来，王瑞征被“取保开释”了。

这次假期回家他的四弟修芬，在武训小学高十七级。修职在家已带他参加一些活动，走时还向我们介绍说：“我这个小弟弟，年龄不大，却很少私心杂念已开始接受革命思想。我走后，请你们继续帮助他进步。”王瑞征出狱

后，就把劫后余下的一部分书捐赠给武训小学图书馆。其中有一部分《新青年》杂志，这是叶圣陶先生主编的《中学生》杂志的姊妹刊，是以小学高年级、初中低年级学生为对象出版的。课内外并重，内容是比较先进的。另外还订了丁浩川、祁志贤供稿在北平编印的《小学生短波》和《教育短波》，还有上海的《儿童日报》、《生活教育》、《妇女生活》等报刊。于是就以修芬为首，把思想进步的同学组织起来，办壁报，开展读书活动。当时参加的有徐培礼、洪维才、徐继禹、刘云祯、丁广才、赵恒惕、王之藩等，一九三七年清明节，武训小学组织自行车远足旅行，几位同学也到柳林武训小学去参观，和徐运北同志联系并学习了他们办“抗战壁报”的先进经验；三七年暑假，把迟修芬、徐培礼、徐继禹三个同学介绍到西南关小学黑若仙、李葵元、刘慧溪那

里去（这里已是临清特支和《临清日报》副刊编辑部）进一步学习革命书刊，开展适合青少年特点的活动。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今天我们回忆起来，烈士最后一次返里，也就是住了二十多天，却做了这么多工作：成立了巡回图书馆，动员邻居人力车工人参加抗日救亡，通过李翰文同志发动电话局工人罢工并取得了胜利，说服家庭给自己退婚（准备以身许国，不给家庭增加负担，也减少自己后顾之忧。）

因为时间是那么短促，虽然这些工作好象只开了个头，可影响是深远的。好多方面成为我们以后工作的动力。他播下的种子生根开花了。一九三六年秋到一九三七年九月，黑若仙、刘慧溪同志主要以他带来的妇女书刊为武器，在丁浩川同志主编的《临清日报》上办起了《妇女》周刊，团结了广大知识妇女，其中

不少同志成为三八年妇救会的骨干；由于他的思想影响，使他的家庭成为典型的革命家庭，兄弟侄儿女们有十二个共产党员；他的家庭在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成为临清革命活动的中心。可见在我们这伟大的时代，，一个甘愿牺牲自己以身许国的革命志士，一个为人类取火种的人，他本身就是一团火，他那热能是多么强烈啊！走到那里，烧到那里。经久不息，越烧越旺。

本文有：张铁、李翰文、徐培仁、迟修东、迟修芬、迟修箴、陈普彬、王瑞征等口述

王瑞征执笔

省立十一中史略

鸿鹄 雏鹰

一、学校沿革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五月，经省议会议决，在临清设立第十一中学，校址在考棚街考院旧址。该校成立之初，范步瀛为校长，仅有两班学生，后逐渐增加，曾发展到五班学生。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张道镛继任校长，至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六月，该校一度被国民党第二集团军马鸿逵部占据。横遭摧残，设备荡然一空。是年十一月，张乾一（张元亨）为校长。学校随之复兴。数年之间，班次渐增。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增至十班（其中一附课生），共有学生四百二十

九名（其中女生十七名）。一九三四年（民国二十三年），省立十一中奉令改为省立临清初级中学。因学校班次扩充，校舍窄狭，实不敷用，于是在城内“大仓”筹建新校舍，一年半竣工，一九三五年（民国二十四年）学校搬迁。

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因“七七事变”，抗战爆发，学校停办，再未恢复。该校自成立以来，历时十九年，毕业学生约八百余人。

二、组织机构

校长之下设“三处”即训育处、教务处和事务处。“三处”各设主任一人。训育主任先后为李冠五、王旭亭、滕梅五；教务主任为赵怀昌；事务主任先后为叶成德、刘贯迁。

训育处下，又设指导委员会、学生自治会、训育委员会、党义研究会、童子军、以及

训育员；教务处下，又设统计委员会、课程标准会、各科教学会，以及教务员、书记员；事务处下，又设图书管理员、会计员、庶务员、校医等。

三、教育宗旨

省立十一中所采训育标准，以使学生主义化、军民化、团体化、革命化、艺术化、科学化为目的。其训管方法，兼采集会及个别训练、人格的、自治的、服务的、赏罚的等方法。其操行之考查，有个别谈话，教学问答，及填表调查等办法。

校训为“自强不息”，悬在门首。

校长张乾一所作校歌也体现其办学宗旨，歌词为：凤岭毓秀，卫水钟灵，莘莘学子，社会之英，旷观吾国，处境堪警，唯有和平、奋斗、亲爱、精诚，才能完成学与行，才能发展

十一中。努力，努力，大家努力！我民族精神当如日升，我民族精神当如月恒。

四、课程设置

省立十一中为三年制初级中学，课程设有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动物、植物、矿物、历史、地理、党义、英文、音乐、体育、美术、军事兼国术。该校教学用书，除有少数课程采用讲义外，均选用商务、中华、世界三书局所出版的课本。

授课之外，辅有各种课外活动。重要学科都设有研究会，出有刊物，由各科教员作指导。此外，尚有学术讲座、学生讲演会、班会、戏剧社、笑林社、雅乐队之属，学生文化生活颇为活跃。

体育活动有朝操、课间操、普通体操及国术。特殊之训练，则有军事训练及童子军训

练。

五、教员概况

省立十一中教员多为学有专长者，先后在十一中任教师的有：

国文教员：萧涤五、张兴元、巩玉贤、李光家、臧克家。

数学教员：张次和、王道衡、胡振华、周维新。

历史教员：汪伯岩、杨中一。

地理教员：杨华云。

英文教员：王香亭、张鸿昌、修荣璋。

党义教员：朱诚中。

植物教员：张墩。

体育教员：曹鸿业。

美术教员：赵望云、舒俊山、施佩秋。

军事教练兼国术教员：葛逢寅（葛子

彬)。

六、学生运动

一九三三年秋，省立十一中學生受社会进步思潮的影响，曾发动一次学潮。事情的引起是当时学校收学费较高，且每学期都有增加，激起学生强烈不满，学生举行罢课，要求清查帐目，揭露贪污行为。这次学潮的组织者是进步学生李子华、刘墨卿，暗地指挥者是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刘铁辘、王法武。参与学潮活动的近百名学生，分为纠察股、理财股、交涉股，有组织地进行说理斗争。此举受到进步教师的同情、支持。但校长张乾一却将学生的举动报告给驻防临清的鲁北民团军总指挥赵仁泉，对学生进行迫害、镇压，将李子华、刘铁辘第七十八名学生开除学籍。

一九三六年，在北平燕京大学读书的林远

及在中国大学读书的黄儒汉，联合分散在北平读书的原十一中被开除的进步学生二十余人，采取签名登报发表言论及印发传单的形式，开展驱张（张乾一）反何（何思源）的斗争，揭露张乾一迫害进步青年及经济上的贪污行为。此举选择在张乾一竞选国大代表之时。实际对国民党政府的假民主、真专制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这一斗争在当时山东和临清教育界引起震动。

临清乡师概述

李洪珍 许启然

一、建置与沿革

六县联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创办于一九三一年九月，校址设在临清城东门外原省立第二职业学校旧址。该校由临清、夏津、馆陶、清平、邱县、冠县等六县共同集资兴办。故名临、夏、馆、清、邱、冠六县联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简称临清乡师。

学校隶属于六县教育科直接领导，由鲁西北知名教育家孙东阁（孙宝贤）任校长。

起始，学校招收学生两班，约百余人，男女学生兼收，分别定为一级一班和一级二班。学制定为四年。

一九三二年招收二年级学生一班，是年全校计有一二年级学生三班，共一百七十四人（其

中女生二十二入)。

一九三三年招收三级学生一班，学生五十人。因一级二班学生流动较多，合并为一班，是年有一、二、三年级学生三班，约一百五十余人。

一九三四年招收四级学生一班，学生五十人，是年有一、二、三、四年级学生四班，约二百余人。

一九三五年，一级学生毕业，又招收五级学生一班，学生五十人，是年有一、二、三、四年级学生四班，约二百余人。

一九三六年，二级学生毕业，未招新生，是年有二、三、四年级学生三班，约一百五十余人。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十月间，临清县城第一次沦于日伪统治，学校自此解散。

该校自创办以来，历时六年，共招收学生五级六班。培养师资近三百人。

二、学生来源与办学宗旨

乡师招收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六县农村的高小毕业生和具有同等学历的无业青年，少数来自六县城镇的高小毕业生和初中的失学青年。

乡师的办学宗旨比较明确，即为六县培养师资。学生毕业后回各县，大部分由教育科分配或学校聘请做教师工作，也有少部分学生毕业后。参加了其他工作。

乡师对培养目标提出明确要求，即学生要有革命精神，要有健康的体格，要有农工的劳动身手。当时流行的校歌也体现这些基本要求，歌词为：

清渊古郡，
卫河之滨。

联立乡师，

崭焉一新。

萃六县之英俊，

历四载之陶甄。

要有农工身手，

要有科学脑筋，

要有艺术兴趣，

要有革命精神。

努力，努力！

前进，前进！

发展乡村教育，

改良社会习惯，

吾侪切莫惮艰辛。

三、学校行政机构

学校机构设有校长办公室和教务、训育、庶务三处，每处设主任一人。校长孙东阁（孙宝贤）从学校创办到解散一直任职。教务主任

先后为邹维齐(邹子清)、孟承文(孟宪州);训育主任先后为玄大庸、马天庆、赵干堂(赵景甲)、王少逸;庶务主任先后为柴梦笔(柴景江)、贺凤忱(贺子卿)。

四、校舍、经费及师生待遇

乡师校舍计有办公室四间,教室十二间,图书室三间(一间藏书、两间阅览),游艺室六间,以及教职员住室、男女生宿舍、伙房、餐厅等共百余间。

学校全年经费为一万五千七百五十元,由临清、夏津等六县分摊,以临清、清平两县出款最多,并以出款多少分配招生名额。

支出情况为:教职员薪俸占总经费的百分之五十二,学生津贴占百分之二十四,其他杂项开支占百分之二十四。

教职员实行薪俸制,校长、主任、教员、职员各不相等,以校长为最多,依次是教务主任、训

育主任、庶务主任、教员和职员。

学生每人每月由学校发给生活津贴费（助学金）二元，不足部分学生自负。此外，学生每人每学期交三元钱的学费。

五、课程设置与教职员任（兼）课情况

学校课程设有国文、数学（代数、几何等）、历史、地理、物理、化学、动物、植物、教育概论、心理学、公民、卫生、农业、三民主义以及体育、音乐、图画、手工诸科。

据一九三三年五月《视察临清县教育报告》记载，是年五月，乡师教职员任（兼）课情况为：

校 长 孙东阁兼历史课和地理课。

教务主任 邹维齐兼数学课。

训育主任 马天庆兼三民主义课和公民课。

庶务主任 柴梦笔兼动物、植物和卫生等

课。

教 员 徐其明任国文、教育概论和心理学等课。

王贵笙任国文课和习字（书法）课。

贺凤忱任体育课和音乐课。

张虞宾任图画课和手工课。

此后，来乡师任教的教员有：

赵贯一（赵景义）任国文课。

孙卓如任国文课。

郝冠英（郝鲁伟）任国文课。

刘季平任教育概论课和心理学课。

郑子真（郑玉玲）任数学课。

吕清璞任国文课。

丁子元任图画课和音乐课。

杨荫元任图画课。

张芳梅任体育课。

六、学生的课外活动

乡师学生的课外活动，除担土平校院、脱坯等，从事一定的体力劳动外，还组有学生自治会，会内分设学术、游艺、体育、事务等项。

学术股设有读书会、讲演会。读书会的学生除能读到鲁迅的《呐喊》、《彷徨》以及郭沫若、茅盾、老舍等人的进步文艺作品外，一些同学还可看到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等马列著作。学生的讲演会每星期六晚上讲演一次，讲演人数三至四人。题目多由学生自选，但内容大都与抗战救亡有关。同时，学术股还出有《文艺周刊》、《朝阳日报》、《绘画周刊》等，这些壁报均由学校编辑、绘画和张贴。其内容多为报道抗日救亡消

息、时事评论和文艺作品等。

游艺股除设有军乐队外，还有话剧队等。话剧队演出的节目有《放下你的鞭子》、《一元钱》、《姊妹花》、《孔雀东南飞》、《阿Q正传》等，这些抗战剧目和反封建剧目，在临清各界和农村中，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体育股设有篮球队、乒乓球队和田径队等。

事务股设有消费合作社，由学生捐款自办，年底分红，主要销售学生日常生活和学习用品，同时又是学校地下党的秘密活动联络点。

七、乡师地下党的活动

乡师地下党组织的创建人李恩荣（一九三〇年入党）。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初，他遵照中共鲁西总支书记刘子蔚（刘书林）同志的指示，建

立了乡师党支部。李恩荣任支部书记，李朝杰任组织委员，高景赐任宣传委员。

一九三二年暑假前，乡师支部负责人李朝杰召集各县贫苦学生开会，对六县教育科长偏袒富裕学生、济富不济贫原则发放助学金的议案提出抗议，并举行罢课，时间达一周之久。

一九三三年四月，由乡师党支部负责人高景赐（兼学生会自治会副主席）和党员何金池（学生自治会主席）领导，举行了第二次罢课，以示对压制学生进步思想的教师徐其明的反抗。罢课时间延续了三、四天。

一九三四年一月底，乡师党组织又印发了传单，散发到街头和剧场，开展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一九三四年二月，国民党临清县党部指令开除了乡师党支部的主要成员。从此，乡师党的地下活动趋于低潮。

八、学生去向

乡师校长孙东阁虽系无党派人士，但他思想开明，办学民主，又富有爱国心，所以乡师党的革命活动能以开展，且很活跃。乡师不仅为鲁西北六县培养了一批进步师资，而且地下党组织发展了一批党员。为鲁西北的抗日战争培养了一批干部。赵健民、黑若仙等都是乡师毕业的学生。

临清武训小学简史

许 启 然

清光绪年间，东昌府堂邑县乞丐武训弃家行乞，不娶妻室，不费一钱，拾线积绳，磨面代畜。终生以行乞为职业，以兴学为目的。用一生所蓄，在堂邑、馆陶、临清创办义学三处。临清武训小学即为武训创办的三处义学之一。

一、建置沿革

临清武训小学创办于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校址在临清钞关街御史巷内（现实验小学校址）。该校是武训以行乞所蓄二千余吊，在临清创设的一处义学。起始，学校定名为御史巷义塾，有校舍三座（其中教室三间），价

一千五百余吊；学田七亩，价四百余吊。学生一班，三、四十人。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武训积劳成疾，病死于御史巷义塾内。该校塾师王丕显秉承其遗志，负起重任，继续苦心办学。嗣后，御史巷义塾易名为武训义学，学生也逐渐发展为初、高级各一班，共计七十余人。1904年（光绪三十年），清廷推行新政，停科举，兴学堂。武训义学奉令改称武训小学堂。

民国年间，校名数易。1912年（民国元年），武训小学堂易名为私立武训初等小学校。1918年（民国七年），后又易名为私立武训高、初两等小学校。1920年（民国九年），省议会决定每年岁助该校大洋三百元。1921年（民国十年），因学生渐次增多，又增招初级一班；6月，高级第一级学生毕业；7月，招高级第二级新生一班。同年8月，买校东邻铺房

宅基一处，用钱一千四百吊；又买校东南邻宅房地基一处，用洋四百二十元。1922年（民国十一年），建修学校大门、教室、寝室等共计四十余间。1928年（民国十七年）秋，该校奉令改称临清私立武训小学。同年还在校内蔚起楼下树起武训兴学碑及新校舍落成纪念碑。至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武训小学已有基金一万四千六百元，学田三顷八十五亩，另有省教育厅补助费每年一千三百元。校舍计有教室二十二间，寝室三十间，图书室四间（内有各种图书两千八百余册），办公室四间，厨房三间，武公祠堂二间，以及餐厅、会议室、传达室共计七十六间。另有各种教具九百余件。此时，学生已发展为高、初级共七个班，计三百一十三人。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七七事变”后，临清沦为日伪统治，该校一度被日寇占

领，成为日伪县政府所在地，院内四面修起了炮楼，武训小学被迫迁至大寺西。由于兵荒马乱，教学设备又很简陋，学生减为四个班。

1945年9月，日寇投降，临清解放，武训小学又迁回御史巷原校址。在党和政府的关怀领导下，由私立改为公立，并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是年秋，该校已发展为高、初两级各四个班，学生达四百余名。1946年，学校又发展到高小四个班，初小十个班，学生增加到六百余名。同年，在该校内还附设简易师范一班，招收学生四十余名（此简易师范又称临清镇师）。1949年，该校又附设第二期简易师范一班，招收学生四十余名（后合并于县师）。

二、组织机构

学校行政：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武训死后，至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王丕显任校长。1921

年（民国十年）郭金堂来校任教，并担任校务主任职务。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该校校董为：韩纯一、张自忠、马鸿逵、沙明远、车震、陆凯、黑守知、刘士俊、孙宝贤（孙东阁）、张元亨（张乾一）、潘云龙等。至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校董会人员扩充，韩复榘任该校名誉总董，又增添赵仁泉、孙鉴藻、施登魁、孙百福、刘闻尧、李泗亭、王丕烈为校董。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至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郭金堂任校长，樊秉贵（樊道三）任教务主任，韩增祿（韩荷之）任训育主任，岳维屏（岳藩洲）任事务主任。此时期，学校行政组织为：校长之下设教务股、训育股、事务股、研究股及经费稽核委员会、津贴贫苦学生调查委员会和特种委员会。

为发扬武训精神，该校首任校长王丕显编

有校歌云：试看学校榜门书武训，师生济济奋精神。追慰艰难缔造人，后人得庇前人荫，桃李四时春。校与武君同不朽，千古教泽新。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至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冀竹怡任校长，张延之任教务主任，郭维章任训育主任。

1945年9月至1947年7月，迟修芬任副校长，洪维才任教导主任，杨今昔任事务主任，1945年张用晦任教务主任，1946年谷新洲任教务主任。

1946年7月至1947年7月，胡雷任校长。

1947年7月至1948年2月，迟修芬任校长，袁维青任教导主任。1948年2月至10月，袁维青任校长。

1948年10月以后，李岳堂任校长，周耕九任副校长，马扬河任教导主任。

党、团组织：

1945年9月，在中共临清市委记刘殿臣的主持下武训小学与城区市小学合建一个党支部，1946年上半年，该校党员增多，党组织扩大，单独建立起党支部。

1945年9月至1948年2月，迟修芬任党支部书记。此后，袁维青、李岳堂相继兼任党支部书记。

1949年8月25日，该校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成立，马扬河任团支部书记。是年，共发展团员十五名，其中女团员五名。

三、课程设置

该校自创办至1904年（光绪三十年）为义学，开设课程主要有：《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以及《四书》、《五经》等。

民国初期，该校初级班课程设有：国文、算术、手工、图画、唱歌、体育等；高级班开设课程有：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手工、

图画、唱歌、体育等。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该校课程改设为：国语、算术、自然、公民训练、卫生、美术、音乐、体育等。

日伪时期，日寇在武训小学强制推行奴化教育，强迫增加了日语、修身等课程。

1945年9月，临清解放以后，该校高级班课程设有：政治、国语、算术、历史、地理、自然、音乐、美术、体育等；初级班课程设有：政治、国语、美术、常识、美术、体育、音乐等。

四、教员任课

武训小学自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招收第一级学生开始，邑人王丕显即在该校任塾师。此后郭金堂等相继来校任教。

据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视察临清县教育报告》记载，是年，武训小学部分教员任课情况为：校务主任郭全堂任高级一年级三民

主义课；教员田观善任高级二年级算术课；李莲蓬任初级三年级国语课；岳维屏任初级二年级国语课；黄振奎任初级四年级常识课；李宗先任初级一年级常识课。此后在该校任教的教员还有：玄道盛、黄陞元、修世忠、盛福彭、卢云峯、钟尔宸、崔有泉、阮升之、王克正、张步颠等。

1937年至1945年，在武训小学任教的教员主要有张延之、迟修芬、高玉英（女）、潘耀曾、田春皋等。

1945年9月，武训小学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获得新生后，曾在该校任教的为数甚多，初期教员主要有：张光第、林凤声、朱海波、李菊茹（女）、高玉英（女）潘耀曾、迟修箴、路明、李靖（女）、王相臣、张春敬等。1946年，郝华亭、李牟山、李振荣、曹思曾、李荣堂、周勋臣、王树筠（女）、刘

凤兰（女）韩淑芳（女）修继光、王堂、胡炳南、姚汉卿等又相继来校任教。此后，该校教职工新老交替，数次调换，教师队伍变化较大。

五、经费来源

武训小学自创办至1945年，始终为私立学校。清末和民国时期，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募捐和校田的地租。

1946年冬，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本着自力更生的原则，利用原武训小学遗留的基金，办起了卷烟厂、肥皂厂和贸易货栈，事务主任杨今昔任总经理，另有会计员胡炳南、事务员姚汉卿协助工作。卷烟生产、制造肥皂和商品经营，则主要靠雇用工人。高年级学生仅在课余时间参加一定的劳动，并给予一定的报酬。

卷烟厂当时雇用的工人由几个到百余人，手工卷烟机由几部到五十部，后又增加大机器

生产。生产出的“双十牌”香烟远销邯郸、德州、威县、南宫、邱县等周围十几个市、县。不少市县的学校领导相继到武训小学参观学习。

工厂和货栈的创办，大大增加了学校的经费收入，仅烟厂一项所获利润就能满足全校五、六百名学生，几十名教师的全部开支。学校利用勤工俭学的收入、添置了大量的教学设备。此外，还向市财政提供了不少剩余资金。

武训 颂

朝朝暮暮，快快乐乐，
一生到老，四处奔波。
为了苦孩，甘为骆驼，
与人有益，牛马也做。
公无靠背，朋友无多，
未受教育，状元盖过。
当众跪求，顽石转舵，
不置家产，不娶老婆。
为着一件大事来兴学，
兴学，兴学。

陶行之写于1930年



破钵百衲度春秋，

心铁情癡为众谋。
今古完人究多少，
何于一丐作苛求。

臧克家写于1986年

（王端征供稿）

临清华美医院小史

杜 明 德

临清华美医院，即现在聊城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据临清县志（一九三四年本）记载，临清华美医院的前身是施医院。施医院建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医院设在当时的教会院内，教会设在现在的大桥煤场一带，是美国传教士卫各纳主持创建的。医院创建之初，一是为教会内部人员门诊治疗，二是为扩大教会在群众中的影响，也对外门诊，但因当时的群众大多数都不相信西医，故一开始，上门求医者甚少。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义和团”为反对《辛丑条约》，提出“扫清灭洋”的口号，教会及施医院被

“义和团”所焚。当时教会的牧师及施医院负责人金发兰，秦瑞恒等人逃往小芦村（在今河北省临西县）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在南北街（今更道街和健康街一带）扩地百余亩，重新建立教会和医院，因华方捐款，美国人所建，所以，命名为华美医院。

华美医院是美国基督教会、公理会下设的一个慈善机构，每年医疗费均由教会拨款。所以，该医院对前来就医者，都本着少收费或不收费的原则。对确实交不出就诊费的，经院长或医师在处方上签上“免”字就可免费门诊、免费取药。对一些确有困难的而又需住院治疗的危重病人，也可部分或全部地免交住院床位费、药费及伙食费。当时，每年免费住院者约有六、七百人。

华美医院自建立以来，各种医疗器械设备

也逐渐购置增加。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院长徐子上，美籍医师孔美德（女）、瑞杏林积极向美籍教会人员、医务人员及各界人士进行募捐筹款，直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共捐款3645.5美元，购置X光透视机一部，发电机一台。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由美国起运直达我国港口，我国财政部还特予免税，表示嘉奖。民国十九年三月全部机件运至临清。与此同时，临清各机关联席会捐助木、瓦、砖。于民国十九年五月动工兴建，同年八月竣工，建成X光透视室一座，发电机房一座。从此该院对骨科及胸腹部的种种疑难疾病在X光透视机的辅诊下，基本做到准确诊断，及时治疗，早日痊愈。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病人的疾苦。为纪念此次捐助华美医院扩建的有功人员，特立碑撰文，以志纪念。

这时医院设有内科、外科。并设有一等病

房，二等病房和普通病房。同时设有男、女病房。全院共有住院床位五十多张。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由于教会拨款数额有限，而门诊量和住院人数逐渐增多，加上有一定数量的免费病员，华美医院的经费开支上常常出现严重入不敷出的情况，其不足部分由当时的第四专署负责承担，使华美医院继续开设下来。

华美医院在开设期间，美籍院方负责人及医务人员，每三年要回美国休假探亲。加上北伐战争以后，中国各阶层反对“洋人”从各个领域侵犯本国利益，用各种形式对中国实行主权侵犯。教会为避讳其美国人侵犯中国主权之嫌，便采取美籍医士和华人共同负责院方的领导工作。徐以达（字子上）就是第一任华人院长。

由于华美医院设备较好，房舍较舒适。所以凡来临清或途经临清的一些权贵名流都在协

美医院住宿。如国民党二十九军（宋哲元部）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原驻防在河北省沧州一带的抗日前线，“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命令该部南撤，途经临清时（1937年9月）就住在华美医院。另外据《临清县志》记载：国民党十七军军长马鸿逵，来临清后也在华美医院住了月余。

“七七事变”后，日本军队侵占临清。在这之前，美籍医务人员全部撤离临清，其他医务人员也都暂时离开医院。这时有些惊慌万状的群众，把一些妇女、儿童都送到教会和医院，以免被日军蹂躏，最多时达几千人。一九三八年，避难群众相继离开教会、医院，医务人员也陆续回到医院，同年下半美籍医士孔美德也回到临清华美医院，医院的医疗工作基本恢复正常。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国对美宣战，与此同时，日军便强行进驻华美医院，医务人员郝敬先、总务人员高伯

衡，会计冀杰三被捕。美籍医士孔美德等被日本军队拘留，后来被统一遣返离境。医院的其他医务人员也纷纷逃离医院，迫使华美医院停办。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七日，原华美医院医士郝敬先，在原华美医院的基础上重新组建并成立了“临清县人民医院”郝敬先任院长。在第二年召开县医院成立一周年的纪念大会时，日军撤离临清，次日杂派军进驻临清。

一九四五年九月临清解放后，冀南行署卫生部及冀南军区部分医务人员来到临清。行署卫生部就设在原华美医院所在地，冀南军区的一些医务人员和临清县医院合并为冀南军区野战医院（在现在的中型油棉厂）、一九四六年元月，冀南军区野战医院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为了方便群众，又于一九四七年四月在原华美医院所在地成立了一个“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门诊部”。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彰德战役开始，“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便南迁为彰德战役服务，该处便成为冀南军区被服厂。原华美医院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门诊部”仍留在临清。不久便成为冀南军区被服仓库。（因为大部分医务人员相继离开门诊部自行开业）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五日，冀南行署设在冠县柳林的光华医院，搬迁到临清的邱家胡同后，改名为“鲁西北人民医院”。后于一九四九年春天搬到原华美医院所在地（当时已成为冀南军区的被服仓库），就改名为邯郸专署第二人民医院。1950年冀南行署人民医院，搬到临清与邯郸专署第二人民医院合并，改为河北省第二人民医院。

一九五三年，临清划归山东省后，又将河北省第二人民医院改为山东省聊城地区第二人民医院至今。

李东阳三过临清

殷 黎 明

据《李东阳全集》第一卷记载，李东阳字宾之，号西涯，谥文正，生于明英宗正统十二年（1447年），卒于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年），祖籍湖广茶陵，洪武初年曾祖父在家乡参加义兵后驻北京，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祖父在禁卫军中任职，后退居北京海子西涯，因此，东阳自号西涯。他四岁时能写一尺大字，京城人称神童。在四、六、八岁时先后被景帝召见三次，天顺六年（1462年）中举，天顺七年（1463年）考取进士，第二年殿试后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明史》本传说李东阳“立朝五十年”官至华盖殿大学士，担任首辅。

李东阳不仅是明朝著名的政治家，同时又

是著名的文学家和诗人，《明史》本传说“明兴以来，宰臣以文章领袖缙绅者，杨士奇后，东阳而已。”“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由于他的政治地位和注意“以诗文引后进”，所以当时许多文学人才围绕在他周围，并形成了以他为首的一个文学流派，因他是茶陵人，诗人称茶陵诗派。他的诗文集中收编在《怀麓堂集》中。李东阳在临清留下的诗作也均收录在此集中。

李东阳第一次过临清是在成化八年（1472年）时任翰林院编修，陪父亲李淳回湖南省亲，由北京沿运河乘船经山东到南京，沿长江到武昌，经岳阳到长沙，而后至茶陵，在家乡住了些天便重经运河北返。平生第一次远游，耳闻目睹，感慨甚多，他将在旅途中所作诗文收编为《南行稿》，这次过临清有两首诗作，即：临清二绝，（康熙十二年临清州志，民国二十三年临清县志载此二诗题目为：过鳌头矶）。

临清二绝

十里人家两岸分，层楼高栋入青云。
官船贾舶纷纷过，击鼓鸣锣处处闻。
折岸惊流此地回，涛声日夜响春雷。
城中烟火千家集，江上帆樯万斛来。

第二次过临清是成化十六年（1480年），三十四岁的李东阳以翰林院侍讲兼应天府乡试考官，阅卷后遍游南京名胜，经扬州、徐州、临清北上，这次远行对广阔的社会有所接触，遍访友朋，体察民情。而后，他将这时期所作诗文编为《北上录》，路经临清时留有三首诗作：

戴家湾遇金宪刘廷珪留饮

和严户部宗哲一绝

画船兰棹一时开，千里归心未易裁。
不为江山频驻节，前途只有使君来。

严宗哲置酒临清舟中夜话联句

画船银烛照金罍，珍重能劳地主来。
人物一时归水鉴，圣明四海在春台。
天涯故旧还青眼，白下游从总俊才。
岐路匆匆谈不尽，谯楼更箭莫相催。

留别严宗哲兼柬潘宪副廷玺

万家烟火静深村，野色苍苍晓雾昏。
津口月明人唤渡，城中灯影吏开门。
多情不厌遗衾枕，余梦犹疑恋酒樽。
更谢东巡潘多史，为予溪上驻行轩。

李东阳第三次过临清是在弘治十七年（1504年），弘治十二年他将女儿嫁给孔子第六十二代孙，袭封衍圣公的孔闻韶，五年后即奉命前往祭祀山东曲阜孔庙。此次东行所作诗文均收编为《东祀录》，但在临清没有诗作。

赵仁泉在临清

郑观云 郑观河 王征瑞 口述
卢敏 整理

一、赵仁泉任鲁北民团指挥始末。

赵仁泉，号博源，河北雄县龙旺村人，行伍出身。与韩复榘是老乡，颇得韩的宠信。一九三一年八月至一九三七年九月，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委任赵仁泉为鲁北民团指挥兼临清、惠民两区公署专员，统辖军政大权达七年之久。赵在临清残暴统治，巧取豪夺，杀人如麻，残害百姓，被称为“赵家宰坊”。“七七事变”后，赵奉韩复榘之命放弃临清，撤至河南，充任国民革命军二十师副师长。抗战胜利后，先后任国民党中央后勤部第六运输处处长、涿县专员。北京和平解救后，赵潜回北平西城

砖塔胡同住宅闲居。一九五一年镇反时，我人民政府将其逮捕，押送原籍枪决，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二、鲁北民团建制

鲁北民团指挥部设在临清后关街（现市二轻工业公司）。

指挥部内部机构及主要人员：参谋长申景苏。副官长李更新，副官任太生、张云涛、尙劝学。军法处长张拱臣。军需处长赵庆兰。军械处长赵希圣。军医处长张承德。稽查处长卞某某。稽查员米书堂、高子尙。

赵仁泉随从护兵四人：劳槐之、李宪洪、张腾飞、郭风山。

传令队：队长姚福祥，传令兵巩占魁、王清泉等。

指挥部内设手枪队一个连，负责警戒。

指挥部直辖三个营，约一千五百人：

第一营：营长程廷玉，山西人。营部设
在西夹道老公所。（现青年路办事处西夹道街）

第二营：营长党书荣，河南人。营部设
在旧城内张公祠城隍庙。（现东方红戏院东）

第三营：营长张奠亚，河南人。营部设
在杜公祠。（现新华办事处上湾街东头）。第三
营兼临清县保安大队，在大佛寺训练民兵。

三、“赵家宰坊”与禁毒禁烟

赵仁泉在任鲁北民指挥期间，将禁毒禁烟
（鸦片烟、海洛因）列为第一要政。他在临清碧
霞宫内设了一个大型戒烟所，各街烟民登记去
戒烟一个月，并在臂上刺个“一”字，戒完后
再吸食毒品处以死刑。如系贩毒，一律枪决。
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六年，贴出布告共枪决
三千七百多人。其罪名或是贩毒吸毒，或是土匪

通匪。凡被抓进指挥部的人，都要遭到皮鞭木棍非刑拷打逼供，然后判以死刑。民团军抓人，不是靠调查凭证据，而是察颜观色，看见脸黄不顺眼的人，认为是吸毒就抓，有人密报土匪、通匪或贩毒就抓。冤死的人不计其数，因此叫“赵家宰坊”。临清四区区部设在郭堤村，总教练赵明泉（赵仁泉族弟）夜间被人暗杀。赵仁泉认为区部的八名区兵通匪，不问青红皂白，抓到指挥部统统枪决了。临清吕堂村刘锅腰和本村刘华清有私怨，花掉一万现洋买通赵仁泉，赵以通匪窝匪的罪名枪决了刘华清。堂邑县门庄许义臣、许子义叔侄二人，被人告发贩毒吸毒，赵仁泉派临清二区总教练张殿清把他们“请”到临清，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无缘无故地枪决了。许义臣之子许一浩当时在南京当律师，状告赵仁泉枉杀无辜，南京下令把赵仁泉押解南京问罪，经韩复榘的参

议沙月坡说合，把张殿清解到南京顶替了赵仁泉，押了几车又接裁了回来。

赵主临期间，明令禁毒禁烟，在当时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也确实冤杀了不少好人，放掉了一些坏人，这一抓一放，赵从中捞到不少不义之财。赵到临清首先结交了资本家冀新三，在冀家打麻将，接妓女暗娼，过着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他本人打牌累了吸口大烟，后来吸上了瘾。在他的禁毒令下，不光不禁自己，而且也有长期被他庇护，吸毒不抓的人。如大三里庄地主赵之寿、林园村地主张仲修、大辛庄地主孙子真、李堂村地主施俊生等。这几个人还不断到冀家和赵一起打牌、吸毒、赌博。另外，在指挥部关押的人，只要经大地主大资本家冀攸帆说情，罚款二千、三千、五千现洋，就能释放出来，赵仁泉、冀攸帆等人从中渔利，大发其财。

四、修建慕善戏院和慕善粥场，贪污侵吞巨款

一九三七年，赵仁泉在临清修建一个慕善戏院（现临清剧院前身），一个慕善粥场（现青年路派出所），总建筑费四万现洋。而这巨项开支来自何处呢？原来是一九二八年北伐时期，第二集团军冯玉祥部下第八方面军总指挥刘镇华所辖的第十三军南退，在临清驻兵一月，给养粮草军饷均由临清商会垫办。一九三七年二、三月间，安徽省府突然来电，叫临清商会去领款。临清商会派常务委员孙声远到安徽找到省主席刘镇华，领回八万现洋。赵仁泉和临清商会会长王荫轩经办建了“慕善戏院”和“慕善粥厂”，共开支四万现洋，余下的四万现洋，赵仁泉依仗职权侵吞贪污了。

五、创办临清进德分会，笼络人心

韩复榘于一九三三年春去南京向蒋介石述职时，参观了宋美龄、黄仁霖主办的“励志社”。这是蒋介石将校军官的核心组织，是笼络僚属亲信向心力的唯一法宝。韩返鲁后，参照“励志社”的组织形式，于一九三三年夏在济南创办了山东省进德会。随之，赵仁泉在临清也办起了分会。临清进德分会的地址即为现在的大众公园。原先这里是个道士庙，叫“无为观”，内有清朝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刻写的两块御碑。王伦“造反”时将“无为观”放火烧尽，成为荒地岗子。赵仁泉在这里建进德分会时，拆除了卫河以西大型的大王庙、头闸口大型的大王庙、二闸口小型的大王庙各一座，将这三个庙的木料砖瓦运到会址，商会会长王荫轩监工，修建了大厅一座，极其壮观。大厅前建

一木牌坊，由郭朴斋题写“进德修业”四个大字。进北门左右各建十间北房，设有办公厅、游艺厅。赵仁泉派副官张云涛、尚劝学管理进德分会。此会直到赵仁泉南逃时才停下来。解放后由人民政府改建为大众公园。

六、镇压进步人士和学生的爱国救国活动

赵仁泉在临清按照韩复榘的旨意，积极反共，疯狂镇压进步人士和学生的爱国救国活动。

一九三三年秋，省立十一中学学生受社会进步思潮的影响，曾发动一次学潮。事情的起因是当时学校收学费高，且每学期都有增加，激起学生强烈不满，学生举行罢课，要求清查帐目，揭露贪污行为。这次学潮的组织者是进步学生李子华、刘墨卿，暗地指挥者是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刘铁辇、王法武。校长张乾一将学

生的举动报告给赵仁泉，说共产党要暴动。赵仁泉派一个连的兵力包围了十一中，对学生进
行迫害、镇压，抓住十二个学生在学校审问，
后来又将李子华、刘铁轱等七十八名学生开除
学籍。

一九三五年，邹韬奋在上海出版了《大众生活》周刊，宣传爱国思想。周刊出到第四期，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蒋介石命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查封了《大众生活》，山东省党部派特务到各地邮局查找《大众生活》订户，按名单抓人。当时在王瑞征家里有个读书会，其成员有张铁、徐培仁、张光第、迟修职、张敬堂（后叛党）、黑若仙、刘慧溪、李翰文、苏达文（黑溪月）等。王瑞征用“顾万音”的化名在邮局订《大众生活》一百二十份，其中八十份是由臧克家在十一中发动师生订阅的，另外四十份由张铁推着小车零售。一九

三六年二月，王瑞征、于寿增（十一中學生）、傅云山（荊林三高校長）、趙博（十一中學生）等被趙仁泉、宋煥民（山東省黨部清共肅反委員會委員）抓到禁煙所，宋煥民、徐子崗（國民黨臨清縣長）兩次過堂審問，一無所獲，遂於次日把王瑞征送進監獄，關押二十八天才取保釋放。王被釋放後，又和遲修芬、洪維才、徐培禮、徐繼禹等一起在武訓小學成立了個少年讀書會，開展活動直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

临清商业概述

临清市位于山东省西北部。据《临清县志·疆域志》（民国二十三年版）记载“卫河古名清河”，即因临依清河畔而得名。始于后赵（公元368年），形成于西汉，发展于元朝，兴盛于明、清。东与高唐、茌平两县为邻，西靠卫河与河北省临西县隔水相望、南与聊城市、冠县接壤，北与夏津县毗邻。全境东西宽55.44公里，南北长29.88公里，总面积957平方公里。

临清是一座商业、手工业较为发达的历史名城。“地居神京之臂，势扼九省之喉”（注一）。建城后五百多年中，一直是运河沿岸和鲁西北的商业集散中心，在我国城市发展史上曾几度闪烁出耀眼的光辉。

魏、晋、隋、唐时期，因行政建制时有变动，临清的经济屡遭创击，发展不迅速。

公元一二八九年，元朝至元二十六年，为发展经济，弥补南北不平衡的缺陷，开凿了东平至临清的会通河，沟通了三千多里长的京杭大运南，从此，临清成为南北漕运的要冲之地，经济得到不断发展，商业日趋繁荣，逐渐突破了自给自足的自然条件，列我国著名商业城市之一。

明朝永乐年间，“临清置三仓，岁受山东、河南之粟”（注二）。宣德四年（1429）开始设钞关，由“御史及户部主事监收船料及商税（注三）。公元一四四九年（正统十四年）在这里正式筑城。城内“商贾辐辏”“市肆毂击”，有“缎店三十二座，布店七十三座，以及众多的酒店和杂货店”，“连城则百货萃止。两岸则万艘安流”（注四），人称

“江北五大商埠”“冠带衣履天下，人仰机利而食”。据记载，当时就督收船料商税之课…，大约岁至四万金，其税收额之大居全国八大“钞关”之首（注五）。正德年间（1506—1521）。商业已经相当发达，在兵备副使赵继爵的差使下，又建筑了二十多里的土城。嘉靖二十一年（1542），扩建城墙，自砖城东南及西北两角开始，夯土为墙，临清便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末期发展起来的“延袤二十里，跨汶卫二水”的北方大都会了。

清朝政府建立后，由于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恢复措施，商业、手工业达到了鼎盛时期：

中洲，由汶、卫二河环抱而成。“东南纨绔，西北裘褐，皆萃于此”（注六）。是临清达业“最为繁盛”之区（注七）。一条长街贯穿南北，自北而南分为锅市街、青碗市街、马市街三段，长达三里有余。锅市街及青碗市街两侧。皮

货、冠帽、鞋袜、杂货、米豆、纸张等各类店铺林立，其中磁器店和纸店最多时会达二十余家，羊皮店也有七、八家之多。马市街主要集中了银钱、皮货、鞋帽、海味、果品、杂货等铺。长街以西有白布巷，店铺以布店为主，绸缎店则集中在与其相交的果子巷。再南为粮食市，有粮店十余家，主要经销自河南卫辉等运来的粮食。

北区，天桥以北的小市是北区最主要的商业街，自关帝庙至张仙祠，长约里许，两侧店铺百余家，古玩珍宝，金属器皿，粮食，木材、估衣，应有尽有；牛市街有钱店、杂货店；小闸北岸有缎行及另剪铺、金珠宝饰等店；怀朔门外塔湾一带，集中了粮店十余家。除牛市街有碾房、磨坊、油坊等外，还加工皮、毛及竹木器，其产品也有很多“列肆于市”（注入）。

卫河西，靖西门内有粮店十余家，收采临清西乡一带运来的粮食。棉花市、在灶王庙与东城宾阳门内的棉花市遥遥相对，分别集散来自西、东两个方面的棉花，收花季节每日可入数万斤。本区另一特点为茶叶店集中，大者二十八家，小者不计，南方茶船皆靠卫河西码头。康熙年间，山西茶商韩四维等曾捐资在卫河西岸修建一座大王庙“壮丽无比”。

东区，汶河北岸的鼓楼斜街有粮店十余家，经销济宁一带沿汶河北上的粮食，每年可达数百万石。永清门外的永清大街有粮店二十余家。以西有横街名柴市，东西长二里许，两侧多柜箱、金漆、张罗、杂货、丝店、机房等店铺、作坊。此处另一特点，为四乡柴薪集中之地。临清有官窑二十余座，承造城砖，随漕船搭解上京，每烧一窑砖，需柴八、九万斤。均由附近州县及济南、兖州二府所属十八县领

价办纳。途远州县运薪困难，皆挟此来临清就近采买。因而，形成东区偌大规模的柴薪市场（注九）。

东南区，指汶河南支以东与中洲隔河相对的狭长地带，其街市分为三段，互不相接。北部的车营面积最大，在砖闸以东，有粮店十余家，主营本地粮食买卖，东南诸县农民及商贩车载驴驮米谷也至此集售。板闸南二里许为南厂，此处货物以船具为主，如绳缆、木篙、橹，桨、船只等等；亦有烟、酒、油、茶等铺杂处其间。最南端为南水关，俗名土桥，每逢三、八日为绵绸市，馆陶、堂邑、冠县等地小农或手工业者负绸以售，日集绵绸可达千余匹（注十）。

商业布局可以看出当时临清市场有三种功能：一是由另售商业构成，专供当地消费；二是对当地农副业产品、手工业产品集中收购和

分向疏散；三是对多种商品的批发中转。而这三种功能作用的范围和区域又各不相同，第一种只限城内，第二种辐射到周围县城和地区，第三种则是在有纵横经济联系的全国范围内发挥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临清商业繁荣乃是中转贸易繁荣。因此，形成了城市不大而商业街市甚多，人口少而贸易兴隆。分合于临清的三条水道，北达京、津，南抵苏、杭，西及汴梁。商品运销除山东本省各府、州、县外，包括京师、直隶、河南、山西、陕西、甘肃、湖广、江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以及辽东等地。明代十三布政司的九个，清代关内十八行省中的十四个以及关外的广大地区，甚至远及西藏、内蒙等边疆特区。可见州志所称，临清盛时“南达闽粤，北通辽海”（注十一）。

民国时期，临清商业继明、清时代仍较为繁华，规模和经营形式不断扩大和改进，方圆三

十里的城区中汇集了种类繁多的店铺，其中包括：粮食、布店、绸缎店、丝店、皮货店、羊皮店、鞋袜靴帽店、估衣店、锅店、磁器店、纸店；金属器皿（金、银、铜、铁等）、烟、酒、茶、盐、果品、海味、辽东货（人参、貂皮、青黄鼠皮等）、木材、船具、木器、家具、首饰、古玩等店铺；碾房、油坊、皮毛加工、竹木作坊等也有一些带店铺的。此外，还有当铺、钱庄、砗炭、木炭、药材、饮食和制作香烛纸马、盆、桶、锅盖等作坊店铺，以及棉花市、绵绸市、线市、姜市、柴市、猪市、驴市、鸡鸭市等农副产品的专门市场。据民国志记载，临清盛时“北至塔湾“南至头闸”“市肆带比”（注十二），随处可见。民国二十六年（1937）统计，工商业户779家，其中在行会的36个行业计717家。抗日战争期间，侵华日军先后三次占领临清，工商业倍遭创伤，不少商号、店铺被抢掠而停业。至抗

战胜利前夕（1944）统计，残余527家。一九四五年九月临清解放后：党和政府一方面大力发展生产，扶植工商业户，一方面宣传贯彻党对商业的各项政策，保障商户利益，唤起商人到敌占区采购、换购军需民用物资和医药军工原料等，因而，衰落的经济很快得以恢复，为整个鲁西北的解放起了重要的作用。截止一九四六年统计，工商业户已发展到789家，仅举花粮店一例，就由原来的19家增到42家。到建国前（1948年）工商业作坊店铺猛增到2061户，其中纯商业行业38个计911户。还自然形成了大宁寺、董家大院两个商场。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临清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随着国家“保护扶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营工商业”政策的实施，临清商业又焕发出了新的生机。除当时那些私营商业活跃在临清市场外，当地国营商业也在迅速发展，

先后建立了粮食、花纱布、百货、煤建、油脂等公司，活跃了市场，保证了供应，稳定了物价。与此同时政府还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激发那些对民有利的私营商业。因此，临清商业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繁荣局面。一九五三年全市社会商品零售额达到了205.4万元，国营商业购进总值达1,345万元，销售总额达1,399万元。

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在市政府的领导下，开始了对私营商业的普查登记和整顿，据统计全市共有经商户1,158家，其中纯商业583户，服务业186户，当年组织起合作商店12个，饮食合作店3个。一九五六年私改基本完成以后，全市1,919家私营个体户成为公私合营单位。从此，市场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形成了社会主义的统一商业体系。一九五八年刮起了“浮夸风”和“共产风”，左的错误否定了集体商业和集市贸易等各条商业流通渠道并存的

状况，对集体所有制商业的合作店、合作小组实行“关、停、并、转”，大批小商贩直接转入国营商业，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基本被关闭。多渠道的市场经济一变成为国营商业独家经营，商业网点大大减少，经营特点改变，服务质量下降。这种状况直到一九六二年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作出《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以后，才逐步有所改善。

十年文革期间，临清商业和全国一样，市场秩序混乱，企业内部杂乱无章，正常工作无法进行，购销业务难以开展，服务项目减少，服务态度生硬，经营效果直接受到影响。

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十年浩劫的混乱局面。从此，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又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拨乱反正，采取了很多发展经济的英明决策。一九八四年十月，中共

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务院又发出了关于改革城市商业的92号文件，商业市场迅速开放，出现了国营、集体、个体一齐上的竞争局面，三座1500平方米的国营营业大楼雄踞三个繁荣的十字街口，中小型商业网点遍及市区各条街道，集体独立核算单位833户，非独立核算单位1459户。个体摊贩2095个，外省地也前来临清经商。形成了“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成份，多种经营方式和少流通环节”的流通体制。正个市区市场秩序井然，贸易往来欣欣向荣，素有“小天津”之称的临清市场经济，几经沧桑在鲁西北的平原大地上又焕发出新的生机。

注一：于睿明序，载民国《临清县志》第一册。

注二：《临清县志》，乾隆《临清州志·序》。

注三：《临清直隶州志》卷九，关权。

注四：于睿明序，载民国《临清县志》第一册。

注五：八大钞关为：崇文门、河西务、临清、浒墅、淮安、扬州、北新、九江。参见：《续文献通考》卷十八；赵世卿《关税亏减疏》，见《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一十一。

注六：《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东昌府物产考》。

注七：（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卷二，建置。

注八：（乾隆）《临清州志》卷十一，物产志。

注九：（乾隆）《临清直隶志》卷九，关权附临清。

注十：（乾隆）《临清州志》卷十一，市廛志。

注十一：（乾隆）《临清州志》卷十一，市廛志。

注十二：（民国）《临清县志·经济志·商业》。

（临清市商业志办公室）

临 清 名 吃

窦 家 包

窦家包原名“揪头包”。又称“灯笼包”。始于一八六六年（清同治五年）。是原临清市饮食服务公司回民总店门市部81岁退休主任窦振生之父窦廷栋所创，开业在原临清州城内考棚街，字号元兴楼。尔后，振生同志又传给其子窦玉田（现临清市饮食服务公司“窦家包”门市部主任）前后三代约百余年历史。

蒸包旧时称“二细饭”。但窦家几代却勇于探索改进，选料讲究，制作精细，个匀馅大，薄利揽客。多销于中上层人物和进京赶考的官宦世家子弟。原国民党天津市市长张自忠在临清武训学堂举行的席筵上就指名吃窦家

包。这条消息在当时国民党办的《临清州报》上就及时作了宣传报道。故颂名留传至今，成为佳话。

窦家包在选料上相当考究。选用上等面粉、生牛肉、香油等十一种主料和配料。它的特点是：

- 1、皮外无油不扎嘴。
- 2、面软馅嫩内油多。
- 3、松嫩爽口易消化。
- 4、包熟后，馅团与面皮从内离开，用手提起面皮不坏馅团下坠，活象灯笼一样。

徐家包

“徐家包”创始人徐学敏，原籍山东省堂邑县小薛楼村，生于清嘉庆年间。该人原不干面食业。是名落榜的生员（秀才），为避听他人辱言到临清考棚街中榜学友马状元家开设

的“春生堂”中药铺任帐房先生。是年。中榜的马状元曾介绍北平的一位馅饼周勤临清传艺。学敏便辞职改行随周学艺。一年多后学成出徒。即在考棚街路西自营，历经数年改进才创出如今的名产“徐家包”。第五代徐延岑继业时建字号“祥兴楼”。前后七代接传已有180多年历史。

七代孙徐振寰一九七六年在临清市红旗印刷厂退休后，虽年已七旬但精神饱满，体质健壮。仍与他人联合经营着包子生意。

“徐家包”的名望很高。据说北伐战争以前，清朝的方统领，山东省奉军督按张宗昌，奉西卞英杰团长，第一方面军司令员朱培德都品尝过。一九三五年原国民党天津市长张自忠探家驱车到铺就饱吃一顿。因系家乡饭合口，他在天津时，隔不了三、四天就派人用盛装30个包子的水银盒捎与他吃。一九三七年又接走

徐廷桢到天津开设“徐家包子铺”。古历七月间日寇威逼津郊，芦沟桥事变即要爆发，包子铺才由津返临。

“徐家包”销售数量多范围大。解放前主销于城镇豪商、资本家、官宦场所及农村的财主绅士。东销至茌平、博平，西销至邱县，北销至武邑、衡水，南销至濮阳一带、真是生意兴隆，门庭若市。

据徐振寰回忆，他继业后会多次接待过出名的人物，第一次是一九三八年原东进纵队司令员陈再道率兵反击日寇；第二次是一九四八年陈毅元帅率领大军南下；第三次是一九五九年外国专家到临清视察先锋大桥时，市的领导请窦家包名师奚振生煎制，国际友人光抚摸肚皮，咿哩哇啦手舞足蹈。把陪坐两旁的原市委副书记姚俊峯、副市长韩荣芳吓得不得了，其实，国际友人不是胃口不舒，而是高兴得

招呼大家快拍摄合影照，以示留影道谢称赞。

徐家包在选料上由精面粉、生羊肉、大葱等十四种主配料构成，制作方法精细。其特点是：皮嫩、馅软、外皮焦黄、肥而不腻。

武德魁“肉饼”

武德魁现年80岁，原籍山东省临清市考棚街。

他十三岁时，为生活所迫，离别故土到原北平市东安市场（现东风商场）瑞明楼饭馆拜锡某某为师傅。学习肉饼制作技术，十五岁出徒，一九二五年到天津市河北小王庄永发聚饭馆制卖肉饼。一九三二年回临清至一九五一年先后在三元阁街、会通街、考棚街主营天津猪肉包，字号宝盛居餐馆。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六

年改营肉饼。一九五四年加入公私合营临清饮食四店制卖肉饼。一九七五年退休。

德魁同志思想开朗，技术公开，反对旧社会那种“能帮十块钱，不愿把艺传”的保守观念，教出徒五名同志都能在经营肉饼上独挡一面。因此，历年来荣获商业系统先进工作者光荣称号，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四年曾三次参加省、地组织的饮食技术表演大会，并在济南、聊城两地较大的饮食店部内巡回传授制作技艺达月余，深受各级领导和同行的称赞。

这种肉饼的配料由普通面粉、鲜猪肉、白菜等十二个品种制成，比例十分讲究。其特点是：外焦里嫩、食而不腻、经济实惠、老少皆宜。

王四辈“熟牛肉”

王四辈原籍临清天桥街。生于清同治十

一年。初时推辆平板独轮车串街叫卖熟牛肉，青年时期善于精心探索生意诀窍，注意集众家肉铺制作之长，创出了自己的咸、烂、香别具一味的熟牛肉，名望逐渐传到社会各界。约在清光绪七年（1882年），在临清光明街北首西拐路南租民房两间，自营牛羊熟肉铺，属前店后厂。由于他严格制作工艺流程，经营有方，很快打出了临清市场。仅举一九四四年一例，用蒲包盛装熟肉，平均每日销于天津、德州、沧州等地达300余斤。到清光绪十七年，买下了大片房产。鼎盛时期建字号“观音堂王家肉铺”，前后三代113年历史。一九五六年加入公私合营牛羊肉总店。市场开放后，次孙王俊廷在新华路个体经营，匾牌仍是“观音堂王家肉铺”老字号，生熟兼营，以熟肉为主，生意兴隆。

王四辈“熟牛肉”在选料上由生肉、花

椒、丁香等十一种主配料制成。制作精细。其特点是咸、烂、香、呈赭石色、久食口内无渣、口味浓香。中老年餐食皆宜。

五香牛肉干

“五香牛肉干”系临清城内考棚街沈桂芳所创制，字号沈聚盛，相继经营四代。至一九五六年加入公私合营牛羊肉总店，约145年历史，据其后代介绍，老辈早年就卖牛肉，旧时为了占住市场，保住门面，没拿手的绝技是不行的。所以才创制了“五香肉干”，又一直传到今天。国民党时期，济南府有名望的泰康食品店就代销过他家的肉干，省长韩复榘曾给他家发过奖状。四代孙说：合营后的翌年，县的领导派我父沈灏参加过山东省肉制品技术表演大会。第三年又到聊城地区当场示范制作。

一九八四年，市商业局领导让我给咱市

在宁夏自治区工作的黑伯理同志制捐过肉干。

“五香牛肉干”在选料上由生牛肉、花椒、元茴、丁香等十二种主配料制成。制成的肉干具有酥香味美不腻口，存放3—6个月不变质的特点，系酒茶佳肴，宾朋饌品。

四 美 村 锅 贴

创始人陈开會，原籍山东省北馆陶丁川村。生于清朝治十一年（1872年），卒于1934年，十五岁时去济南某饭庄学徒，主学菜灶，兼学锅贴手艺。19岁出徒来临清市自营锅贴生意，兼炒南北大菜，相继传给儿子陈发、儿媳刘英文、孙陈福海。1956年公私合营，三代操业有71年历史。

该店因祖传、技艺严格，精选优料，调馅控制讲究。锅贴、炸鸡腿、鸡血豆腐汤、烧

烤鸭子被誉为四绝，公领字号“四美村锅贴老铺”。当时平均日销15平锅贴（每平锅120个，折面粉1.5市斤）。城内的上层人物，如国民党时期的赵仁泉、花粮行、大商号的掌柜和农村的富豪劣绅等，可以说是的常客。不少过往的商贾、官吏也慕名而至。

四美村锅贴在配料上选用面粉、鲜猪肉等七种主调料，制作方法精细。

烧 麦

“烧麦”制作人王长明，现年79岁，原籍山东省临清市前关街人，一九七五年在临清饮食服务公司退休。十三岁时到北京市东来顺饭店当伙计。后拜云竹泉为师傅学习小灶（炒菜）。二十岁又到天津市见兴德饭馆拜穆祥顺为师傅学习面食蒸制技术。主学烧麦，四年零一

节出徒（一节即学艺出徒后为掌柜合干一个节气）。先后受聘到天津市、长春市、哈尔滨市等饭庄餐馆任厨师。一九四六年回临清。一九四九年在临清吉士口街路南自营烧麦馆至一九五六年加入公私合营回民饭店。

“烧麦”属面食类，因其皮很薄，肉馅软，食不腻口味美得以出名，受到各界人士的好评。一九五九年全国棉花工作现场会在临清召开时，中央及省地部分领导品尝烧麦后，个个赞不绝口。

王长明同志说，手艺不能保守，必须按标准传之后辈，服务于社会。五十年代中期他曾在饮食服务公司教出了徒弟，后期又被聘请到聊城饮食服务公司教出了四名女徒弟、四名男徒弟。他们学艺精湛，深得真传。

“烧麦”在选料上用精粉、生羊肉、大葱等六种主要配料，制作过程精细有方，其特点

是：皮薄，肉馅松软，久食不腻，味美适口，老幼皆食。

南 肠

南肠创始人赵宏壁原籍山东省济南市狮子桥。该人来临清城内会通街，自营南肠并兼作熟制肉品小肚，字号元兴斋。长子赵惠波继业期间，于一九四五年古历九月雇伙计方式振，四年后被辞。即在临清城内考棚街另开字号振兴斋南肠店。一九五六年加入公私合营大肉总店，惠波死后由式振同志经营赵家制的南肠，一是吃起来有五香味，特别是内含的松籽味，越嚼越香；二是存放半年不质变，当时内销主要是花粮行及大商号。往东销到济南府，西至邯郸。卫河中的船舶捎买到京津一带的也不少，由于这种肉制品加工时间长，操作费工，供不应求的现象常有发生。合营后，这个

名吃基本上是断档。即便加工点销路也不畅。究其原因一是成本价格过高，二是费工费时无人愿学。为了把这一宝贵技艺传于后世，武振同志收徒两名。

“南肠”在选料上由瘦猪肉、砂仁、丁香等十二种主配料构成。它的特点是：五香味浓，味美清香，久存不变质。是筵席佳肴之一。

蓼 花

本产品是以生长在水中的草本植物蓼花开放出的白色和浅红色的圆状花朵命名并研制做成仿形名点，始于元朝，至今有七百余年的历史。

民国时期，居住在临清城内蝎子坑（柴市街）的常淑荣家开始制作，但不以成品外卖。而以半成品“蓼花坯子”销于个体户，油炸加

工后投入市场。一九四三年常家伙计张殿甲学艺出徒后，在临清考棚街自营，字号华新斋。一九五六年加入公私合营烟酒糖茶糕点总店。据殿甲老人介绍，这个品种圆状的叫蓼花，直径约26毫米。长圆形叫芙蓉果，外皮油色光泽，内空丝絮缠绕，早年添加食色。从销路上看，因其价格低廉，体轻量多，酥香爽口，解放前平均日销400余斤。四月庙会销量更为可观，还有不少的人携带远登泰山。为奶奶神座捧作供品，以祈求万事如意，居家安乐。

十年动荡中名点断档。三中全会后才又恢复，不但销于临清，还打进了外地市场，西销河北省，北到天津等地，可谓名扬四方。深受广大顾客赞誉。去年，经省地食卫部门领导品尝鉴定，被列为山东省名牌产品，注册了商标。

“蓼花”在选料上由糯米、蔗糖、玉米糁

等六种主、配料制作而成。其特点为：外呈乳黄肉丝窝，香甜酥脆、回味爽口，是馈赠亲朋佳品。

尹家阁“下凡肉”

从临清城沿着古运河向东南走约二十里，在运河南岸的尹家阁村，有家近百年历史的“聚隆”号肉铺，四代祖传经营尿包肉和下水肉，因其风味独特，物美价廉，且购买者多为平民百姓，故称“下凡肉”，在当地颇有名气。

这种肉的特点是，久食而不腻，使人闻其味而知其美。不仅有舒筋活血之功能，而且有开胃健脾之效果。

“下凡肉”的用肉和制作较为严格。制作尿包肉用的肉肥瘦比例相等，灌制小肠的用肉比例为三比五。此外，还以优质酱油、紫蔻面、砂仁粉、花椒、鲜姜泥、大葱片、淀粉、

猪油、精盐等作为尿包肉和灌肠的主要佐料。煮熟的成品肉呈棕红色，油光发亮，诱人食欲，每逢出锅时，热气蒸腾，香味扑鼻，其味顺风飘出数里之远。其尿包肉呈圆形，灌肠呈圆柱形，切开之后，白里透红，红中有白。春、秋、冬三季久放而不逊色，即便是夏天，也能存放三、五天而不坏。

聚隆号肉铺约开业于一八九〇年，最初是由李耀周兄弟三人共同经营的。由于其制作方法独特，味道鲜美，不久就名声大噪，受到当时运河航线来往顾客们的欢迎。每当船只来到这里，船上的人们便蜂拥上岸，购买“下凡肉”，并把这种肉食品向北带到京津，向南带到苏杭。因此，当时聚隆号肉铺的生意是十分兴隆的。但到民国时期，由于官府横征暴敛苛捐杂税，日伪民团敲诈勒索，坑偷拐骗，闹得聚隆号肉铺只好关门停业。直到一九四五年临

清解放后，才由李耀周的后代李廷早继承祖业，重新恢复了“下凡肉”的生意。“文革”中，尹家阁“下凡肉”铺又一度停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尹家阁下凡肉铺又重新开门营业，许多村镇有其代销店，李廷早之子李凤桐到临清城里落了户，由于继承和发扬了传统的煮肉方法，从而使这一地方名吃更加富有特色，受到了人们的好评。

（临清市商业志办公室）

临清名产

临清狮猫

狮猫是家猫家族中的一种珍贵稀有品种。在动物界里属于脊索动物门类的脊椎动物亚门，在哺乳纲内属于食肉目的猫科。

临清狮猫是狮猫中的佼佼者。它是由外国引进的两种狮猫杂交后，又经过多年饲养而培养出来的长势如狮的新品种。它不仅具有一般家猫捕鼠灭害的本领，而且性格温顺是供人们饲养观赏，充实精神生活的一种小动物。

临清狮猫，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名扬中外。鸦片战争时期，就有外国人前来临清寻购“临清狮猫”。后来除北京动物园、广州动物园几十年前就把临清狮猫列入名贵稀有的动物

进行专栏饲展外。在祖国各大城市动物园内也陆继专展了临清狮猫。有位美国传教士，离开中国四十余年后，在给他的中国友人来信时，还会询问临清狮猫的传代发展情况。著名画家曹克家曾赞许说：“世界动物没有异眼的，只有山东临清有异眼猫”。中外各方人士对临清狮猫如此关注和喜爱，就是因为宅与其他家养猫相比有奇特之处。抗日民族英雄冯玉祥将军在抗日时期与临清在山西的知名人士沙月坡相识后，与其夫人李德全就特别喜爱临清狮猫，他的亲属余华心女士也特别喜欢临清狮猫，她曾於一九八四年在《大连日报》星海栏一百九十一期里发表过一首赞扬临清狮猫的诗词：

柔丝如雪，目分金银，

狮猫独具鸳鸯眼。

山东临清是故乡，

回首凝眸遙念。
同时还刊登了她喂养的临清狮猫照片。在这以前也有人对标准临清狮猫做过全面的描绘，即：

毛柔如丝白如雪，
双目金银分左右。
颈毛前兆面如狮，
触须耳毛两出异。
个大身长四肢矮，
尾短尖粗如扫帚。
千里能回记忆好，
性情活泼又温厚。
知人知心情意深，
捕鼠灭害猫中族。

其实，临清狮猫又何止这些优点呢，在一九八六年了《大众日报》农村版中、愿一平同志曾写到：“黑夜两眼发异光，黄眼射出的是

绿蓝色银光，兰眼发出的是杏红色的光，闪闪发亮，如同两隻奇异並排的灯泡。给人一种舒适奇特的美感。”这种猫名不虚传，不少爱狮猫的人士都谈到这种情况。综上所述临清狮猫，可以说在现有的家养猫中首屈一指，优点甚多，得天独厚，堪称猫中之王。

据传公元十三世纪初叶，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建立了蒙古政权以后，开始发起大规模的战争，向西域进军，把战争一直打到西亚的多滴河之滨，把中亚西亚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波斯等国的人强迫东迁，进入中国。从此不少被迫迁来的回回军士、工匠，就在临清定居下来。到元末十三世纪中叶，中国各族人民为了反对蒙古族的统治压迫和剥削，掀起了反元战争，到处有农民起义，这也正适合回回人的心理愿望和思想要求，在临清的回民也渴望平等，追求自由，要求恢复他们的宗教活

动。就依户接人自筹资金，选了几个有基础的人员与外地联合，回阿拉伯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取经，这些人一去就二年之久，有的没有回来，只有在临清已有家眷、财产的人回来了。在回来的途中经印度，因为回回人历来就有喜爱养猫的习惯，他们便在印度带回一对黄眼、毛白、身长个大的狮猫，据传这种猫在东南亚各国均有饲养，故称南亚狮猫。从此在回民中繁殖饲养开来。

元朝灭亡之后，明朝建都南京，在十五世纪初、明成祖为振兴经济，扩大明朝的政治影响，同时为迁都北京做物资准备，就加强了外事活动，开展了国家统一的对外贸易。从公元一四〇五年开始有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约在一四一〇年至一四二〇年间，有一次郑和带着两万多军士，水手，工匠等，乘坐几十艘大海船，装着大量的金银手饰、丝绸布匹、瓷铁器

具和生活用的淡水、食品、从刘家湾码头出海，路经东海、南海、印度洋一直到达了阿拉伯海的波斯湾。在波斯（伊朗）的忽鲁汗斯登岸，除了进行贸易交往以外，郑和还拜会了当地官吏及伊斯兰教教长和阿訇。据传说当时郑和船队的船上有很多老鼠，有的船上也养着家猫，但因老鼠成精，故捕灭不绝。郑和在拜见教长阿訇时，在清真寺里见到一个双眼兰色、毛长的白狮猫，就倍加欣赏，赞声不绝。在那里住不数日离港西行时，伊斯兰教教长和阿訇来专程送行，并带来一对狮猫做为赠礼。从此郑和船上便多了两只狮猫，不久，老鼠也就不见了。

郑和从红海各地回来，也把兰眼狮猫带回中国。通过饲养繁殖就留传下来。后来在朝文武官员的家中也有的就有了这种狮猫。

明太祖于公元一三六八年，曾令徐达，常

遇春二将北伐师次临清，由于常遇春也是回回人，在临驻防期间，在临清回民的要求下，他主持建造了临清第一座礼拜寺。徐、常走后留下回族人称马大人的马良。后来就成了临清伊斯兰教教长，当时需不断回明都南京问事和看望家眷亲友。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因南京尚有留守机构还不断去南京，时间已久，马良年老也就把家眷，亲属搬到临清定居，马良与郑和（本姓马，赐姓郑）是同族马姓，故当时波斯猫也成了南京官员人家的一种珍物。据临清伊斯兰教教长马金明说：“临清狮猫”是南京来的，当时马良家也养了狮猫，也就随同而来。临清市政协委员马慎修是马良的后裔，据他所知，他家辈辈饲养着狮猫，因为该猫原是波斯（伊朗）而来，所以也叫波斯猫。

鸳鸯眼白狮猫，是南亚猫和波斯猫在临清经过杂交培育出来的优良狮猫，故称临清狮

猫。已在临清落户四、五百年之久。经过人们有意识的给它们选择良缘，近百年来临清狮猫的优良品种也就越来越多。特别近几十年来，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也进一步促进了狮猫的喂养与繁殖。

狮猫的品种划分，主要是从其毛色特征、眼和体形上加以区别。通过实地观察和平时的了解，现将临清狮猫概述如下：

（一）白狮猫类：全身或绝大部分是白色长毛，这类狮猫现已发现的有七个品种。

①南亚黄：白长毛，一对黄眼，它的身长个大，尾长而粗，体形健壮，有六斤半至八斤半重。

②波斯猫：一对兰眼、毛长如丝而柔软，身长个大、四肢矮、尾短而粗。颈毛前兆，一股体重六斤至七斤半左右。

③鸳鸯眼：是南亚猫和波斯猫的杂交品

种，这类猫的形状、面象、毛势、身尾均备两种猫的特点。两眼一兰一黄，一般雌猫右眼黄色，雄猫左眼黄色，一对同卧在一起、对眼相立、别有一格、是珍奇的品种。

④鞭打绣球：全身白毛长、唯头顶正中有一块黑毛，而它的尾又长，顶尖粗毛，是黑色，因其尾时常能扫到头顶的黑球、故而得名鞭打绣球。

⑤雪里送炭：全身白毛、唯独颈上后部有两块黑毛，如同雪地里有两块炭。猫一跑动如送炭来了，故称雪里送炭。

⑥荷兰兔：是指全身白长毛，唯有两耳和鼻尖是黑的，如同荷兰兔的生色。

⑦汉白玉：临清故有的白家猫与南亚猫、波斯猫杂交后生出的白猫。毛短、尾长，有的是黄眼，有的是兰眼，也有鸳鸯眼的，是汉民猫的变种，故叫汉白玉。

(二)黑獅貓：其形狀、毛長等均如白獅貓，但全身或絕大部份毛色是黑色的，這類貓有五種：

①黑珍珠：全身毛長黑的發亮，一對黃眼純屬白獅貓品種，是一種返祖動物，也是多年多胎難得的珍稀品種。體重七斤至八斤。

②落雪：全身是黑長毛，唯四蹄鼻尖為白色。如同落入雪地里的一个黑貓，故稱落雪，是一種希有文雅的好品種。

③黑天鵝：全身黑長毛，一對黃眼，唯有頸毛周圍為白色，如同黑色的天鵝，站臥的象如企鵝。

④四個眼：全身黑長毛、唯有兩眼上方有兩點白，或兩點黃，如同四個眼睛。

⑤黑斑虎：全身黑毛，灰毛長條按照順序排列到尾、如同一个黑斑的小老虎。

(三)花獅貓：全身有兩種或三種毛色，

较好的有三个品种：

①大狸花：有黑、白、黄三色，毛较长。有的以块对称均匀排列，也有的以条排列，也具有狮猫的特点，称大狸花猫。

②气死虎：全身有黑、白、黄以条排列，三色分明，毛纹清晰，腹为白色，颈毛前兆，比东北虎还俊，所以叫气死虎。

③双花狮猫：有狮猫的特征，但是有白、黄两色，或白、黑两色混长而成，这种猫个子也较大，用食量大，体重能达八斤以上。

总之，狮猫的品种很多，不再一一介绍。今后有待进一步选种和繁殖，使狮猫的品种质量得到提高。

（刘春华）

哈 达

哈达是一种长巾状丝织物，是少数民族的

特需产品，在我国青海、西藏、新疆、宁夏、内蒙等地，藏、蒙等少数民族中十分流行。哈达的种类有佛像丈哈达、八宝、白绢等。主要用来表示敬意、祝贺、赠送亲友用或祭神和丧葬用。

临清生产哈达已有数百年历史，在乾隆五十年（公元1787年）所修《临清直隶州志》就有记载。历史学家翦伯赞考证，把临清哈达机户生产哈达时间放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公元1662—1797年），到太平军兴（公元1851—1864年）苏杭手工艺人顺河北上，哈达机户“逐转移临清”。此后，苏杭哈达业绝技，临清哈达业大兴。全境机房七百余，浆坊七、八处，收庄十余家，职工五千人。据市丝绸厂退休老艺人李岭回忆，他家相传几代织哈达，有织机三台，他祖父是道光年间人，足见临清哈达生产历史悠久，持续时间长。

当时生产经营方式是：丝店是山西商人开办的，山西商人从外地买了丝发给机户，机户织成哈达以后再交给山西商人，运往西藏，内蒙等地销售。机户从山西商人那里重领取折子，商人发多少，收回多少，哈达都记在折子上，凭折子结算报酬。当时哈达生产既具有独立生产的独立性，又依赖山西商人的资本，它是山西商人将资本投资于手工业生产的产物。所以临清哈达的发展或萧条，则主要取决于山西商人对机户盘剥的多少。在这种情况下，机户联合起来、成立了哈达业行会，“机神会”、并分“南会”、“北会”。临清哈达生产依赖于山西商人提供资金原料和出卖商品，客商一走临清哈达业就萧条了。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和日本侵略中国时期，由于对生产工人的盘剥和压榨，加之地区之间隔离交通不便，致使临清哈达几乎绝断

产。解放后，党号召发展民族工商业，临清哈达恢复生产，开始组织生产小组、生产供销合作社。当时的生产经营方式是：统一发原料，统一收产品，向外销售。后来组织成为丝织生产合作社，集中生产经营统负盈亏。一九五八年过渡到丝绸合作工厂，当时的生产规模，职工二百余人，年产量五十万米左右。

但是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使临清生产哈达逐步萧条，特别是在十年动乱期间，中断了哈达生产，在处于人亡艺绝之际。一九八〇年工艺丝织厂重新恢复生产。该厂现有动力织机11台，职工62人，花色品种主要有：官佛像、小佛像、一六绸、丈帕、八宝（二种）、小白绢等。新品种有：一四广壮。淘汰的有粉绢，江本。生产效率逐年提高。原二人一台织机，日产丈帕一匹（合3.3米）。现一人一台动力铁织机，日产丈帕五匹。产品多行销于甘肃、青

海，內蒙等省。

千 张 袄

工艺千张袄是临清独特的名牌传统产品。是几百年来临清劳动人民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制出来的特艺产品，也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工艺千张袄是利用裁制皮袄剩余的边角下料，把长短大小不等的碎毛皮，根据毛的色泽，经过精心选料搭配，缝制方块后，再裁制“千张袄”。可以和整皮产品媲美，并有以下几方面的长处：

1、经选料配制，工艺千张袄的毛皮长短以及色泽一致，看上去和整皮难分，其实胜于整皮。原因是整皮薄厚不均影响其质量，千张袄却不同，因是什么地方毛皮什么色泽，可以任意搭配，从质感上胜于整皮。

2、轻暖能与整皮有同样御寒能力。

3、千张袄因是用碎皮缝制，穿起来既不出现上纵下垂，久穿也不成毡。而整皮毛花一顺，穿起来上纵，时间长了就垂成毡。

千张袄兴于明代，盛于清代，流传至今。

临清解放后，千张袄生产得到较快的发展，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到六十年代，已经发展成皮毛厂、回民皮毛厂、毛毡厂四个工厂生产。生产工人达500人，年产能力均在万件以上。直到文化大革命，因原料供应中断，产量才逐渐减少。

灯 彩

灯彩，俗称花灯，是我国民间艺术的集锦，特别是和造型、裱糊、雕刻、镶嵌、剪纸、影戏、绘画、书法等工艺美术门类有密切的联系。

临清灯彩历史悠久。由于历史原因尚未有

文字记载，但根据临清郑观云先生记述，清末宣统元年，为庆贺小皇帝登极，全国大庆。至十五日元宵节城内大街小巷，商贾店铺，皆精制各式灯彩，张挂于门檐楹下。其中尤以宫灯居多。当时民间能匠高手，创作出许多精美有特色的灯彩，按宫灯画内容分类挂在各条大街上，其中以考棚街的《水浒传》人物宫灯，大寺子的《封神演义》、《西游记》故事走马灯最为著名。在大寺街商场内并设有大型围屏风灯，高约9尺、宽3尺，屏风八扇，合拢作八角玲珑宫灯样，此灯做工精细，珑雕剔透、刀法流畅，所画山水，用笔游丝高古，似为院派高手所绘，非一般凡俗平笔。至灯市口，更是各种灯彩云集，龙灯、转灯、狮子灯、绣球灯、鱼灯、花鸟虫鱼灯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此类灯造型奇特色彩明快，又多具民间特色。入夜城内各路会社，演出龙灯舞、高跷、竹马等民间艺术，热闹非

凡，实为民间一大型工艺美术之图展。时人有诗记其盛况云：

元宵佳节平明开，月明星稀萤飞回。

二三起火穿梭去，一片银花闪光来。

不见丽人夹花舞，时有浪子穿蝶飞。

春满楼东花满树，五色彩龙上云台。

解放后，临清民间艺人纷纷重操旧艺，扎灯出售。据调查：一九八〇年元宵灯节的品种达八十多种，销售量达万盏以上，其中以飞机灯、鱼灯、宫灯、蚊子灯、花篮灯等品种最多，很受群众欢迎。

一九八四年元宵佳节，临清举办了民间灯彩展览，由市总工会、国棉厂、汽车配件厂分别在文化宫、国棉和汽车配件厂主办，展后并进行了评比发奖。送展单位是各工厂企事业单位及街道，共计134个单位。8个单位获一等奖，14个单位获二等奖。展期五天（正月十

三至十七日，其况甚盛，展出灯彩400多件，样式繁多，题材丰富，品种有壁灯、吊灯、提灯、宫灯、走马灯等。在风格和题材上有仿古典的红木宫灯、红纱灯，还有大量取材于花鸟虫鱼，亭台楼阁的花灯及变形动物灯。其中尤以民间艺人辛师傅所制作的鹤灯、龙灯等，在技巧、造型、用料和装饰手法上都表现出独到之处。所制仙鹤灯构思精巧，取仙鹤稳立观望之状，他给仙鹤脚下添一荷吐，既消除了不稳之感，又增加了仙鹤吸水的意境，整个造型逼真，栩栩如生，取料绢纱则玲珑剔透。楼门外孔雀电动壁灯，由陈孝友、徐伯喜设计。取孔雀开屏之状，宽5米、高3米，采取变形手法，造型新颖、色彩鲜明，加之电动灯的变化，所产生的五彩缤纷的效果和节日盛况融为一体，显得十分协调。

每日观灯者，达万人，十五日那天更热闹

非凡。夜幕降临，人们如潮水一般涌向职工俱乐部院内，各式灯彩皆悬挂在楼檐，门檐下和院中彩杆上，高低交错，相映成辉。晚七点时，远处有曲周烟火鸣放助兴，院外马路上有龙灯齐舞，人山人海，加之人羣中有在灯市上买来的各种花灯，真是一片灯的海洋，省电视台录制了这一节日盛况。

（临清二轻公司史料编委会）

知识小品

姓氏的由来

每个人都有姓名，每个家族都有姓氏。在古代，姓和氏不同。姓，起源于太古母系社会，起着“别婚姻”、“明世系”和“别种族”的作用，是家族的称号。氏是姓的分支。同一姓族的人，由于人口增殖，迁居异地，身份技能的变化等，可以分裂为一些支派，这些支派就是氏。氏也是贵族的宗族制度的代表和称号。夏、商、周三代以前，男子多称氏、女子多称姓。三代以后，姓氏合二而一，成了只有姓而无氏了。古代建国则有姓，如齐国是姜姓，晋、鲁、郑、燕等国都是姬姓。

姓氏，是从哪里来的呢？主要来自四个方

面：一是从封地和赐姓而来。天子就是赐姓命氏的人。黄帝对他的二十五个儿子创设了十二个姓。如陶唐氏之后封于刘(地盈)，其后方以刘为姓氏。二是以出生地为姓，黄帝生于寿丘，长于姬水，以姬为姓。三是以官职得姓。楚庄王少子作上官大夫，后代就以上官为姓。四是因事物或其它原因而得姓。汉丞相田千秋年纪大了，出入乘车，人称车丞相，后人就以“车”为姓。葛，是古姓，本来是琅琊诸县人，后来从居阳都。阳都本来有姓葛的，搬去姓葛的多了，人们就用“诸葛”来称呼他们。从此，诸葛就成了一个复姓。

古代姓氏不多，由于历史的发展和人口的繁衍，姓氏越来越多。宋代的邵思编的《姓解》，收录的姓氏有二千五百六十八个之多。明代陈士元撰《姓觚》搜集到三千六百二十五个姓氏。传到今天《百家姓》显然减少了

很多，两个字的复姓也大为减少，三个字的姓更是凤毛麟角了。

十二生肖与干支纪年

十二生肖与我国的干支纪年有关。干支纪年法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在生产斗争、自然斗争和科学探索中创立并逐渐完善起来的。

所谓干支，实际是“天干”和“地支”的简称。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个字总称天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个字总称地支。天干十字与地支十二字顺序组合，即成“甲子”、“乙丑”、“丙寅”、“丁卯”……直至“癸亥”，正好为六十组，总称“六十甲子”。六十年为一周期，周而复始，了无穷尽。人活到六十岁，正好是干支的一个周期，故而有“花甲之年”的称谓。

根据考古发掘证明，我国最迟在殷商时代，已经有了干支纪日法。干支用于纪年，大致是始于东汉顺帝时，至今已近两千年了。为了便于人们记忆，大约在一千多年前，又用鼠、牛、虎、兔、龙、蛇、马、猴、鸡、狗、猪这十二种动物顺序对应十二地支，这就是十二生肖。如一九八七年是丁卯年，是干支的第四年，对应是兔，则这一年出生的人，属相就是“兔”，推而广之，六十甲子内己卯、辛卯、癸卯、乙卯这四个“卯”年都是兔年。

古代年龄代称

我国古代对不同的年龄阶段，都有一两个代称，这在读古书时是经常可以见到的，现简单介绍如下：

总角：指幼年。

垂髫、垂年：指童年。

束发：指十五岁以上青少年。

及笄：指女子十五岁。

待年：指女子成年待嫁，又称“待字”。

弱冠：指男子二十岁。

而立：指三十岁。

不惑：指四十岁。

艾：指五十岁。

花甲：指六十岁。

古稀：指七十岁。

耄：指八十岁。

耄：指八十岁、九十岁，又古称七十岁以上皆为“耄”。

皓首：指老年，又称“白首”。

黄发、鲐背：指长寿老人。

期颐：指百岁。

文 史 简 释

文史界有一种说法：我国在先秦之前，文学、史学、哲学同为一学科，称为“文学”。直到两汉司马迁编著《史记》，文和史仍然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史记》既是史学经典，又是文学巨著。后来文、史、哲分为三个学科，但由于历史上这种渊源，人们仍习惯称为“文史”。这种说法似乎能说明文史概念的由来，

现在运用“文史”这一概念有些是代述“文”、“史”兼蓄的意思。有些运用“文史”概念，则主要是讲史学，如政协文史资料，主要是有政协特点的近、现代历史资料，所冠之以“文史”，大概是取“离文无以言史”之义，也反映了各界爱国人士以优美的文字表述丰富资料的特点。

文史资料与党史资料、

地方志的区别

政协征集的文史资料是历史资料的一种，它不同于文献资料和实物资料，是储存在人们头脑里口述出来经过整理的活资料，也就是通常说的“三亲”（亲历、亲见、亲闻）资料。文献资料是研究历史的根据，但不是所有的文献资料都是翔实可靠，史料并不等于事实。特别是旧中国的官书、官报、往往是掩盖事实真相，不足为据。文史资料能够揭示事件的内幕和真相，“可以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除上述作用外，还有活跃政协工作，扩大爱国统一战线的作用。

文史资料和党史资料有关联，又有区别。

文史资料有时也会涉及党的活动和人物，但政协只征集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群众运动方面的资料，其他有关党的活动和人物的资料，原则上要由党史部门去征集。

文史资料与地方志有关系，也有区别。地方志是根据报刊、档案及其他文献、实物资料，有时也参考一些个人的回忆资料，就本地区的历史沿革、行政区划、经济、文化、风土人情和人物作综合的记述，与当代人根据亲历、亲见，亲闻的事实所写的回忆资料有所不同。所以文史资料只能为地方志的编纂服务，而不能代替它。

至于文史资料与历史评论、文物考证、名胜探源、文学作品的区别，就显而易见了。

（本刊辑）